

第十六輯

湖南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11260/07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1,000 印张：7.5 印数：1——4,400

统一书号：11109·206 定价：0.85元

目 录

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三次回湘·····	陈新实 (1)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	杜修经 (33)
大革命风暴中的华容·····	刘公武 (42)
浏阳农民运动的片断回忆·····	慕容楚强 (52)
大革命时期醴陵见闻·····	李咏农 (63)
回忆祁阳农运·····	柏希虞 (70)
大革命时代的沅江·····	刘 虚 (79)
“马日事变”前后·····	李绍林 (84)
关于十万农军围攻长沙问题·····	易礼容 (90)
马日事变后农军围攻长沙的回忆·····	陈新宪 (91)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袁福生 (97)
坚持白区斗争的湘江特委·····	谢介眉 (108)
我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的几件事·····	汤铜中 (125)
三去延安·····	杨第甫 (141)
湖南种子东北花 ——协助韩梅村将军凌源起义经过·····	邓钧洪 (188)
战斗在国统区的演剧六队·····	刘斐章 (211)

补·充·订·正

补充刘岳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点滴事迹·····	傅白芦 (227)
关于湘中二支队第三团的一点补正·····	莫新春 (232)
关于我在起义后叛逃问题的几点订正·····	熊新民 (232)
对《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 一文的订正和补充·····	孟树德 (235)

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三次回湘

陈 新 宪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同志曾三次回到湖南。毛泽东同志每次回湖南，都值革命形势发展到紧要关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第一次回湖南为的是考察农运，时间从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是先年十二月中旬应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邀请回长沙的）。二月中旬返回武汉。第二次是“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时间是同年六月初旬至中旬，约十余日，被陈独秀一再急催返武汉的。第三次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奉中央委派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时间是同年八月中旬至九月下旬。

毛泽东同志这三次来湖南，对我国革命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是每一次我都能有机会和他较多地接触，历历往事，令人难以忘怀。

一、毛泽东同志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冬，正当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农村阶级斗争顿时尖锐剧烈起来。社会上和革命队伍内部都出现不同的态度，有的欢呼，有的咆哮，有的忧心忡忡，有的徬徨迷惘。农民运动究竟何去何从，亟需有个统一的认识和态度。为了总结前段

斗争经验。及时制定工作方针，拟订组织规章，部署今后任务，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在湖南区委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在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

全省工农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是当时湖南政治生活中一件重大事情，省会、各县城镇、产业区都纷纷举行庆祝大会，省内外各革命机关团体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头几天，两个代表大会共同一起听报告。当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是工会、农会的公开的法定的领导机关。虽然省党部大多数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但是农民部的部长却是刚上台的大右派刘岳峙，他也到大会来“训话”，故代表大会一开始就围绕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显露出各种立场。来自斗争实践中的农民代表，特别是曾经在广东农运讲习所学习回来的代表，个个斗志昂扬，主张继续大干下去。国民党右派对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则是指责非难。党内有的同志态度也不鲜明，在赞扬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些指责。在分组讨论中，农民代表纷纷议论，形成领导与群众极不协调的局面。此时代表们听说毛泽东同志正在湖北视察农运，便建议大会邀请毛泽东同志来指导大会的工作。大会秘书处接受了建议，由秘书长柳直荀同志草拟了电文，于十二月三日经大会一致通过，即日发出。毛泽东同志于十七日来到长沙。工农代表大会联合于二十日假省教育会幻灯堂召开盛大欢迎会，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家都想一瞻风采，聆听他的高论，到会的近千人，其中工农代表大会代表三百五十二人，将幻灯堂挤得水泄不通。各方闻讯面来的络绎不绝。会场外的走廊上，博物馆的台阶上，傍侧的溜冰场和茶社都站满了人。当大会执行主席刘惊涛同志(宝庆农运特派员)

宣布开会时，幻灯堂内外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就离湘一年多来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作了概括的说明，接着就以“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为题，详细阐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都要靠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才能完成。目前农民最低的要求是减租、减息、平粜，提高雇农工资等，只有解决这些迫切问题，才能使农村生产发展，物资丰富，原料充足，购买力提高，也才能促进工业、商业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故一切问题都与农民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听取各代表的发言，并主持大会决议案和宣言的起草审订工作。有时走访各方面人士，搜集各界意见，日夜不停地指导大会进行工作。到月底两个大会闭幕时，又请毛泽东同志作了革命联合战线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互勾结，组成国际、全国、全省反革命大联合，我们工人、农民、商人、学生也应积极组织革命的大联合，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对付反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他以满腔革命热情肯定前段工农运动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兴起在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前人几千年没有取得的伟大成绩，功劳是极大的；并严厉斥责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以及“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之类反革命论调。他说，过去几千年都只准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平平粮价，就算“闹事”吗？这种只准地主对农民压迫剥削，不准农民向地主反抗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破坏革命的人。最后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但

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他们还在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毛泽东同志在工农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对到会的代表和革命干部是极大的鼓舞，使大家斗争的立场更坚定了，方向更明确了，使大会胜利地完成了回击反革命逆流的任务。

大会闭幕后，湖南区委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将大会代表留下来办了三天训练班。头一天毛泽东同志向党团员代表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详细分析革命军占领武汉、南昌后国内形势的变化，着重指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蒋介石和唐生智的矛盾以及迁都问题的争执等。第二天又就农民问题和调查工作的方法对代表和干部作了两次报告，对政策和斗争的策略指示很详，并就考察江苏、湖北农村情况列举事例，说明开展农村调查的重要性及如何做好调查工作的方法。三天训练班的时间很短，但毛泽东同志三次重要讲话，对帮助干部和代表们统一思想、掌握政策，提高策略水平及讲究工作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往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能沿着正确轨道继续普及深入地发展。

为了用大量事实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日至二月五日亲自至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城乡进行实地调查。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曾回韶山，在湘潭和湘乡边境组织农民协会和雪耻会，开展革命斗争，随即在韶山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湘乡当时是人口比较多，面积比较广的一个县，农运开展比较好，特别是农民武装力量比较大。衡山原是我省农运发展最早，力量较大的一个县，早在毛泽东同志任湘区区委书记时，一九二二年冬至二三年春季，就由水口山抽调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先后回到岳北白果，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向军阀赵恒惕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时，在岳北农村成立了SY组织（社会主义青年

团)故衡山不但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基层干部。醴陵是军事战略要地,株萍铁路线上的重镇,株萍沿线是我党确立的工农运动重点,农运早有基础。就湘东地区来说,醴陵是农运发展最先进的一个县。长沙是省会,近郊区农民协会是由省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这年夏天叶开鑫占据长沙时,省农运领导人易礼容同志就派滕代远同志前去工作,因而组织力量比较强,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

毛泽东同志于元月中旬来到衡山,中共衡山地委预先指定我和贺尔康同志负责陪同毛泽东同志到城乡各地去考察。衡山地委主要负责人只有七人。书记向均,组织易克勋(两人都没有公开身份)。我负责工运和宣传,贺尔康负责农运兼管农村青运,周淑良负责妇运。我的公开身份是省总工会特派员,贺尔康的身份是农运特派员,周淑良的公开职务是衡山县女界联合会会长兼县农民协会妇女部长。还有,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刘爱农,他两人均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又分别任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对县政府及公法团的联系工作一般都是由他们二人担任。毛泽东同志在衡山考察有十一、二天,先到岳北白果,福田铺等地农村进行周密的调查,听取了区乡农运干部的汇报,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走访了农、工、商、学、妇群众组织和区乡自治筹备机关人员,视察了工农革命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村小学和农民夜校。在白果亲自慰问了农工会的烈士家属。在福田铺详细调查了农村市镇的商业、手工业及集市贸易情况,到县城住在康王庙地委机关,先后听取了地委各负责同志的汇报,在县农民协会、县农运讲习所、县妇运训练班召开了调查会,走访了各革命群众组织及有关机关团体,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出席了县城各界的欢迎大会,应农讲所和妇训班联合请

求作了有关农民运动的报告，还在地委主持的新党员宣誓大会上作了解释党章的讲话。他有时还单独走访或邀请个别人谈话，了解某一方面的情况。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概括成若干问题，提交地委讨论，要求大家认真发表意见。我在城乡随着毛泽东同志参加各种调查会和讨论会，看到他总是先写好一个需要调查了解或研究讨论的纲目。在会上，他也总是自己提问题，自己做记录，让大家发表意见，有时启发大家开展争论。我们陪同参加的人有时也做记录。特别是有关统计数字，他总要反复多次核对。如衡山地委书记向钧向他汇报说，衡山乡农协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毛泽东同志核对了在岳北调查的材料，又亲自到县农会查阅了各区乡表报，还在农运讲习所问了若干位乡农协委员长，于是在地委讨论会中和在农讲所的讲话中都高度赞扬“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当毛泽东同志从衡山县衙门一个小狱吏处得知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委员，随即向县农会和县党部农民部了解情况，在地委会议上提出严厉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向贺尔康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又向大家说：“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向钧立即要我和贺尔康去县知事公署交涉释放。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两位是省里派来的特派员，应该正正堂堂地责令该知事立即释放，以后不得擅自派兵捉人。”我们走到县衙门说明来意，县知事陈晖元乖乖地照办，当即请农会组织农民，将被押的农会职员披红挂彩迎接回去。这件事本是国民党县党部搞的，县农会虽知道这事，也没有及时向地委及主管农运的同志汇报，若不是毛泽东同志来进行调查，他们还不知要关到何时哩。

当向钧同志在地委调查会上汇报衡山改编地主团防武装为农民自卫军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现在地主武装纷纷投降了，但不要认为天下太平了。部队接过来以后应注意政治素质的改变，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治训练。只是换个招牌。那是换汤不换药。我看各地均应注意这件事。”他还告诫我们，建立农民自卫军武装，应大力发展梭镖队，要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枝梭镖，快枪也要农民自己背才靠得住。现在不要以为赵恒惕、叶开鑫被赶走了，大的土豪劣绅都逃跑了，要防止他们卷土重来，我们必须把农民统统地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武装就象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想跑跑不掉，想来来不了。衡山当时分九个区十七个字号（朝、宗、宇、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义），除县城外，每两个字号联成一个区，每区都设有团防分局，一个区多的有一百多枝枪（如岳北、城区），最少的也有二、三十枝（如店门前），团防局的官兵大都在北洋军阀部队干过，有的还是清朝的辫子兵，又多是当地人。未被农会接收改编前，完全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农会兴起后，控制了乡村政权，团防局的靠山垮了，他们在徘徊观望一阵后，不得不向农会投降。我们那时改编团防部队一般是原封不动，只换了一块招牌，近的派人员去查点一下人枪数字，远的就由他们自己造册呈报县农会备案，照例加委给他们以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队长等职衔。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些情况，便对我们作了上述指示。

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实行了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的联盟。故当时在湖南省、县两级政权和国民党省、县两级党部中人都带有共产党人参加，区党部、区分部中共产党人更多些，因为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有许多地方国民党

的组织是共产党派人帮助建立的。至于民众团体，如各业工会，农会，女界联合会，都是共产党派人组织，并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是受CY（共青团）领导的，领导成员中以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还有各界联合会组织的爱国团体，如雪耻会，济难会、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实际上也都是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只有商民协会让给国民党去抓，商民也没有多大发言权。那时，县知事（县长）是省政府任命的，大都是旧官吏。但一切重大问题取决于县知事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席会议，在衡山当时叫“公法团联席会议”，会议由县知事召集，各民众团体及县党部派代表参加，民众团体代表的意见对会议有很大的影响。县知事几乎是唯命是听。就衡山那时的情况来说，在这种会议里，县农会和县总工会又起决定作用，重大问题若没有农会和工会代表参加，开会也是“议而不能决，决而不能行”。因为一切政令没有工会和农会的布告或通告，工农群众是不会遵照执行的。那时乡村可说是农民专政，一切权力归农会。城市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工会说话是“飞灵的”，毛泽东同志来衡山考察，亲自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说：“你们县的政治颇民主了，这是农民在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的权力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形势。目前我们仍应继续领导农民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农民权力长上来了，就应立即在农村建立以贫农为领导的新的乡村自治机构，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完成了乡村自治便可召集县民会议，实行县民选举，成立名符其实的民主委员制政府。”毛泽东同志在地委讨论会上还郑重地告诫我们：“贫农是革命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他们在完成民主革命后，革命情绪继续高涨，迫

切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为避免贫农孤军作战，我们需要在农村建立联合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中农，农协委员中也要有中农代表参加。这样做有利于打击共同的敌人。”

在讨论联合战线中某些具体问题时，有同志说，国民党老是出右派，早几年出了西山会议派，近两年又出了孙文主义学会派，还有戴季陶派。不革命的就滚出去，留在国民党内干什么！毛泽东同志说：“K M T（国民党）是个很复杂的党，党内有代表地主阶级的，有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有代表中产阶级的，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有代表半无产阶级的，有代表无产阶级的。近来局势的发展，既增加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成分，也混进了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和地主分子。这就使K M T内有革命派、非革命派和假革命反派。非革命、假革命到时候就成为反革命。我们从K M T的党史来看，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到今天的中国国民党，发生过若干次分化，孙中山先生改组过若干次。每次改组总有一些不革命的站到反对立场上去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容纳共产党。当时孙先生说：‘谁阻挠我接受革命青年入党，谁就是阻止我革命’。这样就把他们暂时压服了。接着就有人脱党。孙先生刚逝世，又有一批人在北京西山灵堂开会，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广东革命的国民党相对抗，就是西山会议派。他们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现在又有戴季陶主义者高喊防止‘赤化’，他们与西山会议派一样都是反共派。我们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共产派。今天我们讲联合战线，其目的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内出现右派，是阶级本质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地主阶级不愿‘平均地权’，大资产阶级不愿‘节制资

本”，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的。”他给大家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国民党内的老右派、新右派随着革命的发展，如竹笋脱壳一样，纷纷脱离。竹笋只有不断地脱掉废叶，才能茁壮成长，所以说这是必然现象。”毛泽东同志还对我们说：

“要注意策略，在联合战线内有许多麻烦棘手的事情，应让KMT出面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把CP抬出来，但我们又要坚持原则。”

休息时，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来地委汇报出席县公法团联席会议情形说，县知事陈晖元说近来税收不旺，司法收入也减少，县署财政困难，年关快到了，各机关团体薪饷无法发给，问工会、农民协会怎么办？向钧同志说：“我们工会、农会又不是收税的，问我们怎么办！”我和贺尔康正在下象棋，毛泽东同志从棋盘上拾起一只“帅”，对大家说：“这是他在将我们的军。我们也去将他一军！”大家望着笑，问怎么将法？他说：“你们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县衙门既然没有事干，司法衙门又无官司打，就来个裁员简政，干脆把这些冗员遣散回家，免得多吃冤枉饭。你们还告诉他，社会治安有我们纠察队和自卫军负责，县太爷可安心睡觉。”我们随即遵照办理，以后这位县知事再也不提财政困难了。

一九二七年元月初，南岳成立区农民协会，同时接受团防改编。地委派我去南岳，传达省工农代表大会精神。区农民协会决定在南岳大庙里开成立大会，庙里的住持和尚要求莫进佛殿和西厢和尚住室。农会则放出空气，要赶走和尚，没收庙产。我们当时没有理睬和尚的要求。开成立会那天，庙里的方丈、知客以南岳佛教协会的名义贴出标语，其中有：“和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真正的无产阶级万岁！”另外也贴了几张祝贺区农协的标语，而把这两张贴在进庙门的两边大柱上。这天，南岳附近农民涌向

南岳镇，纷纷朝两个大庙里闯，发现一个庙里有和尚在吃猪肉，大家将他带到农协大会场。群众听说方丈和尚吃猪肉，说都要戴高帽子游团。和尚双手合掌不断念“阿弥陀佛”，恳求莫游团，愿意受罚。区农协负责人问我怎么办，我同意罚款了事。象这类事件究竟该如何处理才正确，我当时心中并没有底，上级也无明文指示。唐生智这时是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又是湖南省省长，他却是南岳庙的“大施主”。南岳庙的上层和尚多与唐生智及其高级将领有联系。毛泽东同志到衡山，我在地委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他对普及政治宣传，破除迷信，处理祠堂庙产以及怎样办农民夜校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其大意如下：

（一）普及政治宣传工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有许多政治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取决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这几个月来你们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中，政治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宣传队到城乡各地演讲，发传单，集会演戏，提灯游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效果很大。现在又分别派负责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全省工农代表大会情况，这样做很好。但今后应注意从群众的实际生活要求出发，利用各种机会，把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政治口号的内容渐渐充实起来。宣传方法应注意区别对象，如对农村应该注重口头宣传。各种纪念日活动，均可由我们先印好谈话纲要，发交各区乡农会干部备用。也可把一些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故事编成戏剧演出，或用画报张贴。文字应浅显易懂，与其用长篇大论，不如用短小有韵的歌谣、故事、对话、问答。宣言、传单应一律用白话文。

（二）南岳是个名山，庙大产业多，和尚也多，向来香火旺

盛，善男信女大施主往来频繁，庙产地租遍及省内外，大和尚穿的是丝罗绸缎，听说吃的也不差，一席素宴很可观（当时南岳住持和尚招待“施主”，一席素菜有达四十块银洋的），有租有钱，算什么“真正无产阶级！”庙里也有穿布袈裟的小和尚，一般靠念经、拜忏、敲木鱼过活，与大和尚生活悬殊，但他们与工农无产者不同。关于庙产祠产，有的地方好办。有的地方不好办。你们衡山又特殊些——白果祠堂多、南岳庙宇多。办事要有场所，工会、农会要有会址。你们占用祠堂庙宇，现在各地都是这样。闲地闲产可以利用嘛。你们将庙产祠产提出一些办农民夜校，做公益事是应该的。但在聚族而居的地方，要防止土豪劣绅利用宗族观念进行挑拨，要严禁豪绅瓜分祠产庙产。每做一件事都要把意义、方法向农民讲清楚，免得出漏子，给人借口。积谷是为了备荒，既不能瓜分，也不宜提作它用，遇到青黄不接或荒年，借给贫农，应不取息。

（三）象唐生智，他现在是站在革命的一方面。我们要团结他。但他信佛，据说还请了一个所谓“道法高明”的和尚当亲信顾问。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但不信菩萨，而且还要宣传破除迷信。现在农村地主的权力打倒了，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族权和神权也就跟着动摇。打菩萨、拆灵位，如果农民有觉悟，自己动手是好的，我们不要作硬性规定。我们目前应集中精力领导他们作政治斗争，先把害人的活菩萨——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权力彻底打垮。我们还要领导农民的经济斗争，如减租、减息、减押、清算……，“活菩萨”彻底推翻了，经济斗争又取得全部胜利之后，那些不起作用的死菩萨，农民自己会丢掉的，无须过早地去越俎代庖。总之，破除迷信，我们要作宣传，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强迫和阻止都是不对的。有些问题，要等到农民

要求分配土地时一道解决。

（四）夜校是农民和工人最喜欢的学校。过去农民负担了一切教育经费，而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上层阶级的子弟。现在农村豪绅势力被打倒了，农民自己开始办起学校来了。我早几年在长沙，前年在湘潭乡下都办过夜校。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就教材来说，城里的东西多，不合农村的需要；就对象来说，过去乡村只有儿童教育，没有成人教育，只有男人教育，没有妇女教育，也是一大缺点。衡山乡村的学校现有三种：有官办的国民学校和高等学校，有农民自己办的夜校，有村上办的私塾。农民最喜欢自己办起的夜学，因为夜校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适合农村特点。（当时衡山农民学校设有儿童日班，成人夜班和妇女班，教学内容一般采用《青年平民读本》，增教应用文，也有教新编杂字的）。至于教学方法，值得考虑，不要老是先生讲，学生听，要结合实际，启发学员讨论。我们还可以利用夜校培养党团员。关于经费，可以由农会统一解决。目前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以及其他闲产，使公款公用，闲产不闲，有什么不好？但从长远打算，必须在省县两级财政预算中列为专项，确定其来源。这个问题，在这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已做了决议。

在讨论粮食平糶、禁运问题时，毛主席指出：实行粮食禁运和平糶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目前农村贫农自动起来禁止不法地主、土豪劣绅与投机奸商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卡借偷运，引起民食恐慌，是完全正当的。新的民主自治机构成立后，应将粮食好好管理起来。现在各级农协应做好所辖范围内的人口和粮食调查工作。多余粮食可与外乡互通有无，但仍应严防奸商与豪劣勾结牟利，禁止抬高粮价。总之，禁运是禁敌人，不禁自己。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来衡山之前，各乡农民协会唯恐粮食外流，多自动组织禁运，虽然制止了豪劣奸商的囤积偷运，但使有些缺粮乡发生严重的民食问题，土豪劣绅则趁机造谣，说什么“农民协会要共产了！”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并教育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省农民协会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时发布粮食出境管理条例，除军粮由省里发采购证指定向产米地区购运外，规定县与县之间可互通有无，只要持有县农协批准的通行证就行了。衡山当时规定各区乡农协组织民食管理委员会，将地主多余粮食按人口所需进行平糶，有剩的储仓，缺粮乡可向县农协申请，持证到余粮乡购买。权力都掌握在农民协会。

在讨论如何办好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时，贺尔康同志提出要求上级颁发一个组织章程。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衡山的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都组织起来了，这很好嘛。搞个章程确实需要，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是初办，应因地制宜。当然，上级应及时做出指示，主要还靠你们摸索经验、想出办法。你们自己可大胆地制定一个合作社章程，就叫“草案”，试行一段，再慢慢来完善。现在农村办起合作社，穷人就不要进当铺了。

当地委负责同志汇报党团组织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你们今后要在产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多发展党员。凡是成立了农会的地方，都应建立党的组织。共青团也不要老是停留在城市学校里，应多到农村和矿区去吸收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入团。

毛泽东同志在衡山县城考察期间，地委在一天晚上召集城区的党员大会，同时安排新党员宣誓仪式，请他作了政治报告。新党员宣读“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誓词毕，他又就党章和六句誓词作了扼要的阐述。会后，毛泽东同志对地委书记向钧及其他几位负责同志说，应该加

强对新党员的训练。你们准备办短期训练班训练新党员，很好。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的组织建立比较早，你们工运和农运这批骨干，许多是岳北农工会到水口山或安源经过几次大斗争又回来的。你们过去替他们输送了干部，他们又为你们培养了干部。新党员经过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去参加或领导各种实际斗争，这样成熟更快。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二七年二月，衡山地委在衡山县城南学校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妇女运动训练班，派刘爱农同志主其事，抽调一批在农村中工作的农运和妇女骨干到县城参加学习，他们大多是基层领导干部。一九二七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同志曾亲临讲习所和妇训班，分别召开了调查会。地委集合两个班学员，请毛泽东同志讲话，地委所有负责同志都参加了，由于参加调查会的都是各区乡农协和女界联合会的委员长、执行委员、纠察队长等基层负责干部，提供的材料都是当时实际斗争中很具体生动的事。在农讲所调查会上，十四件大事中的主要问题大都涉及到了。对禁运粮食、办合作社、减租减息减押、破除迷信、处理庙产、祠产、办农民学校、煮酒熬糖、喂牲畜、养鸡鸭、筑塘坝、修道路等具体问题都开展了讨论。在妇训班只讨论破除迷信、办农民学校、煮酒熬糖、喂鸡鸭以及农村妇女解放中的一些问题（如剪发放足、打花轿、反对恶姑磨媳妇等）。两班学员对七列问题多数是意见一致的，但在喂鸡鸭和煮酒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农讲所对喂鸡鸭主张禁，理由是消耗粮食，还损坏禾苗；妇训班则主张喂，理由是要靠鸡蛋买盐卖针线，卖鸡鸭也是零用钱的来源，过年过节待客也都需要。煮酒则相反，妇训班主张禁，农讲所大多主张不禁。这些问题后来在地委讨论时，大家认为县农协不要做统一规定，各区乡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鸡可以多喂一点，鸭少喂一

点，煮酒熬糖虽消耗粮食，但也是社会上一种需要，缺粮区乡应劝其节约，必要时也限制。当岳北女界联合会负责人李淑宏发言时，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你是白果的，你们那里妇女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敢于成群结队破天荒到祠堂去吃冬至酒，把族长老官子吓坏了，长妇女的志气，灭土豪劣绅的威风，好得很！”在两个班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又作了令人鼓舞的讲话。他开始说：“我这次回湖南，在长沙出席了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与省里的同志和各地来的代表见了面。月初，从长沙到湘潭经湘乡来到你们衡山，特别是在乡下走了一遍，我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起来了，而且组织起来了。你们在四乡造反，把那班吃人的野兽——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打得落花流水，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你们的一切革命举动都是对的，没有你们这一切举动，就没有革命，你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做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你们不但使北伐军顺利地通过湖南直下武汉，而且正在挖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场推翻封建势力的大革命，你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完全支持和拥护。我想，凡是革命的同志，只要看到了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也都应该是支持拥护的。我过去在城里所听到的和今天到乡下所看到的完全是两样。那些闭着眼睛指责你们的人都是在替土豪劣绅说话。你们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动，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倒希望那些愿意革命的人都能到农村来看一看。现在有这么一种人，既不愿屈尊下乡，偏偏要在城里乱说。我这次回到城里后，就要将在乡下看到和听到的亘古未有的奇闻大肆宣传，讲给那些不愿意来看和虽然愿意但又不能来看的人听。”毛泽东同志接着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岳北农工会与广东海陆丰齐名，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

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在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也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但我们不要以为赵恒惕、叶开鑫被赶走了，大的土豪劣绅也都逃跑了，就万事大吉，要防止他们卷土重来。我们都要组织起来。象你们衡山一样，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农会组织，有了组织，还要有自己的武装，就如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想跑跑不掉，想来来不了。”

毛泽东同志在衡山乡下考察农运时，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元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偕同随行人员走上白果桥头，迎面来了一大队人。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押着一个戴高帽子的劣绅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队农民梭镖队，后面则是由学校师生组成的宣传队。当毛泽东同志看到儿童团喝令劣绅自喊罪状时，很高兴地向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好不好？大家笑着回答：好！这时桥头上聚集的人也多了。便有一位宣传队员踏上自带的板凳，宣传劣绅所犯的罪行，毛泽东同志背靠着桥头石栏杆，凝神细听。频频点头。他又问观众道：你们看怎么样？观众都说：这家伙也有今天，好得很！毛泽东同志伸出手摸着儿童团的头顶说：“是呀，好得很！”

在区农会负责人赵国臣同志陪同下，毛泽东同志来到刘氏宗祠——岳北纠察队总部（这里早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农工会时就建立了纠察队，那时参加农工会的包括潮、宗、宇三个字号的农民和工人，在白果设立纠察总队部。后来，由于成立区乡自治机构，区乡范围缩小，岳北区农协实际上就只辖潮字一个字号，大约是18—19个区）。区农协按规定只设农民自卫军大队部，岳北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只设大队部，因为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都各在县城设立了总队部。但是岳北农工组织由于历史传统没有分开，人家仍习惯

称大队为总队部。当毛泽东同志走进总队部时，正在率领队员擦武器的值星分队长便呼“立正”，表示致敬。毛泽东同志不断挥手致意，并接连说：同志们辛苦了！赵国臣同志指着前来迎接的大队副说，请你向毛委员报告吧。毛泽东同志很亲切地说：“我是来看看各位的。”接着就步入大堂。大堂两侧都排着各种武器，整齐有序。毛泽东同志对每种武器都有细察看，看到梭镖时，他取下一枝用手抚摸着说：“你们不要小看了它，土豪劣绅看到它就发抖。要是没有它，刚才桥头上的土豪劣绅就不会低头认罪。”走到后堂，毛泽东同志看到自卫队员在用油布擦枪，便高兴地说：

“你们还有快枪啊！”队副说：“这是从赵桂生家夺来的。”一位班长从木盒子里提出一枝短枪说：“我们还有这个买卖！”毛泽东同志笑着接过来，说：“这个买卖也要拿在我们工人和农民手里才靠得住呀！”这时队员纷纷围拢来，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问了操练，问了执行任务，还问了生活情况，赵国臣同志请毛委员到队部办公室听了领队同志的汇报，毛泽东同志表示很满意。

这天，毛泽东同志在赵芳三公祠听了岳北女界联合会秘书朱棣棠的汇报。赵国臣的爱人刘淑清陪同朱棣棠来见毛委员，毛泽东同志立即站起来，并招呼她们在桌旁坐下。朱棣棠还是恭谨地站着，毛泽东同志一再请她坐下来谈，结果还是刘淑清将她拉在一起坐下，并说：“八姑娘（指会长李淑宏）到县里去了，你是代表，就代表我们向省里委员报告吧。”毛泽东同志说：请你随便谈。朱棣棠同志便把成立女界联合会以来，如何领导岳北妇女谋解放，放脚、剪发、反对坐花轿、反对拜送子娘娘，反对恶姑磨媳妇，以及参加宣传、募捐、慰劳，斗土豪劣绅等情况都谈了一下。朱当时不过十八、九岁，汇报时有时坐着，有时站起来，说话象

放连珠炮一样。陪同人员怕毛委员不便记，要求她讲慢一点，毛泽东同志总是摆手，说不要干扰她，让她任情地说。特别是当朱棣棠汇报到先年冬至那天，岳北女界联合会组织白果一带妇女分别蜂拥到赵、周、李、廖各氏祠堂去吃冬至酒的情况时，她手舞足蹈，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同志这时也禁不住停下笔来，聚精会神地听，并不断地翘起大拇指说：“你们做得好，好得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写道：“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就是指这件事。长期来，封建反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支配和压迫着劳动妇女，好似四条铁链套在她们的身上，岳北祠堂多，每姓有总祠，分房有分祠，支房有支祠，随着子孙繁衍，各房分、支祠日益增多。所谓宗法族规，名目也不胜枚举。各姓祠堂都有禁妇女入内参加祭祀的规定，寡妇甚至不准在祠堂门前经过，走路都要绕道。早在一九二三年岳北农工会成立时，就有一批劳动妇女积极参加了斗争。农工会于这年冬被赵恒惕派大队反动武装镇压，刘东轩、谢怀德等领导骨干遭到拘捕，组织受到摧残。积极分子中的男性青壮年大都被迫逃往安源、水口山一带避难，但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却多潜伏了下来，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周淑良（刘东轩的爱人）和李伦辉（周树屏的爱人）随同周树屏、赵国臣、李宏初等分别从水口山和安源回来，于一九二四年冬开始宣传、串联、发动，一九二五年春，先后重建党团组织，妇女中有李淑宏、刘淑清、朱棣棠、周文英等十余人先后参加了党团组织。一九二六年三月，赵恒惕垮台，以白果为中心的岳北农工组织和妇女组织恢复公开活动，开展各种斗争。这年冬初，正式成立岳北女界联合会，并决定在冬至那天利用各姓祠堂开宴祭祖的机会举行庆祝大会。白果一带来不及逃

跑的土豪劣绅，虽在平时已不敢露面，但当此冬至祭祖之日，他们却想利用宗族团聚窥察风向。想不到平时被他们瞧不起的“堂客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这些穿着长袍马褂的族尊老爷们都吓呆了，有的强作笑颜，说什么“现在是委员世界，妇女委员理当到祠堂来参加祭祖”。有的看来势不对，便借故从侧门逃之夭夭。结果只剩下祠产的管事人，为了报销一年开支，不得不留下陪着妇女们入席进餐。照往昔祠堂族规，祠产主管人应在冬至这一天将全年经管祠产帐目清册，用茶盘捧送到坐上席的族尊老爷面前，呈请当场核销。坐上席的族长心中有数，照例是说：“把你为是。”这样就算报销完结。今年是妇女委员坐上席，管祠产的经管人也照例送上四柱清册请核销。可是委员们与族长不同，说要开仓查数，群众也你一咀，他一舌，都说要查数，经管人逼得无法，只得打开天字第一号储粮仓。不看犹可。一看就使大家轰动起来了，清册上明明写着存谷二百五十石，但里面却颗粒无存。委员们追问，经管人呆若木鸡，手足打颤，说不出半句话来。顿时，群情鼎沸，接着清查二号、三号，地字一号、二号、三号、玄字一、二、三号，黄字一、二、三号，各个字号仓里大都是有数而无谷，个别仓里存有少量谷子，也与帐数相差悬殊。妇女委员们立即派人去报告区农协委员长。赵国臣同志亲自来盘查。原来这位平时被称为“好好先生”的经管人，竟把今年应收进储存的谷子，一部分借给米商做投机倒把生意，一部分寄存在地主家生息，还有一部分去向不明。区农协立即决定成立清帐委员会，清查所有祠产、积谷及公产，清查结果，各姓总祠所管祠产、积谷，都有严重的侵吞、贪污、放债、走私、舞弊情况。有的不但账目不清，甚至仓库封条上明明写的存谷，实际上则暗藏武器弹药。经过清算追查，区乡农会办合作社、办农民学校等事业所需经费，都获得了解

决。过后，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但在经济上追回了土豪劣绅侵吞的款子，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垮了他们的威风，使群众都知道豪劣的卑恶，这不是好得很吗？”

毛泽东同志在岳北着重了解农会工作情况，除在区乡农协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并走访一些农民外，还召集原岳北农工会老会员座谈回忆岳北农工会的斗争情况，参观了农工会旧址——刘捷三公祠，访问了烈士的遗属。毛泽东同志在赵国臣同志陪同下来到寄居白果附近的一位烈士母亲家里，步入大门，就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慌忙出来迎接。她听说是省里来的委员，泪水簌簌而下。她边用袖襟拭着自己的眼泪，边拂拭凳上的灰尘，回头仰望着身材高高的毛委员，连声说：“请坐，请坐！”接着就忙这忙那，拿茶碗，煮鸡蛋……。毛泽东同志俯身移着凳子，扶她坐下，说：

“我是来看看你老人家的。”这时老太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断用手抹拭泪花，毛泽东同志问她家里的情况，她只说儿子当年是怎样被“勇拐子”打死在新桥的，连尸都不准收埋，破房子也被烧了，一家人东藏西躲，好比被赶散的鳧鸭一样，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再三安慰，又感慨地回忆岳北农工会的斗争历程。当大家起身告辞时，老太太紧紧牵着毛委员的衣襟不放，手颤动着想说什么，又讲不出。热泪盈眶地拿出四只煮熟了的鸡蛋往毛泽东同志手里放，毛泽东同志推辞说：“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你老人家留着自己吃吧。”当时大家都很感动，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同志出了大门，一再劝她不要送。走过一排田垅，彼此相隔很远了，她仍站在那里，遥望着毛委员一行，不断地用袖襟拭着双眼。

访问岳北农工会的旧址时，毛泽东同志不断用手抚摸着自已深厚的头发。我们知道毛委员在考虑问题时，总是习惯用手摸梳

着头发。当他用左手叉腰，便是将要发表议论，他这时尚在沉思，随行人员便提出问题了：为什么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一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革命的要求；一是我们当时鉴于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及铁道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运动的罪魁，他又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了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我在离开湖南之前，从水口山和安源分别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象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栽到铁扇公主的肚里闹腾起来，就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斗争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

在归途中，毛泽东同志边走边讲岳北农工会斗争的重要意义及对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并指示我们要表彰先烈，认真处理善后，安排好烈士遗属的生活。毛委员离开衡山前，在地委再度重申了这一指示。随后省委也发出通知。衡山地委遵照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由向钧同志亲自偕同周树屏同志赴岳北处理善后，于二七年春节过后将周德二、赵丙炎、廖方丙、李玉邕四烈士遗骸转移至县城安葬，并先后于白果和县城举行有十余万人参加的盛大追悼会。因事先已公布于省内外，故广东、江西、湖北等省都派了代表前来悼念并送了挽幅。当时岳北农民要求将关押在衡山县监狱里的镇压农工会的刽子手赵桂生拿出来活祭四烈士。衡山县知事陈晖元暗地勾结国民党县党部右派将赵犯解送至长沙。激起

到会群众的愤怒。大会勒令县知事披麻带孝去祭奠烈士，并以大会名义电请省特别法庭立即判处赵桂生死刑。

毛泽东同志搞调查，每天得到的材料总是当天整理完毕，在严寒的岳北山区，常常工作到深夜。随行人员劝他休息，他总是说，今天事，今天毕。在整理材料中，他常提出问题，征求陪同人员的意见，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总要将地委及县、区、乡农会的措施和执行情况探明究竟，有时我们也不能回答，因为有些事情并不是由上而下布置的，而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如：令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团，打轿子，反对恶姑磨媳等等。总之，过去压迫过人的，今天就应该受到被压迫者的惩罚。惩罚压迫者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其中有的牵涉到劳动人民本身的利益。拿打轿子来说，农村抬轿的多半是雇农，不抬轿，可以做别的；在城镇设有轿行，抬轿的都是专业轿工，不抬轿就失业。又如恶姑磨媳，农村各阶层都有，一般是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遇到这些问题，总是先征求各级负实际责任的同志的意见，再和大家分析研究，有时介绍别的地方的情况提供参考。开调查讨论会时，毛泽东同志常用钢笔在英文练习本上做笔记。在旅途中调查情况时，常用剩下的香烟包装纸反面做记录。写满后，一张张用小铁夹夹起来，便成一个小本本。一九二七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在衡山地委整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材料时，用墨笔誊写在当时中学生用的作文本上，在衡山曾留下一些零星的原始记录纸，可惜在马日事变中散失了。

毛泽东同志于临行的先天晚上，一直在整理当地地委讨论会上的材料和准备向湘区委汇报的提纲。鸡叫了，向钧同志请毛委员休息，并要求在衡山多停留一天，一起谈谈家常。我和贺尔康也表示了同样的希望。贺说：老师来了，弟子尚未及招待。毛泽

东同志很幽默地对我们说：“素我就素我，过激太过激了。你们两位亦工亦农，又各握衡山半边天，是素我的哼哈二将。戏还有的唱，家常留待以后再叙吧。”（向钧同志别号素我，是杨开慧同志的亲表弟，自幼常相往来，受毛泽东同志的教益甚深。贺尔康同志化名“过激”，他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和广东农运讲习所学习，是毛泽东同志的学生。衡山地委当时规定我和贺尔康同志的分工是：我负责湘江西岸的朝、宗、宇、海、九五个字号，贺负责河东的十二个字号，）这时办公室内的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湘江上的西北风不断从窗缝里吹进来。毛泽东同志把向钧同志为他准备的火箱提到桌上来让我们烘手。他自己站起来擦擦双手，做了一遍八段锦，便又继续伏案工作。邻鸡鸣第二遍了，毛泽东同志开始清理随身带的黑色纹皮提包（内装文件材料）、白竹布做的包袱（内放换洗的内衣等）及雨具。皮包、包袱、雨伞，这三件不论旅途远近，毛泽东同志总是亲自携带。有时随行人员要代他拿，他随即又接回去。布包袱也常是毛泽东同志睡觉的枕头，皮包则日夜随带在身旁、雨具也常摆在床头前面角落里。康王庙面临湘江，毛泽东同志住在向钧同志房里，床上的铺盖还是向钧同志在岳云中学读书时的旧棉被。木床板上的稻草也铺得很薄。向钧同志耽心他受凉，从别的同志床上抽一床被来给他加盖，可是被毛泽东同志一再拒绝。他说：“我有布棉袍压在上面就够了。”其实他当时穿的青布棉袍也不过两斤重，何况已经陈旧了。

一九二七年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由衡山乘小火轮顺江而下回到长沙，立即向湘区委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在省党校、团体各作了一次报告。他于元月底赴醴陵、长沙二县陆续考察。二月五日重返区委，又作了一次报告，建议区委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过去在农运政策上的一些错误。随即在望麓园综合整理考察湖

南农运材料，二月十二日由长沙乘火车返武昌，十六日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概述视察经过，并对党在当时农运政策上和某些具体问题处置上的错误，提出十三点纠正意见。接着在武昌都府堤41号（即现在的毛主席旧居）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要求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可是陈独秀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三月中旬登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部分，便被陈独秀所阻止。但湖南区委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立即作了全面检查，并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错误的报告。省农民协会遵照区委指示对各县农协发出《省字第六四二号训令》，提出关于农协的七条办法，纠正过去所发的不适当指示，肯定农民在农村的一切革命行动，号召全省农民进一步开展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斗争。湘区委从三月五日起在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分期登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全文。《中国青年》亦于三月十八日起全文刊登这篇光辉著作。这时在湖南各地党组织举办的党团员训练班、工运训练班、农运讲习所、妇运训练班，大都翻印了《报告》作为主要教材。有的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合编为讲义，省级各类训练班也分别用铅印或油印翻印成单行本。由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革命路线得到普遍深入的传播，进一步武装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把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的匆匆来去

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回湖南是紧接在“马日事变”发生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何键等新军阀

已相继挥起了屠刀，各地反动派也蠢蠢欲动，而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味让步投降，对群众的革命斗争拼命压制和反对，国民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挽救危局，保全湖南这块革命力量比较雄厚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主动要求到湖南去工作。陈独秀为了排除其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障碍，却准备把他调往远离革命中心的四川。这一安排遭到中央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都认为湖南的局势只有靠润之同志去收拾，于是毛泽东同志才得以回到湖南，再度担任省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于六月中旬冒着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白色恐怖回到湖南。首先看到的是长沙反动派颁发的通缉令，捉拿前省委各负责人；每日有无数革命群众被害，横尸街头。革命向何处去？怎样挽狂澜于既倒？是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未曾停留，即奔赴湘潭、株洲，先后与柳直荀等同志会晤，了解湖南的具体情况，并沿途视察工农武装，召集坚持斗争的负责干部会商。在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组织反攻的武装斗争计划。毛泽东同志一行数人来到当时尚完全控制在我党手中的衡山县城。

六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同志偕同柳直荀等同志由贺尔康同志陪同来到康王庙。当时在康王庙地委的办公室住宿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地委书记向钧从四月中旬赴长沙，下旬到武汉出席五大，因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接连发生，交通受阻，此时尚未回来，由我代理他的职务。主管组织的易克勋和团委书记张福田亦于“马变”消息传来后，迁出分散居住。毛泽东同志一走进办公室，便在临江窗前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一月份他来衡山考察时就常坐这个地方），同时招呼同来的同志坐。我还没有敬茶，他便问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部署情况及县知事、县党

部的动态。我和贺尔康详细汇报了衡山县各方面的情况。在共进早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边吃饭，边沉思，看起来比上次来考察时要消瘦些，双眼带着红丝，一望就知道是睡眠不足。他在吃饭的过程中也时常提问，讲话有点儿带咳。

当天，柳直荀同志对大家讲了“马日事变”的经过和反攻长沙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向我们作了详细指示。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分析了蒋介石公开叛变后国内局势的演变，特别是两湖形势的发展及国民革命阵营的分化。他说：“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化，这是必然现象，问题就在我们党如何重新组织阶级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以农民普遍要求分配土地为例，说明这个道理。第二，对于“马日事变”的性质和工农武装围攻长沙的失败，我们应有的认识和应当吸取的教训。他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把“马日事变”看成是长沙一个地方性的偶然事件，应认清这是“赣州事件”、“上海事件”的继续，是国民党内反革命派蓄谋已久、全面叛变革命的一个行动，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的“马日事变”在各地发生。第三，今后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很严肃地对在坐的同志说：今天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派员来调查、平乱。他们不是派了周斓来了吗？来的人都是带着屠刀来的，不带屠刀就不让进来。我们怎么办呢？是束手待擒，引颈待戮，还是以刀对刀，以枪对枪呢？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踏着先烈的血迹勇敢地战斗！他又沉痛地说：过去，我们没有拿到更多的枪杆子，已经吃了亏，今后应想尽一切办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杆子，交给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兄弟背着，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农稳坐江山。

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了一个用武装保卫革命的第二次反攻计

划，大体安排是：各地的工农武装迅速集中，控制县城。要求衡山抽调武装到河东去，向攸县、醴陵方向靠拢，问我和贺尔康同志有把握否。我们都回答有把握。他进一步问我们有几分把握，我们却不敢肯定回答了。他又反复问纠察队和自卫军的军政素质，部队党员人数，武器情况，然后，谆谆告诫说：我们若不迅速集中革命力量，给叛变敌人以打击，那么自己就有被各地的许克祥吃掉的危险。他针对我们当时所提的问题，很坚定地说：县知事不能合作，应该当机立断；警察所长反动，就得先下手，特别是对“左社”分子更不应讲客气。这时，他又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我们与老虎相处，要向老虎谋皮，就得先打死老虎，否则自己不但谋不到皮，还有被老虎吃掉的危险。

正当毛泽东同志进行周密的部署，准备发布动员令的时候，陈独秀在武汉得到消息，接连发来密札函电，催促他回武汉；同时直接派员到各地方委员会，三令五申，不准工农武装与驻军发生冲突；并以“保存力量”为理由，要求各级干部隐蔽一个时期，责令工农武装“化整为零”，各安生业。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干扰、破坏，从此成千成万的人头落地，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热血染红了三湘七泽。

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被迫离开湖南，返回武昌，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毛泽东同志于六月下旬离开血雨腥风的湖南，间道重返武汉，仍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武汉这时也是天空乌云滚滚，敌人磨刀霍霍。而陈独秀等仍在继续推行他们的投降路线，这就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

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搜捕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宁汉蒋汪两股反动势力实行合流，国共分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至此彻底失败。为了拯救危局，检讨教训，党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组织革命力量，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同志回湖南负责组织领导两湖秋收起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便偕杨开慧同志一道回到湖南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边一间房子里。

我是七月间奉向钧同志的指示从衡山赴长沙向临时省委汇报衡山地委的工作情况的。因宝庆地方党组织被叛军陈光中破坏，临时省委负责人知道我是宝庆人，便派我去宝庆调查联系，并重建党的组织。八月中旬，我在宝庆接到省委通知，令我赴长沙汇报工作。我步行到湘潭（那时潭宝路尚未通车），再乘小火轮至长沙。走到省委机关沈家大屋，适贺尔康同志夫妇住在省委。我们分别不过一个多月光景，就好象过了几年一样。他叫爱人李静搬到楼下女炊事员房里去，强留我跟他住在一起。我说：“毛委员又来了，你陪我去看看他吧！”贺说：“你莫急，他这几日很忙，这时候又出去了，反正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的”。住在沈家大屋省委机关的同志，大多是我们熟悉的。从同志们的叙谈中，得悉毛委员于八月中旬回到长沙后，即在积极进行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从十八日起召开改组后的新省委委员会议，毛委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代表政治局向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亲自主持讨论和制订秋收暴动计划。在讨论时，新省委书记彭公达曾提出一个所谓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主张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北以岳阳为中心，湘西

南以宝庆为中心，全省普遍发动暴动。这也是当时中央的意见，但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经过详细调查以后，摒弃了这种不顾主观条件、分散使用力量的作法，主张选择敌人力量薄弱、我们群众基础好、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集中力量，发动武装暴动，其余各地只虚张声势，准备支援力量。

第二天上午，我在沈家大屋谢老住的房里见到了毛委员。他一见面便说：“你迟到了！”贺尔康为我解释，说我接到通知较迟。毛泽东同志问我宝庆的情况如何，我作了汇报。当我汇报东乡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尹伊重率部叛变，并惨杀农运领导干部刘惊涛等八位同志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沉痛地说：这也是机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刘惊涛同志是广东农讲所毕业的，回湖南被派到宝庆担任农运特派员，素为毛泽东同志所器重。我当时曾问毛委员：“您为什么又来了？”他说：“老头子（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习惯称呼）说，湖南问题弄得这样糟，要我负责。现在我就来负这个责。”我又问：“老头子为什么不干了？”毛泽东同志很风趣地说：“现在连他的儿子也反对他了（指陈延年同志在大会上当面批评陈独秀）。”此时谢老用手捋着胡须笑，逗得大家都笑了。

我由于来迟了，没有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八·七会议”的传达，只在省委机关看到中央临时政治局所印发的小册子——宣传纲要、四省暴动计划大纲及告全党党员书等文件，还从夏明翰同志处得知南昌暴动的一些情况。省委机关和各地来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传达和指示后，个个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最后省委多数人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案。准备以长沙为中心，在湘赣边境的安源、醴陵、浏阳、平江和湘潭、岳阳等地发动秋收暴动，当时为照顾少数领导人的意见，也同意在湘南和湘西有

条件的地方发动暴动，以牵制敌人，其他地方则普遍用标语、传单进行宣传鼓动，造成声势，扰乱敌人部署，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在讨论组织暴动的领导机构时，决议在省委领导下设两套指挥机构：一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各武装部队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原定易礼容为书记，因易赴衡阳，改以彭公达为书记，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为委员；并规定前委委员均须随军行动，所到之处，当地党组织均应接受前委领导，关于地方党组织的重建问题，会议决定在衡阳、常德、宝庆、岳阳分别建立淮南、湘西、湘西南、湘北（后改为湘鄂赣边区）特委，废除原各县地方委员会名称；县根据情况分别成立特区委或支部，会议还讨论了暴动中如何没收地主土地，惩办土豪劣绅、恢复农协组织及建立城乡政权问题。在讨论政权建设时，有人主张用苏维埃名义，有的主张用革命委员会名义，最后照毛委员的意见用革命委员会名义。至于各地方党组织发传单、贴标语，大多是用行动委员会名义，也有用暴动委员会名义的。

我到长沙之前，新省委的会议是在沈家大屋开的。我到沈家大屋之后，省委开会，就没有一定场所，也没有一定时间。在省委机关开过，在城外朱家花园开过，在麻园岭苏联领事馆也开过。

一天晚上，向钧同志拿着一包东西，约我一道到毛委员住所去。走上台阶，看到开慧同志正在收拾行装，李静同志也在忙着帮她拣零碎东西。向钧同志问：“霞姐明天就走吗？”开慧同志说：“是。你表哥要我先回板仓。”向钧随即将带来的一包东西交给开慧，请代带回家。我们正在谈话，忽然一位魁伟的军官迈步来到天井边，并向开慧住房走来，后面还跟着一位夹手提包的勤务兵，我不禁一惊。再仔细看时，原来是毛委员。他走进房，脱了军帽，开慧递一条毛巾给他揩汗，提皮包的“勤务兵”跟进来

将皮包交给开慧，原来他就是毛福轩同志。我曾听贺尔康说，毛委员最会化装，化装什么人就象什么人。这次他佩带着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符号，还随身带有护照。当我随向钧同志向毛委员告别时，他说：“你们也应准备走了，这里不能久住了”。

我原以为到宝庆是临时任务，这次不打算再回去。但彭公达同志又确定我回宝庆担任特区委书记，负责重建党组织的任务。主管省委宣传工作的罗章龙同志托贺尔康转交我一批宣传品。我便于八月底赴宝庆。接着省委又派贺旭和朱舜华两位同志（二人都是从水口山调来的）来宝庆筹建湘西南特委，并指定贺旭为特委书记，我任特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后来向钧同志负责省委组织工作。曾两次来宝庆传达上级指示。从他那里获悉，毛泽东同志于八月底偕向钧、毛福轩、庞叔侃等赴株洲，九月初在株洲召开会议，进行传达部署后，就只身经醴陵赴安源，随后进军井冈山，毛福轩同志留在株萍路配合醴陵邓乾元同志组织武装力量，向钧同志负责湘潭和衡潭边境武装力量的部署和领导，庞叔侃同志担任宁乡、湘乡、湘潭的发动组织工作，易礼容同志随后被派赴衡阳，夏明翰、贺尔康同志留在长沙，贺兼任郊区特委书记，负责组织革命工农群众破坏铁道桥梁，长沙暴动是由彭公达负责指挥。那时马尔里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九月下旬任弼时同志奉中央命令来湖南再度改组省委，马名义上仍是书记，但实际工作多由彭公达负责。冬初王一飞同志来任省委书记，马不知去向。

毛主席这次回湖南，亲自发动，领导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九七九年八月

（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

杜 修 经

一、关于湖南省委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五年春，我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湖南是封建军阀赵恒惕统治的地盘，控制很严。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很大。我在《中国青年》、《向导》等刊物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宣传、讲演、游行示威活动。一九二五年四月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通过驱赶兑泽中学反动校长的斗争，经郭亮、陈佑魁的介绍，这年冬天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党派我担任长沙市学联总务，下半年派我担任铜官特别党支部书记。我到铜官以后，湘区党委又指示：将铜官特别支部改组为地方党委，由我担任书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书记是李维汉，郭亮管工运，夏曦管民运，兼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易礼容管农运，曹典琦搞宣传。曹原是《通俗报》的编辑，是当时公开的共产党员之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已为北伐军占领，工农革命运动高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同志应邀到会，作了重要报告，给湖南农民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使农村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为了适应大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湘区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初，正式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各县的特别支部或地

方委员会，改名为县委。改名后的省委书记仍然是李维汉，省委成员没有变。这个班子，一直干到大革命失败。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李济深在广东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夏斗寅在武汉地区发动了“五·一七”叛乱。在国民党逐渐叛变革命，反革命势力日益嚣张的情况下，湖南军阀何键指令其部属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五·二一”反革命叛乱（即“马日事变”），湖南省委遭到了破坏。随后，华容县的土豪劣绅也跟着兴妖作乱。当时我是华容县委书记。我们等候省委的指示，一直没有等着。为了请示省委，研究对策，我在六、七月间回到长沙。这时候的省委书记是毛泽东同志，但他不在长沙。据省委接待我的同志说，他已到平、浏一带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去了。省委的一些老人如郭亮、夏曦都不见了。

我在长沙的一个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大约是八月初，从敌人报纸上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省委随即派我去南县，担任南（县）、华（容）、安（乡）特委书记。其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恢复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组织，重新聚集革命力量，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我在南县，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工作，党组织得到恢复，工农革命力量部分地组织起来，但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好行动。于是我不得不于十、十一月间，再次回到长沙，向省委汇报请示。我见到了省委书记王一飞，还有管组织的林蔚，管宣传的任卓宣，管军事的颜昌颐（中央军委派来的）。

十二月底，省委指示年关暴动，长沙首先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省委又遭到了一次破坏。省委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敌人逮捕，损失很大。王一飞、林蔚两同志牺牲。任卓宣等六人，在年三十夜晚也被枪杀。但任卓宣没有被打死，被一个

吸鸦片烟的人救出，省委把他送到湘雅医院治伤，后来被叛徒蔡增准出卖，再次被捕，随即叛变，以后改名叶青，成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御用文人。

一九二八年春节过后，省委决定将我调任醴陵县委书记。跟我接头的是杨开明。我没有向他打听省委的情况，就去醴陵了。由于醴陵的白色恐怖严重，我无法在醴陵立足开展工作。省委要我住到安源，与安源市委和湘东特委接上关系，并指派我担任湘东特委委员（滕代远是书记）。随后，中央特派员林仲丹、贺昌也到了安源，湖南省委就从长沙迁到安源，省委书记改由廖保庭担任。

八月，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湖南军阀何键派一个师的兵力，将安源团团围住，大肆搜、捕、杀，搞了三天三夜，妄图彻底摧毁湖南省委。在敌人的包围中，林仲丹、贺昌和省委秘书长张××（湘潭人，忘其名），先后冲出重围转移出来，省委书记廖保庭和其他负责人没有消息。省委遭到破坏后，到年底才在上海重建。

在上海重建的湖南省委，书记是袁迪卿，化名胡复生，他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我当时也转到了上海。袁迪卿找到我以后，要我参加省委会议。会上，长江局书记李维汉正式宣布我参加省委。我往床上一躺，说，我想休息一下。李维汉说：“你的老毛病又来了。在湖南时，党派你去井冈山，你两次都没有走过去，省委才向中央上报，把你的省委委员给撤了的”。他这一批评，我只好接受任命。会后，省委派我回湖南寻找和恢复党的组织。我从上海坐船，到达湖北宜昌，找到鄂西特委周逸群，然后转到湖南，经常德、益阳等地，找到了一些党的关系，即返回上海向省委汇报。大约在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湖南省委已从上

海迁到武汉。我又从上海赶到武汉。此时的省委书记仍是袁迪卿，秘书长是张学琅。在省委工作的有刘革非、陶尧夫、谭牛山等。这时，我已是省委常委了。九月，省委决定派我去贺龙领导的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我即离开武汉，沿途建立交通关系，经津市回到慈利县老家。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朱疤子（慈利地方土匪头子）捉去了，我在老家留住了一段时期。省委知道我没有去贺龙部队，来信催我说：若去不成，即回省委。于是，我赶紧筹措路费，准备回省委。我还没起程，从敌人报纸上看到，省委又被破坏了。陶尧夫、谭牛山等同志牺牲，其余的人情况不明。一九三〇年春，温练之（住石门县仙阳的地下党员）写信告诉我：刘革非已从他那里去贺龙部队，要我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认为革非已去，自己就可以不去，便没有去了。从此，我就与省委失去了联系。

二、华容县委和南华安特委

在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下进行的北伐战争，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到十月攻下武昌城，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光复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迅速地从珠江三角洲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一九二七年正月间，省委派我去华容县担任党的特别支部书记，并负责组成县委。我去之前，华容县的工作在特支书记蔡协民领导下，是很有成绩的。党员人数虽不多，但素质比较好。我去的时候，工会、农会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很有力量。我到华容后，蔡协民将工作移交给我就走了。我随即召开全县的党员大会，宣布改特支为县委，选举县委负责人，由我任县委书记，徐履仁任宣传，欧阳悟任民运（又

称“民校”），组织、工运、农运、青年、妇女等工作部门都有人负责。团省委还派来徐宗圣管县里团的工作。在这以前，华容党组织已指派何坤（即何长江）担任县团防局长，廖一贯担任县农协委员长。

县委成立后，主要作了三件事。第一件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工会、农会、青年、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第二件是开展打土豪、除恶霸的斗争；第三件是开展反封建礼教和解放妇女的斗争。这三件事情一做，整个华容县的工作都带动起来了，连妇女儿童都发动起来了，出现了一派大好的形势。但是，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比如在打土豪、除恶霸斗争中，我们就错误地处理了注滋口镇郊的农民斗争。

注滋口镇是华容县水陆交通较发达的一个市镇，镇上的工商业大多是由乡村的豪绅地主经营的。打土豪、除恶霸的深入发展，必然引起这些地主兼工商业者的极端仇视。他们纷纷将农村的财产转移到镇上，人也逃到镇上。镇郊的农协委员长率领农民进镇捉拿他们，并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便说自己是工商业者，国民革命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不能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那些应该处理的东西，也应由商会和工会来处理。由于他们挑起商人与农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出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事件。消息传来，我们在县农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仔细分析的情况下，错误地断定是土匪捣乱，便派何坤带着县团防局的武装，去把镇郊农协委员长抓住枪毙了。这个错误的处理，助长了土豪劣绅的气焰，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打击了农民运动。在反对封建礼教，发动妇女起来剪发、放脚的斗争中，也出现了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的错误。

五月下旬，我们从报上看到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报上说，这个叛乱是地方性的问题，等候中央解决。华容县的一部分土豪劣绅，也乘机作乱，他们勾结土匪，从调关进攻县城。何坤知道后，没有同县委商量，就带着团防局的武装去打他们。土匪枪多人众，来势凶猛，团防局武装开始打得不好，有不少伤兵抬回县城。我知道以后，认为何坤做事鲁莽，打起仗来不给县委讲一声，以致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理。随后得知他指挥作战勇敢，自己带头冲锋，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厮杀，结果转败为胜，砍下了土匪头子的首级，班师回城，我们也就没有过多责备了。对于旧团防局的武装，一开始就没有注意进行改造，虽然有共产党员何坤当团防局长，但没有把我们的党团员派进去作骨干，也没有动员一批工农积极分子去当兵，使团防队实质上变成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成份复杂。基本是旧的团防队，终于经不起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六月初，国民党一个连从洞庭湖边的注滋口登陆，向华容县城进发。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处于优势。如果乘敌人立足未稳，立即派团防武装出击，完全可以打败进犯的敌人。但是，由于我们受了右倾思想的影响，县委开会研究，决定让敌人进来，我们撤离县城，由何坤带领团防队转移到农村去。团防队转到农村后，不少叛变了，何坤只好离开部队转到武汉参加了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防局的武装又变成了土豪劣绅反动权力的支柱。敌人进入县城后，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城郊农协委员长蔡××和一个学生当时被杀害，县委欧阳悟和彭立、韩国栋等同志逃到岳阳，随后也被敌人逮捕，工农群众的革命组织全被捣毁，党领导下的华容人民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敌人占领华容以后，派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原教育局长罗喜闻担任国民党县党部整理党务的负责人。罗喜闻过去是何坤的

好友，他的儿子是个共青团员。敌人进行大搜捕、大屠杀时，我住在他家里。在枪回家以后，我们见面的第一次谈话，就是要他莫杀我们的人，并保护欧阳悟等人的安全，他同意了；但又说欧阳悟等是在岳阳被捕的，关在岳阳监狱内，他无能为力。以后，我离开他家到了岳阳，去监狱里探望了欧阳悟、彭立和韩国栋等同志，给了每人几块钱，并告诉他们，党将尽力营救被捕的同志。可是不久，敌人就对他们下了毒手。

我回到长沙时，湖南省委是毛泽东同志在主持工作。我在省里住了一段时间，向省委汇报了华容县委的情况，等待省委安排我的工作。这时，毛泽东同志正在平、浏一带领导秋收起义，没有回来。大约在八、九月间，省委决定让我去南县，组织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并兼任书记，恢复活动。

我到南县不久，省委又先后派去刘国富任青年团特委书记，刘子刚（留苏学生）负责宣传。经过我们的一段努力，特委同南、华、安各县多数党的组织都先后建立了联系，也有没有联系上的。如华容西乡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学生，我们同他联系上了，而东乡党支部就没有联系上。特委派刘子刚去东乡，只找到何一鸣（何坤的叔伯妹妹），将她调来作机关工作。她是一个泼辣、豪爽、大方的女同志，工作得很出色。东乡其余的同志，都拉队伍打游击去了。在南县，我们除了同县城内、三仙湖等城镇的党支部取得联系以外，农村里的支部大多数也都联系上了。安乡党支部所属的党员，主要是住在县城内，联系比较容易。三县党组织恢复以后，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的地方还开展了对敌斗争。

我们在南县工作了一、二个月，省委没有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示。为了向省委请示工作，十一月间，我又从南县回到长沙。这

次我会见了省委书记王一飞。省委决定，要各地立即着手组织年关暴动。我急速赶回南县特委机关，传达省委的决定，积极进行年关暴动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在进行年关暴动的过程中，我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把从武汉学兵训练团回来的唐亚子，派到团防局当分队长，把部分工农积极分子派进去当兵。特委关于年关暴动的精神传达下去后，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中鱼口那个地方，一天晚上有个土豪打完麻将回家，路上遇着了我们的一个农协会员。这个农协会员一锄头就把那个土豪打死了，埋在当地河滩上。几天后，河水退出，沙土冲走，土豪的尸体露在外面。敌人发现后，拨开尸体一看，土豪带的怀表和几块光洋都在，反动派就断定是共产党干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不贪财的。于是，敌人就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我们也加强了戒备，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就在过年的那几天，在唐亚子家里，我们以打麻将作掩护，研究和制定了年关暴动的行动计划，决定由我负责组织和指挥中鱼口的群众，攻打当地的团防队，夺取枪支武装自己；由一位淑浦籍的同志负责组织和指挥三仙湖的群众，攻打三仙湖对面的团防中队。考虑到唐亚子是本地人，全家都住在这里，怕事发后连累他的亲属，会议决定让他暂时请假离队，由一位四川籍的同志代替几天，届时从内部策应，一举夺取这个中队的枪支。两路暴动夺枪成功后，迅速会合，拿下三仙湖警察局，进而攻打南县县城。

一切部署妥当后，一九二八年正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就分头行动。真不凑巧，在我们行动的当晚，驻三仙湖对而的团防中队的队长，命令所有的士兵整好行装，带上枪支弹药，去捉捕共产党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可急坏了那位四川籍的同志。由于他是个代理分队长，无法阻止。中队长走后，他对士兵说：“时间还早着哩，我们先睡一会儿吧。”于是，士兵们都和衣而睡了。

我们指挥的暴动群众，拿着大刀和梭镖，在半夜里摸进了团防中队的驻地。该中队驻扎在一个大院内。进了大院门，便是一块开阔的大操场。大操场后面才是团防队的宿舍。我们的同志缺乏作战经验，摸进了大院的门，就高声呼喊“冲呀！”“杀呀！”把团防兵都惊醒了。团防队的士兵冲出房子，与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我们只搞到几条枪，还伤了两个同志，被迫撤退了。中鱼口这边夺枪暴动也没有成功。这样，攻打南县县城的年关暴动，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失败了。

南华安特委领导的年关暴动失败后，我被调去醴陵。不久，特委即被破坏。刘国富同志英勇就义，年仅十四岁，团特委的组织部长周涛年纪也小，同样被杀害。当时，彭德怀同志是当地驻防军队的团长，他看到被杀的是个小孩，不胜感慨地说：“这样一个小孩是什么共产党，这是什么世道？！”

南华安特委领导的年关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深刻地教育了这个地区的人民。暴动撒下的革命火种，在我党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创建有过重要贡献的段德昌，刘革非等同志，都是党在南华安地区播下的革命种子。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后来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作“改组派”杀害了。一九六二年，贺龙同志回湖南，同我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们不是敌人打垮的，是自己人杀垮的”。贺龙同志的这个话意味深长，非常准确，对我们全党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余求校记录整理）

大革命风暴中的华容

刘 公 武

(一)

从一九二二年起，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标榜地方自治，制造“省宪”，借以维持其封建割据局面。省议会之下，各县均设置县议会，冒充民意机关，推行反动统治。向称为“华容王”的张巨卿驱使其亲外甥傅道南成立土劣集团“二西社”，操纵选举，使傅得以窃据华容县议会议长。傅当了议长以后，益发飞扬跋扈，横行乡里，路人为之侧目。他惯于勾结驻军，假协助军饷为名，擅自派捐摊款，绑架勒索，残酷搜刮，贪污中饱，恣意挥霍。他们这一伙常在张巨卿家吊堂聚赌，寻欢作乐，通宵达旦。护城官垸的堤工局，亦为这伙土劣所把持。他们征收亩捐，名为修堤，实则营私，专事吃喝玩乐。每当夏季西水陡涨，从调弦口直灌沱江，堤垸溃决，泛滥成灾。这时堤工胥士们就避而不见人了。群情愤怒，莫如之何。

在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之下，青年知识分子首先奋起反抗。曾志、高风、罗承鼎、何坤（长工）、毛遇顺、段震寰、吴让周、戴盖三等关怀家乡痛苦，在法国出刊《海外乡谈》，揭发土劣的罪行，痛诉人民的苦难。旅省学生也用同乡会的名义，不断告上状，发传单，控诉土劣鱼肉乡民的暴行，并对住在长沙

的省议员严国桢和段峨两人提出呼吁，要求促使当局减轻人民负担，但他们同县里的豪绅都是一丘之貉，对学生的呼吁自亦置若罔闻。素称滨湖鱼米之乡的古南安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火山爆发，势在必然。

(二)

一九二六年暑假，旅外学生大都陆续回县。我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五卅”运动，担任学生会的负责人，因而被视为过激分子，登报勒令退学，不准再回学校。我就留在家里，准备迎接北伐。欧阳悟这时已是共产党员，也从上海光华大学回到家里。他和我素是总角之交，从同在白鼎山读私塾起，到省立第一中学都是同学，又先后转往上海求学，从未分离，亲如兄弟，自然受其影响。我们一同商定，以设在文庙的县立第一小学为据点，进行联络活动。校长周易乾是个开明人士，给予了我们许多方便。当北伐军攻克岳阳，进至汀泗桥激战时，华容已成为空隙地带，没有驻军了。北伐军声威大震，形势骤变，土劣开始敛迹，学生深受鼓舞。经过酝酿，决定举行一次游行。某日下午，以第一小学同学为基础队伍，欧阳悟和我走在前头，抬着孙中山的画像，手执红旗，从文庙出发，一路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的歌曲，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沿街群众不断涌进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县议会进军。队伍抵达北门外县议会门前时，第一小学同学罗廉余自发地跑出行列，抢先把“华容县议会”的木牌摘下来，踩为两截，摔在地上。群众涌进大门，占据了县议会。土劣议员早已逃之夭夭，我们便把原有房屋作为群众闹革命的场所。这次行动，揭开了华容县人民进入新时期的序幕。

(三)

当北伐军进逼武汉地区，围攻武昌城时，湖南新成立的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任主席的省政府，改派嘉禾人李惠然接任华容县县长。他上任不几天，原县财产保管处处长孙少海以为有机可乘，从雨霖垸赶来县城，企图巴结钻营，死灰复燃。欧阳悟和我商量，决计不能让土劣抬头，窃据要津。他装作县政府的差役，拿着李县长的名片，前去北门外长沙会馆孙少海住所，佯称李县长请他前去县政府商办要公。孙信以为真，欣然就道，在欧阳悟引导下，一直进入县政府后厅李县长房里。我正在同李县长谈话，没有把我们的行动告诉他。当孙少海进房时，没有让他坐下，欧阳悟和我顿时板起面孔，当着李县长的面声色俱厉地痛斥他敛财作恶的罪行。他惊惶失措，还以为是李县长同我们设下的圈套，低下头，不敢狡赖。李虽感到突然，但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下令将孙拘押起来。几天以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个姓张的营长率部开进县城，我们明知这是改头换面的旧货色，亦只好表示欢迎。略事筹备后，就在北门外放羊洲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北伐军大会。除各界人士和学生外，破天荒第一次有近郊农民千余人参加。我被推为大会主席。双方致词以后，即整队出发游行，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加租加押”等口号。队伍沿堤而行，绕进东门，到了东正街管乾太（商店名）门前，突然有部分农民涌进这个店子的楼上，把罪大恶极的张巨卿揪下楼来，带上高帽子，押着游行。愤怒的群众一路将他拳打脚踢，拖到西门县政府外坪，已是奄奄一息了。张营长指挥枪兵，把他从群众中抢救出来，随即一命呜呼。张营长对群众的行动表示

不满。李县长闻讯赶到，见此情景也与之附和，同我们唱起反调来了。张巨卿的儿子张涤之以为有所凭藉，公然出面指控刘岳云（扬子岭农民协会负责人）、杨云（长沙群治法政学校学生，后参加贺龙部队，于南昌起义后牺牲）两人为主犯，要求缉拿凶手。张营长亦以打死张巨卿为“不法”，并暗中受贿，把孙少海放了。于是激起公愤，由各公法团以全县人民的名义，通电申讨张营长与李县长狼狈为奸，为土豪劣绅张目，袒护张巨卿，卖放孙少海，压制群众，阻挠革命，并控告到省政府。结果撤换了李县长，调走了张营长。这一胜利使正义大为伸张，大小土劣为之丧胆，一时销声匿迹，纷纷向外逃命。

（四）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以后，继续进行北伐，后方愈趋稳定。约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召开了国民党华容县代表大会，选出何坤、蔡协民、欧阳悟、刘公武、廖一贯、程学敬，曹国宾为执行委员，刘开国为候补委员，公推刘公武为常务委员，主持党务，欧阳悟主管工运，蔡协民主管农运，程学敬主管组织和青运，曹国宾主管宣传，何坤掌握地方武装，出任县团防局长。其中欧阳悟、蔡协民、何坤、程学敬、廖一贯都是跨党的。后来刘开国出任县立第一小学事务主任时，也加入了中共组织。县党部挂的是国民党的牌子，实际上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盟，为当时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遇事则召开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作出决定，付诸执行。公开喊出“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名义上是国民党县党部在发号施令，实际是中共在领导。当时中共华容县委会没有公开。据我所知，先是蔡协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湖南，省委派他为农运特派员到县，负责开展组织活动。

徐履仁养病在家，没有担任公开职务，实际是他负责党的工作。以后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慈利人）到县，正式担任县委书记。

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都是担任实际工作的。除张云襄、袁云雪先后担任过秘书外，没有另设工作人员。也没有固定的经费开支。所需公文纸张、印刷和灯油等零星费用，概由刘公武负责筹措；各人的生活费用概归自理；派往各区乡的农运特派员（如刘革非、熊迪、韩国栋、韩步湘，涂国钦，邓白等）来往城乡的费用，也都是各人自己设法解决的。这些人都是青年学生，尽管生活还要靠家庭负担，可是大家都是一心为革命工作，谁也没有提出过生活待遇问题。这时的县政府，由于没有人再进衙门打官司，减少了大笔收入，有时也不免陷于停炊的状态。新任的县长王斌（湘潭人）只好到县党部来请求向商会筹借经费维持开支。在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下，农、工、商等各种民众团体相继成立。廖一贯担任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岳斌（后来在福建叛变，因隙被其妻兄刘召东所杀）为县总工会主席，唐景全为县商民协会主席。只有县妇女会终因不能破除封建思想的阻力，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地方机关也进行了改组，调整了人事，除罗喜闻继续担任县教育局局长外，由周仁接任县财产保管处处长。

（五）

从民众起来活捉孙少海、打死张巨卿以后，全县震动，城乡大小土劣惶恐万状，没有来得及外逃的，都为各区、乡农民协会陆续拿获，送交县政府关押起来。这时华容农村，真正是农会的权力至高无上了。但是县议会议长傅道南这一首恶，却已逃到武汉去了，必须捉到加以惩办，才能平息民愤。欧阳悟自告奋勇，愿意只身前去武汉办理此事。他到武汉后，和武汉农民日报编辑袁

云雪多方打听到傅道南所住的旅馆，就住进和他紧邻的房间，搞清楚和他来往的是些什么人以及他活动的规律，然后报告汉口公安机关，出动警察，将傅道南、罗昌、孙伯助和白玖阶等四人一起拿获，转解到长沙投入监狱。我们经过协议，由张云襄执笔拟具这伙人在县里的劣迹和罪行，向湖南省政府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提出控诉，再由刘公武以代表身份会见审判长谢觉哉，要求对傅等严加惩处，并请求审讯时列席旁听。经多次提审，罪证确凿，最后判决傅道南、罗昌、孙伯助三人死刑，于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夕枪毙在长沙浏阳门外。除此元凶，人心大快。

接着，县里也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由欧阳悟任审判长，对在押的土豪劣绅逐一提审，核实罪行，等待作出最后判决。在举行李大钊同志追悼大会那一天上午，一万多农民游行示威，到县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枪决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形势紧迫，县党部临时召开全体执委紧急会议，与县长王斌会商作出最后决定，将劣迹昭著、罪行较大的李知社、张松青和张执中三人从监狱提出，由审判长欧阳悟在县政府公堂前坪坐堂，当着农民群众判处死刑，绑赴刑场，跟随农民队伍之后，游行到北门外放羊洲执行枪决。群众欢呼，声震云霄。正如蔡协民同志说的，“今天是老子们泥腿子、黑脚杆的天下了”。

(六)

华容农民运动以南山陈次藩、东山王勉之搞得最早。在发展过程中，东、南两乡比较先进，北、西两乡比较落后。到一九二九年年底县农民协会成立时，全县十个区都已建立农民协会，有上百个乡农民协会，会员在十万人以上，都装备有梭镖和短棍，每次出动集会，声势浩大，极为壮观。一九二七年春季，在“一切权力

归农会”的口号鼓舞下，农民运动达到了高潮，农民协会已成为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废除了苛捐杂税，禁绝了鸦片、牌赌，不准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另佃。农会的禁令谁都不敢违抗。土豪劣绅的威风扫地，除外逃的和被捉拿的以外，那怕是最小的土劣也要罚款、捐款，才能了事。在城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蔡大勋主持下，几至搞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地步，谷仓里关满了人，甚至伤害到中农的利益。要他加以改正，他也置若罔闻。于是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商讨纠正办法，提出遵守革命纪律，不准自由捉人，不准乱搞罚款。但是鞭长莫及，没有收到多大效果。

正在这个风头上，发生了注滋口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吕昆仑带领农民进入市镇自由拿人、罚款，与注市工会发生冲突，农民捣毁工会，造成商民罢市，工会负责人谭述秋等逃到县城。这一事件，经过中共华容县委研究，认为必须及时加以处理，方能维护社会秩序。当由徐履仁代表党组织同我协商，要我以县党部负责人的身份，会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廖一贯和县总工会主席杨岳斌前往注市，佯称召开会议进行调处，把事先写好了的用县长王斌名义处决吕昆仑的罪状布告，交我拿去要王县长加盖县印。我当然只能照办。我们三人到达注市的第二天上午，在小学校召集区、乡农民协会全体执行委员和商会负责人开会。先天晚上，县团防局局长何坤亲自率领枪兵一队，星夜开到罗家咀落宿，于翌晨急行军赶到注市。正在开会时，区队长欧阳洁进入会场，叫出吕昆仑，加以逮捕，立即在小学操场执行枪决。我们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布吕昆仑的罪行后，立即同何坤和部队一起撤出注市，以避免与农民发生冲突。经过这一紧急处置，事情算是平息下来了。吕昆仑原是一个“汉流”（帮会）大哥，混进农民队伍，窃据了领导

职位，称王称霸，挑起工农冲突，捣毁工会，迫害工会负责人，擅拿商民罚款，造成罢市风潮，固应加以处惩；但这种作法却很不妥当，对吕昆仑这种人，不应不教而诛，特别是在没有对农民群众进行充分的说服教育，把他们争取过来，使吕陷于孤立的情况下，不应遽作处置。事实表明，经过这一处置后三天，再派特派员刘革非前去召集农民开会，恢复农会活动时，农民都害怕参加，经过反复解说，才逐渐聚集拢来，恢复组织的正常活动。可见这一突然的惩办行动，无异直接给农民以打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助长了土劣的气焰，给他们以诬陷农民协会的口实。回想起来，这是一次盲动，教训是深刻的。

(七)

华容旅省女学生中的活动分子不多，比较知名的仅有南山的何逸民和何文灿两位。可是他们同男学生很少来往，又不住在县城，很难开展工作。我们也没有适当的同志来推动和指导妇女运动。

当时县立第一小学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女学生自动上街串门，宣传剪巴巴头。这就是华容妇女运动的开端。这件事在妇女群众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一次我回到家里，忽然一阵风似的，我的兄嫂和弟媳妇都急速的窜进房里去，把门关上。我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她颇不高兴地指责我：“还不是你们做的好事！女学生来到我家，说是你家里的人不带头剪发，谁还肯剪？就强迫她们一个个把巴巴头剪掉了，她们不好意思和你碰面，都躲进房里了。”我只好笑笑而已。

一日，一群妇女结队来到县党部请愿，要求我出来会见。她们气愤地你一嘴，我一舌的吵嚷不停。我劝他们平静下来后，一

位浑名“统领”（她有点乱搞两性关系，人们对她加此贬称）的走出来讲话，说是高×发起成立妇女协会，规定一条，要身家清白的方准入会，就是不准我们这些人加入妇女会；我们要打倒她，要加入妇女协会。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好容易说服了她们，同意回家去等待解决。那知那位高女士坚持不肯退让，说是和这伙土娼混在一起，那是多么丢人。这个僵局一直未能打开，县妇女协会也就因此没有正式成立。在农村里，有的妇女自动集合起来开会谋求解放，本应予以支持；但农民说，回到家里看着孩子们哭闹没人管，没有人烧饭吃，反对成立妇女会。由于地方偏僻落后，夫权势力大，头脑封建，操之过急是无济于事的。

（八）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到五月底，县里还只听到道路传闻，不明底细，一切仍是照常。约在六月初，我们得到警报，说是土劣李逢春、严希贤等人在湖北石首那边勾引川军杨森叛部，要来侵犯华容。我们并不认为局势如何严重，仅由何坤局长率领全部团防武装前往五田渡、调关一带部署防御。不料那天上午，突然听到从石山矶那边传来的枪声，人们奔跑相告，都以为是敌军已进到石山矶。看到人群乱窜，我也就跟蔡协民走出县党部，一口气走过了麻石里，直到大兴垸堤局屋子后面，只见蔡大勋单独坐在大树下，拿着大芭蕉扇在憩凉。我把情况告诉他，同他一起继续南奔，抵达大乘寺王家祠堂大乘农民协会的所在地，才放下心来。我同蔡协民转往附近王泽普家里去投宿。蔡大勋感到形单影只，就骑上马转回大兴垸去了。

第二天清早，我同蔡协民乘划子飘过牛屎湖，转到南县县城。过了两天遇到了徐履仁。协民约他和我在南县东堤河边的洪山庙，

商量今后行止。我们都感到这样慌忙地离开华容，有些不妥，决定一同转回县城，坚持下去。不料隔日拂晓忽被枪声惊醒，原来是反革命军队进攻南县县城。当时我住在城郊姑妈家，蔡协民和徐履仁分住别处。我家才叔和四哥带着刘开国前来与我会合，但不明蔡、徐两同志的下落，估计是被枪声所惊，匆忙中走散了。他们力促我迅速离开南县，我们就一同步行到三仙湖，雇了一只小船，晚靠南大膳，听到从岳州开过来的船家说：岳阳城里的驻军抓住了从华容逃出来的三个人，就地枪毙了。我们提高了警惕，赶清早开船驶过大洞庭，到下午远远望见君山，辨明了方向，太阳西下时，在城陵矶靠岸。我四哥很机警，嘱我和刘开国留在船上守候，他只身先进城去打听消息。天快黑了，他乘着他所熟悉的一艘本地铎子船把我们接过去，开到黄沙湾落锚。他一路叙述探得的情况，说是张巨卿的儿子张涤之守在岳阳，专门侦察从华容过来的人，密报驻军，在火车站抓住了欧阳悟、熊迪、韩国栋三人，杨岳斌临时逃脱了。因为岳阳驻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副师长兼团长周磐，以前在华容驻扎过，同张巨卿打牌吃花酒，玩得很好，为了替张报仇，立即把他们三人枪毙了。我们得知这一确信，在十分悲痛中益发警惕起来，当即设法爬上夜车，开过岳阳城，逃出虎口，到了武汉后，会到何坤，可是再没有见到蔡协民了，这时我得悉反动的湖南省政府给我下了通缉令，就偕同刘开国远走高飞去南洋了。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浏阳农民运动的片断回忆

慕容楚强

浏阳的农民运动，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的武装斗争，游击队编为红军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七月是秘密发动时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到达湖南以后是公开时期。

（一）秘密发动时期

一九二五年，浏阳北乡就以潘心源同志为首开展了党团的活动和农民运动的宣传。潘心源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学校当局怀疑他加入了共产党，借故他英文不及格，于一九二五年上学期将他开除。他回家后，就以北圣仑卓然高小学校为活动中心，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宣传农民革命。当时在北圣仑发展的党员有蒋中林、潘传九、罗为政、柳汉清、周次生、罗宗泽，罗烈、潘某以及安源矿工周克明，彭庚山等。我也是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由潘心源同志介绍在卓然学校宣誓入党的。入党后，潘交给我三个任务：一是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党团员；二是发动群众，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三是宣传减租减息。

是年九月，建立蕉溪和沙市区联合党支部，我担任支部书记（蕉沙支部），为了发动农民，党组织布置每个党员在自己所熟悉的人中找忠实可靠的贫雇农和手工业工人作对象，通过谈家常，

启发他们认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道理，然后挑选表现较好并有活动能力的积极分子，先把他们组织起来，三个人成立一个小组，选一个组长，分配他们任务，要他们去亲连亲，友串友，一串十，十串百，然后将群众组织起来，并告诉他们要严守秘密。

通过秘密的宣传和串连，我们发动了一批群众。一九二五年冬，我在蕉溪区的守约乡发展了张正初，伍元心等入党，成立了守约乡秘密农协组织，指定张正初为组长。这是我发展建立的第一个农协组织。

根据当时农民的迫切要求和觉悟水平，党确定从经济斗争入手，首先搞减租减息，增加工资，通过经济斗争，提高农民阶级斗争的积极性，然后再逐步上升到政治斗争。

这时地主阶级的威风还没有触动，他们反对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我们便组织贫雇农捆紧捆子，只交一部分租谷，拖欠一部分不交，手工业工人则打破常规，将原来按固定钱数结算工资的办法，改为按上年度的谷价折合结算工资（一九二四年底谷价每石是一元六角，到一九二五年底每石涨到两元多），如果对方坚持不肯，就拖着不结算。按浏阳当时的行规，头年没有结帐的，第二年不得另雇他人。这就给地主富农出了一道难题。

但是，农民也要雇用工匠，对手工业工人增加工资不免有抵触。我们又向农民做工作，讲解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利害一致，应该相互支持，团结起来去对付地主富农，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样做效果很好，贫雇农支持手工业工人增加工资，地主富农不得不按我们的办法行事。贫雇农和手工业工人从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惠，从而调动了他们的斗争积极性。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到一九二六年端午节的时候，我们

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大的队伍了。唐生智的部队在端午节前曾一度打到浏阳、平江一带，不久退到衡阳。军阀叶开鑫又盘据长沙。可是我们的农运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活跃起来。我们附近有个北圣仑，是一个几百人口的小镇，水陆两路都可直达长沙，是当地的物资集散市场，经济繁荣，来往人多。这里每年端午节有划龙舟的习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北圣镇的街后空坪搭了一个戏台，以放留声机唱片和吹打洋鼓洋号作号召，吸引了万把人。热闹了一阵以后，就开始进行关于农民运动的宣传。欧阳仕厚在会上大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进行斗争。他在讲到农民被剥削压迫的痛苦时痛哭流涕，许多农民也被感动得流泪了。散会时，大家喊起了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大会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确使群众振奋，敌人丧胆。叶开鑫部在北圣镇原驻有一个十五名枪兵的募兵站，就在当天入夜后悄悄地撤回长沙了。这件事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我们抓紧时机，在党员人数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的蕉溪公开成立了蕉溪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选举赵羽钦为委员长，周耘莽为副委员长，苏丙芬、厉彩尾、周除荆、慕容楚强为委员。这是北乡公开成立的第一个农协组织。

（二）公开发动 成立农协

一九二六年，大约是八月初，北伐军到达湖南，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成立，除了宣传部和组织部外，还设有农民部，易礼容任部长。经潘心源介绍，由农民部委派我和郭起为驻浏（阳）农运特派员，全衔是“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驻浏（阳）农运特派员”。后来又增加了欧阳辉为特派员。我们就名正言顺

地公开搞起农运来了。为了接洽工作的方便，每个特派员都印了名片。特派员的工资规定为每月光洋十九元。我领过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就没有领了。农会干部都是义务供职，仅由上面发给一些小册子和刊物，如《帝国主义》、《向导》、《新青年》、《二十世纪目睹之怪现象》、《共产主义ABC》、《中国青年》等，供我们学习和宣传。

一九二六年十月，在浏阳文庙大成殿召开了中共浏阳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有潘心源、张侃、张启魁、郭起、罗纳川、张启龙、苏秉芬、李鸿翼、蔡邦友、伍志芳、邵正维、于汉燮、慕容楚强等九十多人，大会由潘心源主持，省委派龚际飞出席指导，成立浏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加强各级党组织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县委又加派周思仁、王俊民、罗丰岱、罗席珍、王杰仁六个农运特派员，每个特派员都负责一、二个区的工作，既要作党的工作，又要作青年团、农会、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具体分工如下：周思仁负责北乡莲溪区，王俊民负责南乡枫林区和大瑶区，欧阳辉负责西乡枨冲区，郭起负责北乡绥和区，慕容楚强负责北乡全吉区和沙市区。

我在全吉、沙市两区积极物色培养对象，发展党员，吸收了朱芝春、朱文卿、朱增春、王初长、戴香莲、戴端来、戴少平、刘朝卿、刘心正、杨主力、孔湘汉、孔彬生等入党。九月中旬，在苗田、鸭头、洞庭滩成立了乡农民协会。根据农会章程规定，成立了三个乡农协的区就可以成立区农协，不久就召开了全吉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大会开得庄严隆重，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全吉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的横幅。两边的对联是：“解决民生，主义须尊共产；征服败类，眼前唯有拳头”，明确地提出了农民运动的方向和斗争的策略。大会选举了朱文卿为委员长，孔彬生

为组织委员，杨主力为财务委员，戴端来为宣传委员，周乃金为学务委员，还有妇女、青年委员各一人，共七人组成区农协委员会。区农协下又设立清算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该区女界联合会主任是周剑秋，委员有戴香莲、周希姜、朱同卿、朱冬梅、戴某。儿童团长是戴泰昌（大革命失败后当过党的秘密交通）。

这个时候的工作已不是个别串联，而是以点带面。到一个村就鸣锣召集群众开会，进行宣传，不仅讲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而且讲一切权力归农会，惩办不法地主、土豪劣绅，清算庙会、公堂经济，禁烟禁赌等问题。大会以后，成立村农民协会，选举几个委员并确定分工。有三个村农协的乡就成立乡农协；没有成立村农协的，由乡农协包起来；特派员和其他干部则到落后的地区去突击消灭空白。这样，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农民协会已席卷全县，从村、乡到区基本上都成立了农民协会。

我现在能够记忆的区农协委员长名单如下：东乡永和区刘正发；南乡大瑶区刘宜聪；金刚头区何文伟；西乡牯冲区宋任穷；北乡全吉区朱文卿；沙市区罗隆金；蕉溪区赵羽卿，副委员长周耘舜。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各区农协的相继成立，县农协也就诞生了。大约是八月或九月初，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罗纳川任委员长（一九二七年春节后，张培基接任），赵雨卿任副委员长。接着县总工会、县妇女联合会、青年团等组织也先后成立。县总工会委员长朱建圣，副委员长彭庚山。女界联合会主任宋杰若，副主任黄颐。有了县委和县农协的统一领导，农运工作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

(三) 成立农会后做的几件事

一、建立农民自卫军

我们根据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懂得没有武装就不能对付地主阶级的反抗，所以农会一成立就把青壮年组织起来，以梭镖、大刀为武器，成立农民自卫军。我们对团总说：现在一切权力归农会，你们的枪支没有保存的必要，应立即交归农会掌握。他们看到形势不对，只好把枪交了出来。我们把枪交到县里，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没有交枪的区，在一九二七年春节期间，县委利用当地请春酒的习惯，由县长出面请各个团总吃饭。宴会上县委负责同志讲话，说明当前的形势，一切权力都要归农会，社会治安也由农会负责维持，过去的团防武装各团无保留的必要，应一律交给农会。团总们大都唯命是听。独有西乡镇头市的团总张梅村是一个顽固派、抗拒交枪。县农协当场将他逮捕收监，后被县警备队长唐秉忠暗地释放，农协就枪毙了唐秉忠，以警效尤。

一九二七年春，县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将各区领导的革命武装集中到县里整顿，充实骨干力量，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县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浏阳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第四团队，纵队长是彭光，副纵队长彭某。第四团队队长苏先骏（后叛变），党代表徐骐，参谋长罗纳川，副官长苏秉芬，文书副官李信。县农协还筹集了一些款子，请省农协帮助购买枪支，以便充实力量。不久发生了“马日事变”，省农协来不及把枪支交给县农协，已购买的枪支全部被许克祥的队伍抢走了。到马日事变时，这支工农武装已经有了六七百人枪，后来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上井冈山武装的一部分。

二、镇压地主豪绅的破坏活动

农民运动一兴起，矛头就指向上豪劣绅、贪官污吏。他们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与农会对抗，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如造谣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还用请客吃饭、拜干亲等卑鄙手段，腐蚀拉拢农会干部为他们打掩护，甚至另立农会，和我们分庭抗礼，或者派人打入农会，篡夺领导权，如此等等。对敌人的破坏行为，我们都给予了狠狠的打击。略举几例于下：

一九二六年九月中旬，北乡沙市区东塘乡成立农会的时候，县知事罗润物，地主汪仙桂等唆使一个叫罗执圭的破落户，利用宗族关系，召集他们亲近支系的少数群众开会，成立所谓“农民协会”。罗执圭在会上宣称：“他们（指我们农协）成立农会，我们也成立农会，我们成立农会是应付南兵（指北伐军）的。现在时局动荡不定，谁管天下还说不定。我们以前吃过南北战争的亏，记忆犹新，因此不要得罪人，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所以我们农会不搞减租减息，不搞清算斗争。”我们听到后，立即发动群众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并把罗执圭带到我们的会场，要他当众坦白交代，他表示愿意悔改。我们还惩办了幕后指使者。这样就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金刚区的农民协会，在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长李达等人的操纵下，让大地主的儿子何文伟窃据了委员长的职务，使农协成为地主阶级的防空洞。县委先后派罗丰岱、罗席珍、朱建圣三个特派员去整顿该区农协组织，都没解决问题。一九二七年春节后，县委调我到那里去工作。我以党员肖赞延为骨干，以聚居肖家冲的肖姓农民和一两百名造纸工人为基础，重新串连发动，组织几个乡农协，改选区农协。因为我们当时经济有困难，要利用何文伟的家庭关系为农会筹款，暂仍选何文伟为委员长兼财务，我为副

委员长，实际掌握着农会的领导权。我们又利用反动势力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选择两个民愤较大的劣绅，用何文伟、李达的名义公布他们的罪状，执行枪决，既为群众泄愤，又加深了反动派之间的裂痕，使何文伟只好紧紧靠拢我们，唯命是听，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北乡莲溪区是一个最落后的区，一直没有成立农协。寻、喻两大族聚居该区，两姓历来矛盾很大，曾经发生过大械斗。仇恨很深，互不通婚，因此很不容易把群众团结拢来。尤其是大地主寻先模、团防队长寻本元十分反动刁顽。他们利用宗族关系，对群众控制很严，并企图派遣狗腿子殴打特派员周思仁。我们闻讯后，要朱文卿从距离三十多里的全吉区带领三十多个梭镖队员，跑步赶到莲溪区支援，抓了为首的反动分子游乡示众，逮捕寻先模解县法办。经过这次胜利的斗争，该区在“马口事变”前不久终于成立了农协。

（三）各种兴革事项

农会一成立，就取代了旧政权在农村发号施令。一方面领导农民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进行减租减息和清理祠堂庙宇、祀公财产的斗争，一方面出布告禁烟禁赌，禁止游手好闲，破除迷信和废除陋规恶习。

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地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农民要减租就减租，要减息就减息，不敢讨价还价，就是过去借的钱不还，也不敢哼一声。农会勒令地主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偷运谷米出境。凡稍有触犯禁令者，不是罚款就是禁闭，或者戴高帽子游乡示众，严重的还要逮捕法办。对清查出来的土豪劣绅贪污的公款，一概勒令退赔。如蕉溪区守约乡团总张××，经管该乡公款二十多年，贪污公款折谷八百多石，当时只退了十多石，

其余的出具期票，限期偿还。

这时农会的权力很大，威信很高，说话很灵，禁令一出，那些社会渣滓，烟鬼赌徒，无不胆颤心惊，潜形敛迹，或者改邪归正。蕉溪区守约乡有个田家湾，是牌赌鸦片的渊藪，过去反动派虽曾出过禁令，但收不到一点效果。我们农会禁令一出，长期以牌赌为生的田宏发、彭楚善马上改以贩卖糖果为生。做道士发家的田厚寿与前清举人、大地主周镇东都是势力很大的士绅，向来嗜鸦片如命，此时也不得不遵令交了烟枪。沙市区当过县知事的罗润物、在旧军队当过团长的喻兆元，也不敢违抗，老老实实的交了烟枪。当时虽然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但只是一般宣传号召，并未采取具体行动。据我所知，只有金刚头镇附近的一个观音庙打毁了菩萨，将庙宇改作一所新建的女校校舍，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生这类事情。不过慑于当时的革命声势，封建迷信活动确实收敛多了。

农会号召修桥补路，整修塘坝，这是农民群众衷心拥护的事。到处掀起了修桥补路的热潮，把许多泥泞小路都修整成平坦宽敞的大路，使农村出现了一派崭新气象。

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农民运动应当解决的重大问题。但由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绝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提到日程上来。

（四）走武装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搞了“四·一二”政变，接着又指使许克祥在长沙搞了“马日事变”，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革命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浏阳县，首先是响应省委号召，组织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克祥。当时我已从北乡调到南乡金刚头区去整顿农协组织，接到

动员扑城的命令较晚。上级规定农军按军事编制，以区为团，以乡为连，人员配备和伙食供给，统由区里负责。我们正在动员集中时，又接到县里的命令，说前锋部队已经撤回浏阳，要我们停止动员，我们便没有动了。

事后听说，当时省委计划动员平江、浏阳、醴陵、湘潭、湘乡、宁乡、衡山、水口山等地农军十万人攻打长沙，因受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限制，实际只有浏阳、醴陵两县的农军参加了扑城，两县到达的时间又不一致，指挥也不统一，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浏阳发动比较充分的只有东乡和北乡，特别是东乡的古港、永和两区和北乡的北圣、蕉溪、全吉、沙市四个区动员人数最多，估计有近两万人。从浏阳县城至永安市一线的路上，队伍络绎不绝。以浏阳工农义勇军的六七百人枪为骨干，在永安市集合时约有二三千人。听探报说，醴陵的农军已攻到长沙南门附近，浏阳的农军就跑步前进，实际到达前线的不过千把人，攻到韭菜园一带，遇到敌人的阻击，有些伤亡，就撤退回来了。

另一说是陈独秀派员说服潘心源，不要进攻长沙，以免和国民党扩大分裂，问题应听候中央解决，潘接受中央的命令而将农军撤退的。

浏阳农军撤退后与长沙对峙了一个多月。其间唐生智曾派其弟唐生明到浏阳和苏先骏（他们是黄埔军校同学）密谈，他们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知道唐送了四支驳壳枪给苏先骏。当时浏阳的党对唐生智是抱有幻想的。

后来，探听到何键将大举进攻农军，浏阳农军于七月初撤退到平江长寿街。苏先骏从武汉回来，将浏阳工农义勇军与平江工农义勇军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参加

南昌起义。因苏先骏与余贲民争当团长，耽搁了时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时，这个团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经过文家市会师，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上井冈山的基本队伍之一。

（慕容博爱整理）

大革命时期醴陵见闻

李 味 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醴陵正处在革命洪流中心，群众斗争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我在北大预科学习时，曾受杨怀中老师及毛泽东、邓中夏诸志士的熏陶；一九一九年回醴陵后，又与李立三、汪泽楷、罗学瓚、张曜筹等同志有所接触；经他们教育启发，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得以因缘时会，投入了这一斗争，曾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常委（相当于书记长）及宣传部长，其后又任醴陵农军会攻长沙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追忆往事，激情满怀。特别是“马日事变”以后，反动派在我家乡屠戮极惨，山河呜咽，庐舍为墟。我仓皇出走，亡命海外，得免于难。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万千烈士，墓木已拱，如我老朽，所剩无多。爰就记忆所及，述其片断，以怀烈士，并励来者。虽遗漏谬误，亦难虑及，尚望识者正之。

一、马列主义在醴陵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邑人李立三、汪泽楷先后回醴，向我和王力天等开元学校同学宣传马列主义，有时通宵达旦，滔滔不绝。时刘召圃（后为“左社”头目）任开元校长，对他们表示好感。这一新思潮便在醴陵知识界中逐渐传播。随后，汪泽楷又在县倡办工人夜学，帮助浏山瓷业工人及县城手工业者学习文化，

聘一位中共党员（忘其名）为教师。与此同时，中共党员杨人杞（后改名东莼，又号岂匏）任县立中学校长，孙筱山任事务主任，我任训育主任，庞敏权（庞人铨的兄弟）、蒋兆骧（中共党员）等为教师，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和社会问题研究社。又有张啸霞任师范讲习所所长，聘中共党员陈章甫及进步人士冯又村（后加入共产党）为教师。县立女学校长潘世谟、文质彬（女）聘中共党员李石溪、罗学瓚、张幄筹等为教师。李、罗二人先后兼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至于开元学校，也是由共产党人主持，和其它各校一样，师生参加CP和CY的很多。李立三去安源搞工人运动以后，仍常到醴陵来活动。师范讲习所曾通过他请中共中央毛泽东委员来校讲演阶级斗争理论，县城进步人士多往听讲，我也是其中之一。

二、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

醴陵自辛亥革命后，成立国民党，虚有其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实行三大政策后，醴陵县中共组织动员一批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但不许土劣参加。自此以后，国民党才积极开展党务活动，广泛宣传三大政策，逐渐消除群众对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疑惧和误解。孙中山的威信亦随之大为提高。他逝世时，追悼会上痛哭失声者不少。有些学生为了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瞒着学校和家庭，不远万里，投入黄埔军校。宋际尧（时轮）同志即为其中之一。

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醴陵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孙筱山、李味农、朱孜谔、陈晓愚、汪泽嘉、陈焚一、刘义被选为执委，唐若颜、张幄筹、庞敏权为监委。我原为常务委员，因已加入共产党，而当时中央规定，党政军的主要职务都要让给国民党，于是我放弃常委职务，改任宣传部长，而由国民党潘疆爪、廖淡空先

后继任常务委员。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各种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它们的负责人是：县总工会委员长易足三，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后为唐寄凡），县妇女联合会负责人李秀泉、易湘苏、匡育、廖赞衍等，县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潘世楷等，县商民协会负责人李毅中、瞿福生、凌汉良、丁筱秋等。

三、农民运动的兴起

醴陵县少数地区在一九二五年就有了秘密的农民协会组织。到北伐前，有些区乡的农协已经公开活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醴陵，农民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农协在乡间享有最高权力，一切事情都由农协处理，一切纠纷都由农协解决。农民对北伐军全力拥护，送情报，供茶水，助军运，甚至抬着松树炮助战。北伐军过后，农协开始对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抓他们戴高帽子游城，罚他们杀猪出谷，还禁赌禁烟（鸦片），烧菩萨，打轿子，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住在先农坛罗学蹯家里，听了党内各方面负责同志的汇报，并在秘密会上讲了话，大意是农民运动好得很，几千年的封建势力，非广大群众起来采用暴力手段，不能打垮。工人农民长期受压迫，好象一根竹子被压弯了，扭直一两次，还会弯下去，硬是要把敌人打翻在地，还要用脚踏上，使他们永远不能翻身，对敌人绝不能讲仁慈和温情。反动派阴险狡猾，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划清阶级界限。南乡某地主给农会送猪，农会就请他吃饭，这是错误的。

自从毛泽东同志来过以后，农民运动开展得更加猛烈。工会程炳生等联合农会缴了反动团防头子彭志蕃的枪支，由县特别法

庭将彭转送到省里枪毙了。各区农会又先后拘送豪绅李绍庭、李达禅，李寿衡及左社头目刘召圃的父亲等到县关押。因见他们当时没有重大恶迹，有的并不反对自己的儿子从事革命活动，关了一段时间，便把他们释放了。

一九二七年间，省方有人来县，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我们不以为然。罗学瓚书记向我们解释说：“地主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生活的，当然是革命对象，最少数比较开明的地主也可以争取。”就我接触过的士绅中，比较开明、同情革命的确实不乏其人。如老同盟会员潘昉，总是鼓励我努力搞好革命工作，其子侄潘世谟、潘世楷、潘明诚也都投身革命。老学者周树风曾任县政府科长、区长等职，却择共产党员蔡松溪为婿，后来蔡逃亡在外，继续革命，周不以为憾。西乡士绅朱俊亭，全家参加革命，本人被杀，其女玉姑病死狱中，其子朱孜碧，“马日事变”后在逃亡中加入中共组织，其孙朱务义、朱广义，在岳州搞地下工作牺牲。北乡李泊如，本人从事农民运动，曾出席县农协成立大会，其子李明灏为北伐军将领，解放前夕，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城区阳筱垣在县中及朱子祠小学任教几十年，为人耿直，甚有威望，其后人多在革命队伍工作。这类士绅，不但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有的还不惜为革命拚洒热血，可歌可泣，很值得后人敬仰。但是当时我们这方面的统战工作，却是注意得很不够的，有些事情甚至做得很不慎重。例如东二区农协控告地主黄励吾是三爱党，在乡纠合一些知识分子搞反革命活动。县委派我下去调查，我只找区里各机关负责人了解一下，便将一面之词回县复命。后来区农协把黄励吾送县枪毙了。“马日事变”后，黄家并未出面报复。解放后，我从侧面了解到黄当时只是同几个青年学生在乡里办夜学、女学，因他家较富裕，便推他为首。可能乡里看不

均

惯，再加上是地主，便目为异类，其实并无结党图谋不轨情事。这使我深悔当时调查不够深入，既没到学校去看，更没找教师及黄本人面谈，有负党的郑重委托，数十年来，心殊愧赧。其它错关错杀的事，当然不止此一端，也难一一列举。

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反动派也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制造谣言，挑起事端。如说什么共产党是代表工人的，革了地主的命，接着就要革农民的命，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农民会讨不到老婆，有老婆也保不住；又说城里打了城隍菩萨，会要遭灾，颗粒无收，如此等等。不少落后农民受其煽惑，形成工农城乡间的尖锐矛盾。这年“五·一”劳动节，四乡万余农民带着梭镖到城里开会，对工人学生队伍怒目而视，很想寻衅制造纠纷。我在台上主持会议，一看情况不对，便首先提出：乡下农友进城不易，今天的大会应该让他们首先把平时存在的问题和意见提出来，我们该改进的就改进，该解释的就解释，使大会开得更更有意义。农民听后，颜色稍微缓和了一些，当即有人提出了上述那些问题，我一一作了解答。幸好事先县方已经作了布置，把搬走的城隍菩萨放回原处，会后便让大家自由前往参观。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乱子。又如南四区有一部分农民，把千年古刹云岩寺里的菩萨毁掉，把一个小学搬了进去。主劣贺勋臣等煽动一些落后农民，杀了小学教师戴学林，引起了严重冲突，双方各集几千梭镖互相对峙。县委书记罗学瓚派潘驷爪率自卫队前往处理，主要是向落后农民做工作，强调只能说服，不能用武力威胁。经过两天的说服教育，多数人明白自己上了当，陆续离去，最后杀了贺勋臣了事。

四、“马日事变”以后

这次事变，对我们来说，实在非常突然。事变前一个把月，

省党部召集各县党部开联席会议，我和县党部商民部委员李毅中代表醴陵去参加。会议没有作任何这方面的布置。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对其严重性也估计不足，觉得上有中央，下有群众，有恃无恐，完全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不久，上面来了命令，要我们出动部队会攻长沙，这个命令是由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等联名发出的。县方奉令后，即由罗学瓚与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工农军向长沙进军，由潘疆爪任总司令，我任政治部主任，县商民协会委员瞿培东任前敌指挥，县商民协会委员凌汉良等办理军需事宜，罗学瓚随军主持一切。我们带了安源矿警队、醴陵自卫队和县城附近工农群众千余人，有枪百余支，乘火车向株洲出发。各区农军则由各区农民协会负责组织，各自就地向长沙进军，人数无法统计，至少也有好几万人。

我们指挥部只到株洲。前锋到了易家湾，和敌人小有接触，随后便撤退了。撤退是指挥部下的命令，我记得原因之一是缺少子弹。至于是否奉有上面的命令，我一直弄不清楚。

部队撤退后，农军大部分各自回家，指挥部人员退到安源，由罗学瓚召集会议，宣布由他和王力天等几个同志带一部分武装，继续在安源坚持斗争，其它同志则暂时遣散，每人发几元路费。我前往万载投亲，路遇朱克靖同志（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简单交谈了几句。他说：“事已至此，只能有死无他。”语虽悲壮，但也看出我们对当时局势确实感到一筹莫展。

我秘密回到家乡，躲藏了半年，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日有所闻。孙筱山躲在家中地窖内，被发现杀害。共产党员陈晓愚自以为平日对外活动少，或可无碍，住在家中，束手就捕牺牲。汪泽嘉原已逃往外地，又秘密回家，结果遇害。唐寄凡逃到长沙，向银行界亲戚江国璋借钱，当被告发，为公安局捕杀。潘疆爪躲

在安福教书，继续宣传革命，被亲戚发现，捕送省城，壮烈就义，临刑仍高呼“共产党万岁！”潘为人耿介，法政学校毕业后，不肯作官，一九二六年就多次要求参加中共组织，党为了保留部分革命志士在党外工作，当时没有接受他，直到一九二七年春才接受他入党。他与土豪劣绅如同水火，故为反动派所痛恨，目为“首恶”，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子年轻，亦同时遇难。此外，我知道当时牺牲的，还有东三区农协委员长易延学，旌竹山农军负责人肖炳喻，东三区区委负责人李觉非等。商人凌汉良，丁筱秋虽非共产党人，只因同情和赞助革命，也未能幸免。东三区陈奏凯，在第六军当连长，农运初起时，他带几个枪兵回家，勒缴丁白兔潭农会的枪支，被农民抓送县城法办，我们只将他关押，没有采取断然措施。“马日事变”前，将他释放出来，仍回第六军任连长。后来，他亲率部下参加清乡，在富里一带残酷烧杀。养虎贻患，我亦难辞其咎。

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我已被列入悬赏缉拿的名单（我的赏格是三百元），在家乡再也藏不住，又由于本身的软弱性，不敢和敌人作刀对刀、枪对枪的斗争，只想图个洁身自爱，以逃亡来答谢党与同志，便于一九二八年春悄然离家出走，起初到上海，随即远遁南洋，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活。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回忆祁阳农运

柏希虞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了国民党，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王尚愚（祁阳西区马颈坳人）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部长夏曦的派遣，回到祁阳，首先在教育界活动，发展刘玉光、王镇湘、刘武敏、肖棣斋、蒋毓华等人加入国民党。接着发动改组县劝学所，由刘玉光接任所长，王尚愚等任所员，在所内成立国民党祁阳县党部筹备处，以刘武敏、王尚愚、蒋毓华三人为筹备员，蒋毓华为主任。不久，雷晋乾（祁阳南区坝塘人）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回到祁阳，也参加了筹备处。以后，省党部又先后派农运特派员陈策、王一分（即王首道）来祁阳，成立了中共祁阳临时支部，由王一分负主要责任，陆续发展了何镇南、廖康国、肖棣斋、彭树德、李镇球、邓国光、黄履祥、宋慕之等人入党。

县党部筹备处为了开通民智，宣传革命，创办了《新祁阳报》，为双日刊四开小张，蒋毓华任报社社长，刘武敏任主编，聘请各重要乡镇小学思想进步的教员为特约通讯员。

这年祁阳大旱，颗粒无收，树皮草根吃尽，灾民走投无路，便向大户闹粮，经常与团防队发生冲突，遭受不少伤亡。《新祁阳报》如实报导了这些消息，并发表社论为灾民呼吁。但反动政府置若罔闻，只顾保护地主豪绅，对灾民残酷镇压，斗争烈火一点即燃。

那时，祁阳没有中学，县城有四所公私立小学。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设在城外墙口文昌塔边，算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一九二六年元月，县党部筹备处安排蒋毓华任一高校长，并更动了一批教员，革命同志雷晋乾、何镇南、刘武墩、郝湘等都被延聘为班主任和主科教员。他们同心合力，在县党部筹备处领导下，以学校为基地，秘密进行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和工、农、商、学各界的发动工作。

(二)

我于一九二四年春到一高上学，一九二六年上学期毕业回到乡下，已经有十六岁。因连年大旱，无力去外地升中学，便于八月间到县城找一高的老师，请他们介绍去广东投考革命学校。这时北伐军正向湖南进军，国民党已公开活动，县党部筹备处迁到旧县议会办公。我在那里找到蒋毓华，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祁阳的革命工作刚刚公开，各方面都需要人，我看你不要到广东去了，留在县里和我们一起干，以后有机会再去学习。”我原在一高时担任过学生会和县学联的领导工作，他便要我去筹备改组县学联。

这时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教职员联合会都在分别筹备，各界民众在县党部的宣传鼓动下，纷纷加入自己的组织。尤其是各乡农民，看到翻身的机会到来，更是迫不及待地进行着筹办乡农民协会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收回租界的喜讯传到祁阳，中共祁阳临时支部立即组织各界群众游行声援，并接管了设在新街的英商福记正大煤油公司，由县党部筹备处召开各公法团会议，成立县仇货拍卖委员会，专管销售没收的英日等国货物及处理银钱事项。其时已确定开办女子职业学校，需要经费；各民众团体正在成立，也需要筹备费。这些费用，县预算未列入，财政局拿不出钱来。经讨论决定，用拍卖煤油款开支，拨给女职八千元，由县党部汇寄二千元到汉口买印刷机，其余分配给各民众团体作开办费。

当时祁阳还没有大的工矿企业。除一个新办的凉席厂有几部机器外，其余均是一些小手工业，山区有些小煤矿，也很分散。在刻字工人宋慕之、凉席工人黄履祥的积极发动下，县总工会迅速成立起来，工人们踊跃报名入会。各重要乡镇如归阳、白水、文明铺等地也相继成立了镇工会。县总工会成立那天，召开了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争了旧工会会长王宝生、王曾在军阀部队当过营长，把持工会多年，不但伙同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还勾结官府豪绅，包揽词讼，敲诈勒索，是城关镇的土霸王，打倒了王宝生，改造了旧工会，工人拍手称快，革命情绪越来越高，常常主动支援郊区及各地的农民运动。

县妇联成立以后，首先创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以文庙为校址，设有缝纫、针织两科和小学部，从长沙聘来两位女教员，招收三十岁以下的学员二百余人。开学不久，县妇联以女职师生为骨干，开展解放妇女的宣传活动，深入各家各户，号召放脚剪发，放婢女回家，童养媳愿回家的听其自由，不愿回家的不许虐待，并可随时向妇联提出申诉。

祁阳的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六十万）的百分之八十。县农民协会最初由雷晋乾、何镇南、王尚愚三人负责筹备。正式

成立时，雷当选为委员长，何为副委员长，王兼任秘书。在农运特派员王一分、陈策的指导下，全县很快掀起了农运高潮。

当时祁阳的革命形势，以西区和东区发展最快，南区中区次之，北区又次之。全县农民运动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十二月为发动时期，一九二七年一至五月为暴力革命时期。一九二六年八月，国民党县党部召开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省党部委员周以粟亲临指导，选出雷晋乾、蒋毓华、何镇南、王尚愚、刘武敏、郝惠湘、肖棣斋七人为执行委员，蒋毓华为常委，王尚愚为组织部长，雷晋乾为工农部长，何镇南为青妇部长，刘武敏为宣传部长，并选出王纲、刘玉光、费云发三人为监察委员，刘玉光为常委。县党部成立后，开办党务训练班，吸收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师和工农青年百余人，培训一个月后，派下去筹组区、乡农民协会，各区的负责人是：西区匡福丞，东区邓国光、南区蒋阳精、北区肖棣斋。特派员王一分主要抓城郊和东、西两区，陈策抓南区和中区，到十二月，全县三十多个乡镇都已成立了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倒土豪劣绅，夺取地方上的权力。首先把民愤大的恶霸抓起来游乡，每游到一个村庄都召开批斗会。当时正值春荒，农会勒令土豪开仓平糶。从此旧的都、团解体，一切权力归农会了。

各区乡农协还夺取了地方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队。雷晋乾提出将县团防局改组为县农民自卫团，经县党部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通过，并与县政府交涉，取得同意，随即召开各公法团代表会议，讨论改组事宜，会上选出雷晋乾、何镇南分别兼任县农民自卫团正、副团长。但他们由于其他工作太忙，对于改组后的武装没有来得及整顿，只更动了大队长以上的少数骨干，没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是后来敌人反扑时遭受极

大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一九二七年二月，县里已成立特别法庭。根据省政府颁发的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规定，特别法庭审理了一大批民众检举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案件，以巩固革命政权。

西区罗口岭大土豪刘梅轩拥有良田千亩，豢养一批用长短枪武装起来的家丁，私设法庭监牢，任意关押百姓。农运初起时，农民见他财多势大，爪牙众多，不敢起来同他斗争。县党部了解这一情况后，派王一分去做发动工作，不到一个月，群众都起来了，决定在乡农会成立大会上批斗后送县法办。不料刘梅轩听到风声，逃跑到外县，家人也全躲了起来，由于刘梅轩是西区土豪之首，打击这个首恶，对农运发展将有很大促进作用，王一分同志便与区农协筹备会的同志商量决定，召开全区农民代表大会，揭露控诉刘梅轩的罪行。大会开得很成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把刘梅轩抓回来报仇雪恨，最后大会决定，一面报请县特别法庭将刘通缉归案，一面组织群众清查他的家产。清查时，刘家的粮仓、箱柜等均由农会贴上封条，等候上级处理；其他衣物用具被愤怒的群众乱丢乱甩，随意践踏，但谁也不往自己家拿。清查后，由农会干部经手杀了刘家几头大肥猪，除招待外乡代表外。当地农户按人口平分。

这次大会对湘南各县震动很大，长沙各报均有记载。会后不久，便得到县党部关于处理刘梅轩家产的指示：一、目前正值春荒，查封的谷米，平价售给缺粮农民；二、箱柜等物暂封存保管；三、鉴于土豪全家外逃，其田地暂归佃户代管，谁种谁收。

东区河洲是县党部委员郝惠湘的家乡，在县党部未公开前就

已开展了农运的宣传鼓动工作，后来王一分又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农运开展比其他的乡早，而且普遍，与土豪的斗争也更为坚决。大土豪蒋衍，霸占良田六百亩，还当过多年乡团总，横行一乡，作恶多端，并欠有血债。农民协会成立后，曾抓他游过乡，批斗过几次。王一分和区农协负责人认为他恶贯满盈，应送县特别法庭严办。春插后，区农协负责人邓国光组织全乡会员押送蒋衍进城，参加者上千人，一路高呼口号，下午三时左右进入县城。特别法庭随即开庭，根据审问核实罪行和群众要求，判处死刑，由县农协召开群众大会宣判后立即执行。但县长刘逢严却以要报请省政府核批为借口，阻止判决的执行。原来是蒋衍的家人挑了两担银元，买通县长的父亲，设法保全他的性命。请示省府的电报发出后，等了一天还没有批复。进城的农民露宿街头，坚决表示不亲眼看到枪毙蒋衍决不回乡。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县党部、县农协的一再催促下，刘逢严才迫不得已下令枪毙了蒋衍。广大群众欢欣鼓舞。这是祁阳农民运动的又一胜利。

(四)

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这时国民党祁阳县党部还是左派当权，农民运动还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五月初，共青团祁阳支委通知我到中共湘区委办的干部训练班受训。我到长沙已是五月中旬。训练班设在黄泥墩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内。因学员尚未到齐，加以时局又不稳定，我报到时还没确定开学日期。因为闲着没事，便和一些学员上街闲游。看到街上贴有“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清除白色恐怖，保卫革命政权！”等标语，感到时局正在起变化，但究竟如何变，既没听到报告，也没看到文件，心里很不安。在训

练班里和同学们闲谈，交换各地革命运动情况，都是轰轰烈烈，心里又很高兴。就这样两种心情不断地矛盾着。

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两个晚上，工人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均全副武装，和长沙市工人纠察队一起，整晚在街上巡逻放哨，气氛极为紧张，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二十一日晚，他们的戒备稍有放松，虽仍派有岗哨，但大部分学员在家休息。夜半，突然枪声大作，街上有不少人跑动。工运学员马上集合冲出去了。我们这些新来的学员没有武器，又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也没有人来打招呼，只好下床躺在地上躲避流弹。过了一会，进来不少穿灰衣服的士兵，乱放了一阵枪，看见没有人还击，便挨房查看，见我们没有武器，把我们叫起来搜查一遍就走了。我们被弄得稀里糊涂，不知如何是好。挨到天亮，去找训练班的工作人员，一个也不见。留在训练班没人管，离开又无处可去。我想来想去，只好暂时回祁阳，等时局稳定再来。在路上听到一些情况，才知道先天晚上的事是许克祥指挥的反动部队千余人袭击省工会、省农协、省工人运动讲习所等机关团体，同长沙的工人纠察队发生战斗，杀害了革命干部和工人群众百余人。

我回到祁阳，县党部的委员、干事均已走散。蒋毓华、雷晋乾、何镇南三人转到群众基础较好、并驻有农民自卫团第一大队的西区园珠山，住在共产党员匡立章家里。当时，县党部组织部长王尚愚正从长沙开完省、县、区党部联席会议回来，四个县党部委员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问题，他们认为：“马日事变”只是湖南的局部事件，武汉国民政府还是“左派”当权，便决定潜去武汉。但在去武汉的路线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王尚愚主张绕道宝庆，蒋毓华则主张先回营盘口老家，再雇船去武汉。雷何两人同意蒋的意见，于是决定分道前往。蒋、雷、何三人出发

前，要县党部公丁蒋月华去文明铺找农民自卫团第一大队长唐振亚派武装护送。蒋月华到大队部时，正值地主唐月如在那里。唐月如要唐振亚把他们扣押送县，唐振亚犹豫不决。唐月如即从附近找来几个土豪劣绅包围大队部，威逼唐振亚扣留了蒋、雷、何三人，派一分队长带团兵十余人押送县城。三人均未上绑。到十里坪时，何镇南故意把身上的银元散落地上，三人乘团兵抢钱之机，奋身逃跑，何从高坡滚进深沟，钻入茅草中，蒋、雷两人仍被抓回。

其时，祁阳已由国民党右派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各区乡权势较大的土劣都赶来参加。在会上提出了一份“暴徒”名单，把各级党部委员、民众团体负责人以及农运积极分子尽皆列入，交由县政府下令逼缉。蒋毓华、雷晋乾押到县城不久，便被杀害。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清代秀才、年近六旬的西区农运领导人王福丞在外逃时被抓回乡，亲友劝他服鸦片自尽，他坚决拒绝说：“革命者要死得光明磊落，自杀是懦怯行为。”后来与匡早义、王金陵一同就义。就我所知，祁阳惨遭杀害的农运干部和共产党员还有东区农运负责人邓国光和后来的中共祁阳县县委干部黄履祥、宋慕之等。

（五）

这段时间，我在离祁阳县城二十里的姥姥家里住了二十多天，没有听到其他消息，便回家了。不久，新的中共祁阳县县委成立，派李用之来我乡，找共产党员王葵龄、王秉国商议建立秘密党支部，由王葵龄任书记，王秉国任组织委员；因我乡再无其他党员，便要我（当时还是共青团员）任宣传委员。支部设在王葵龄家，开了几次会，主要是研究发展新党员、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积蓄力量、

待机行动等问题。

随后，乡党支部第一批发展了王秉丞、雷声、赵魁和我入党，各村农民协会又先后恢复了活动。我村农协小组在老贫农白正铨家开过几次会，每次都是晚上，往往开到半夜。大家对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斗争形势，如何组织革命群众对付土豪劣绅的反扑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八月间，李用之从县委带来南昌起义的消息，同志们非常振奋，同时也热切盼望湖南或邻近江西边界地区能发动起义，以便有机会加入进去，共同战斗。

大约过了三个月，追赔煤油款案发生了。因我在县学联工作时，曾兼任县仇货拍卖委员会常务委员，动用了油款一万多元，拨作创办女职和各民众团体的开办费，大革命失败后，英商要求赔偿，反动政府便下令抓我追赔。我逃往零陵亲戚家躲藏了一年多。后来听说油款数字庞大，各地都赔不起，时间一久，追得没以前紧了。我父亲便卖掉田地，凑了一笔钱送给县政府秘书保我过关，我才得以回家。回来的第二天，找到乡党支部书记王葵龄，他告诉我，祁阳县委机关早被反动政府破坏，领导同志黄履祥、宋慕之等惨遭杀害，李用之已离祁阳他往，乡党支部因与县委失去联系，也暂时停止了活动。

大革命时代的沅江

刘 虚*

沅江是洞庭湖边上一个小县，地处湖南省会长沙与湘西门户常德之间的水路往来要冲，当地经济虽较落后，而对政治气候却是颇为敏感的。加以军阀横行，豪绅肆虐，人民盼望革命尤为殷切。

一九二六年初，北伐军入湘，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纷纷起来投入革命。这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一切革命工作由国民党县党部公开领导，共产党处在地下，党员都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原在各地学习和工作的青年这时都回到沅江，开展革命工作，特别注重发展工农运动。共产党员回到沅江的也有不少，其中有第一师范（长沙）的熊玉端、王晓楼、刘鼎，第二师范（常德）的李征耀，蔡杰、熊渭贤与原在女子学校教书的任培谊，做木工的舒右伐（不久由省总工会派为工运特派员）等。于是成立了沅江县委（县工委），由李征耀任书记。当国民革命势力发展到沅江时，国民党县党部便公开了，由皮兆麟任常务委员。这时的县党部只是一个空架子，党员不多，工作人员更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运动发展尤为迅猛，先后成立了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县总工会由陈佑坤任委员长，傅耘荒任副委员长，舒右伐和我（刘六如）

*本文作者原名刘六如。

任委员。县农协筹备处由李征耀任筹备主任，蔡杰任秘书。县农协下面还成立好几个区农协。在这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显得不能适应。同时，又先后成立了好几个基层党部，发展了大批党员，广大党员也希望健全领导机构，以便更好地领导开展革命活动。经省党部批准，于这年秋初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县党部。这次改组极为慎重，由省党部派委员熊亨瀚监选，选出熊玉端、王晓楼、舒右伐、钟化鹏、刘严吾、徐植兰、盛鸣麒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以熊玉端为常务委员，王晓楼兼组织部长，钟化鹏兼宣传部长，舒右伐兼工人部长，徐植兰兼农民部长，盛鸣麒兼商民部长，刘严吾兼青年部长；又选出刘六如、李卜吾、胡启修为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刘六如为监委会常委。国民党县党部改选后，领导机构比较健全了，革命工作发展也更迅速了。

当时沅江的革命力量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大多是从外地回来的学生，对当地实际情况不大了解。而我自一九二三年起即在县里工作，与各方面联系较多、对情况比较熟悉，同时又常在长沙《大公报》、《通俗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邵力子主编）发表诗文，又是长沙各报通讯员，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遂很自然地成为活动中心。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党对我不断培养提拔，除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监委会常委以外，还担任了县总工会委员、民报社长、图书馆长等职，并且很快被吸收入党。到这年十二月，李征耀因犯严重错误，被省委撤去县委书记职务，另行改选县委，由我任县委书记。原来县委只有书记一人，这次又选出熊玉端、舒右伐、王晓楼、钟化鹏四人为委员，以王管组织、钟管宣传，正式成立县委组织。

县委改组以后，党的组织和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在县城的党员

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工人；其他如茈湖口、草尾等农运发展较快、领导较强的区，也发展了一些农民党员。这时我以《沅江民报》社长身份活动较多，还被聘请到县立中学讲授过三民主义，也和县中士绅一道到省城搞过清账工作。由于社会活动和过去一样，我的党内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这就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在县委领导下，通过国民党县党部，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接管了县团防局，以邓安国为局长。

二、接管了县警察所，以陈玉云为所长。

三、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以广州工人运动讲习所结业回来的贺克夷为队长。

四、成立了特别法庭，以县长李荫棠兼审判委员会主任委员，舒右伐、刘严吾为委员。判处了原劝学所所长皮国杰死刑。皮在劝学所所长任内贪污教育经费银洋一万余元，民愤极大，经其任内管财务的姚国瑾揭发证实，县委研究决定作如上判决，群众称快。

五、成立了工农银行筹备处，以皮璠、王恢先、熊玉端等为筹备委员，我为秘书，起草了一份章程，并着手修理房子。后因“马日事变”发生，筹备工作被迫停止。

六、准备成立济难会，派刘鼎负责。济难工作是对党员和革命群众遇难从事救济的。是在当时革命形势下，准备应变的措施。

沅江革命势力发展很快，反革命势力也在暗中集结，准备反攻。一九二七年四月左右，先后发生了舒右伐被捕与皮昆泉被杀两事。这是反动派对革命势力进攻的先声。不久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这时沅江城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还在县里坚持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我们当时认为，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对“马日事变”尚未表

态；湖南省委在这种紧急关头，对如何应变，也应该有个具体指示；想等待一段时间再作计较。后见形势日益紧迫，才决定撤退。在撤退之前，我们把机密文件全部销毁了，并决定让县委组织委员王晓楼暂时留城处理善后事宜。因为王当时在苏州会馆小学当教员，除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外，未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较少暴露；并且他参加过省委举办的组织工作人员训练班，懂得一些地下工作方法，所以我们决定把他留下。

我们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上旬从沅江县城撤退的。在此之前，社会上便流行一首反动歌谣：“巴巴头、万万岁、瓢鸡婆、用枪毙。”因当时青年妇女为了拥护革命，大多剪了发髻，所谓“瓢鸡婆”即指剪了发的妇女。这歌谣显然是反动派为制造反革命舆论而抛出来的。接着便是血腥的屠杀了。沅江第一个牺牲的是团防局的干部何炳涛。他原是旧团防局的职员，倾向革命，靠拢我党。他在一九二三年和我同过事，曾几次向我倾吐心情，后来主动揭发了团防局的一些黑幕，对我们接管该局有不小帮助，所以当原团防局长蔡赞勋卷土重来时，便拿他开刀。接着牺牲的是储运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杨春生。在这前后，刘鼎叛变，率领枪兵四处追踪革命干部，先后被他出卖被捕牺牲的有共产党员蔡杰、刘武和国民左派徐植兰等同志。不久，县委组织委员王晓楼也自首投敌，交出了党员名册。前县委书记李征耀也叛变了，供出了党的一些机密（刘、王均于抗战时期病死，李于解放后被镇压）。还有一个党员叫熊珊，赤山人，曾任安乡县党务特派员，这时也在沅江被捕牺牲。芷湖口方面还牺牲了几个农民党员，姓名已忘记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瓦解，同志星散，所有革命干部除牺牲和被捕叛变者外，大多数逃亡在外，被反动政府通缉，连家属亦受迫害，不能在县内居住。沅江从此又变成了反动派的

天下。

我离开沅江后，改换了名字和籍贯，到处流亡，幸得保全性命。今已年逾八十，蒙党的关怀照顾，得以欢度晚年。回忆五十年前的往事，不胜感慨万端。只因记忆力衰退，所述难免错漏，尚希知情者补充订正。

“马日事变”前后

李绍林

我家原住湘潭县，兄弟七人，五个当长工，四个姐夫，也有三个是长工。一九一九年，我十五岁时，父亲替资本家砍树被压死，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一九二一年，我随伯伯迁到长沙北门外新开河，在那里租种一块小菜地过活，收入有限，还经常给人家抬轿子、打零工、搞搬运。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长沙市郊也成立了农民协会。我高兴地入了会，当了一名纠察队员。当时，长沙市郊成立的乡农民协会达一百多个，按成立时的先后次序排列，我们乡排为第二十六乡，靠东面的一个乡最后成立，排为第一百一十四乡。在各乡农协成立后，又将长沙四周近郊的六十一个乡组成长沙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是滕代远。其余的乡则划归各县管了。

一九二七年初，农民运动发展更为迅猛。农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城市工人运动也如火如荼，与农民运动互相呼应。在长沙的外国人（以英、日两国人居多，他们大都是怀着某种侵略目的而来的）纷纷离城，逃到兵舰上开走了，一时人心大快。

我们第二十六乡农协委员尹必端，办事公道，得到群众拥护。纠察队长郑秋浦，是长沙大资本家朱金生的管家，因为他和他父亲以前给朱家抬过轿，他老婆又是朱家的丫头，和周围群众关系

尚好，但他毕竟是个地主资本家的管家，这个身份是不适宜当农协纠察队长的，因此我们打算培养新的骨干来代替他。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骨干的培养，在滕代远主持下开办了一个纠察队员训练班，每乡抽一人，共六十一人参加受训，地点在韭菜园一个外国人的屋子里。一九二七年春节后开学，训练期间原定六个月，后来因“马日事变”发生，就提前结束了。

五月二十一日那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听见外面枪响，便向滕代远作了报告。当时他认为不会有大问题，可能是伤兵滋事。我们打电话与外面联系，电话已不通了，街上戒了严，大门也被机枪封住了。滕代远见状，知道情况不一般，即指挥大家从后门撤退向东走，退到第一乡（现省委机关所在地）住下。当晚在第一乡委员长家里开会，滕布置大家疏散回家，以后的工作另行通知。就这样，我回到了自己家里。

六月间一个晚上，滕代远到了尹必端的家里，尹把他安排在后面一间小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尹告诉我滕委员长来了，并带我去见了。滕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第二天早饭后去三汊矶对河谷山上一个庙里开会。这天晚上我送滕到河边，他上船过河去了。第二天，我约了五、六个人到约定的地点去开会。我们赶到时，会已开过了，但滕委员长还没有走。他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把分散在纠察队员里的枪枝收集拢来，送到岳麓山后面梅子滩（一百乡）收藏，准备武装暴动攻打长沙之用。我们有四个人负责收枪工作，白天进行联系收集，晚上把收到的枪从靳家河过河走十五里路，赶在天亮前送到梅子滩收藏起来，天亮后在一个姓汤的粉坊里吃过早饭再回家来。这样搞了一个多月，收了三十多枝枪。这时，滕代远就住在汤家粉坊。枪枝收齐后，有一天在粉坊里正准备开会时，忽听说国民党军队过河来了，开会的人即刻转

移到附近山里，滕向大家宣布：最近形势不好，国民党力量强，我们力量弱，活动很困难，今后会不开了；关于以后如何活动，过几天再通知。后来得知那次到河西的国民党军队是到纱厂那边去的。在一段时间里，形势不断恶化，反动派加紧了镇压。我的一个堂兄，是乡共青团书记，因斗地主积极，被捉去杀了。

七月的一天，尹必端通知我和他一同到浏阳门外一个庙里开会。我们两人到庙里时，除滕委员长外，还有一些人在座。因为探知大托铺九方镇团防局存有几枝枪，我们开会商议到那里去缴枪的事。为了表示忠诚与决心，我们在会上歃血为盟，喝雄鸡血酒。滕代远委员长第一个饮完血酒，尹必端继之一饮而尽，我是第三个喝的，其他的人也跟着喝了。喝完血酒就宣誓，每人拿着一根点燃的香，念着誓词：“愿同生死，战斗到底”。誓后把香折断，以示决心。临排队出发前，滕把我和尹必端叫出队列，严肃地对我们说：“缴枪的事你们不去了，近日安源山那边将有四袋炸药运来，要找个房子存放，还要做成炸弹，你们就去执行这个任务”。并说第二天就派人去看房子，再派一个会做炸弹的人和我们一同做。我们没说二话，就把做炸弹的任务接受下来。当时是割早稻的季节，晚上街上戒严，我们不能回家，就在田边粉禾桶里坐着过夜。我们思索商量，怎样去完成任务。做炸弹是一桩非常秘密和危险的事，到哪里合适？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好的地方。最后我说，还是到我家里去吧。尹问我家里有哪些好的条件，伯伯、哥哥会不会同意？我说，我家左右住两户地主，别人不会注意这个地方，地主也从不到我家来，我又是地主的长期短工，他们不会怀疑我，况且这两家地主的儿子和我的情谊很好，他们不会来妨碍我；至于家里是否同意，估计不会有多大问题。尹同意了意见。天亮后，我俩各自回家。我把打算在家里做炸弹

的事对伯父、哥哥说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不多时，尹必端带着滕代远派来的一个姓刘的来看房子，并交代了接运炸弹的暗号，说是到铁路局后门敲三下就会有人接应。老刘又带我到北门外福寿桥联络站汇报，还交给我十二块光洋，嘱以六块购买器材，另六块由我和尹必端各拿三块作应急用。下午又来了一个名叫刘兆升的人，他会做炸弹，是来作技术指导的。晚上，我找来四个好友，都是码头工人，和尹等一起顺利地把炸药运了回来。刘兆升住在我家里，对外人说是我的老表，暂住我家养病。

要动手做炸弹，首先就要购买铁皮筒子，药水棉花、硫酸、白糖、汽车灯泡、废铁丝、棉布等材料。铁皮筒子要在洋铁铺里定做，店里问我们作甚么用，我就说装牛奶用。用这个东西做炸弹，人们还没看见过，所以也不怀疑。

做炸弹是件细致而危险的事，要经过试制，还要试爆，才能知道炸弹的效力，并且还要求携带安全。我们的弹壳是用铁皮做的，炸药是矿山用的黄色炸药，用土法制弹，不能用雷管引爆，也不能用明火点引线，唯一的办法是化学变爆。制成之后，不能在制作场所试爆，只好跑到十多里外的洪山庙斗米塘山里试验。一次试爆，响声洪大，效果很好，我们禁不住欢呼起来，快步从山背后跑回家报告好消息。第二天，老刘去现场观察，回来说，炸痕有斗把田那么大，炸坑也很深。试炸成功，我们就正式做起来，搞了两个多月，做了二百多个，其中有七个较大的。炸弹做好后，一部分交老尹送出去，一部分是米人运走的。

我负责送过三次炸弹，第一次把二十多个炸弹装在四个大冬瓜里面，送到北门外一个指定的地点，由别人接走。第二次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送到北门外另一个指定的地点，交给接收的人。第三次是将炸弹用排菜掩盖，由一个姓李的带路，送到浏阳门外北墙湾

子任茂耀家里。

“马日事变”后，工农运动由公开转入地下。斗争很激烈，党组织布置了一个在城里的爆破计划。首次是在教育会坪炸响的，那天在那里召开民众大会，有省政府的头头出席，结果一个炸弹把大会炸散了。第二次是在捞刀河爆炸的，把铁桥炸坏了。第三次是在北门外光华电灯公司爆炸的，用的是一个炸药包，把锅炉炸坏了，无法发电，公司也就关了门。此外还计划爆炸几个地方，其中有南门外电厂和电讯局，后来因某种原因没有实现。

到了十一月，敌人进行大搜捕，大屠杀，形势越来越急。一天，刘兆升上街打听消息回来说，任茂耀被捕叛变了，各处联络点也遭破坏，他打算出走，要我也快走，并叮嘱我说：“你到任茂耀那里送过炸弹，要特别注意！”老刘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我当天晚上在菜园里把未运走的炸弹埋好，种上了菜，过了几天，有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在门口看见对河来了几个警察，就躲到屋后菜园里观看动向。警察是由曾带我送炸弹到任茂耀家的那个姓李的带来的，先到邻居刘八爷家问我住哪里，刘的老婆指着我家说：“就在那里”。警察绕了一个圈子，向我家走来，我就跑到黄豆田里躲藏起来，没有被他们发现。我随即躲到湘潭老家去了。尹必端也是被抓的对象，但是没有抓到。后来我还是被传到长沙，在法院受审时，我只承认参加过农民协会，当过纠察队员，但没有参加共产党。那个姓李的带路人出庭作证，说我送过炸弹。我说是他（指李）叫我送菜，没听说过是送炸弹。审讯终结，我既不是共产党，又没有送过炸弹，无法定罪。这场官司就此结束，我又回了老家。

当我从老家出走后，埋在菜园里的炸弹被尹必端偷偷运走了。尹必端与我交厚，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总是交我去办。他信任我，爱护我，我也很尊重他。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他在一次日机轰炸中

被炸死了，同时罹难的还有两个媳妇，一个孙儿，一个孙女。对此，我至今感到悲痛。

（吴新元记录整理）

（天津市政协文史工作组供稿）

关于十万农军围攻长沙问题*

易 礼 容

下面我讲十万农军围城的事。所谓特派员问题，初见“八·七”会议《告全国党员书》，李维汉同志背这个黑锅大概已五十年，说他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下令撤退了围城的十万农军。对这件事我有什么资格说话呢？我想会有人晓得。我是“马日事变”后的五月二十八日奉中央命从武昌鲇鱼套动身回湖南的，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到达长沙。六月中旬起受湖南临时省委书记毛泽东领导。八月底临时省委工作移交，我延到一九二八年春节那天才到安源去。传说十万农军围攻长沙是五月三十一日，那是我到达长沙的第三天。没有这样的事。潘心源有一报告很好，能够说明问题。浏阳工农武装数千人到了长沙近郊，分两路攻城，几小时就撤退了（李维汉同志到了潘军中）。其他岳阳、平江、醴陵等县武装因故未到，这是事实。当时党的交通被破坏，我到长沙才三天，努力不够，还不知浏阳农军到了城外。听到枪声，以为是冷枪，皆因自己和少数同志警惕性差。柳直荀是用省总工会、省农协名义做了号召，实际上是空炮，只来了潘心源一部分人，对城内也无联系。

蔡和森同志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说了有十万农军攻长沙的事。但他是听说的，为了鼓舞革命斗志，就写入了文章。

●这是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八日易礼容同志在湖南党史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段。

马日事变后农军围攻长沙的回忆

陈 新 宪

关于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农军围攻长沙的问题，近来有各种议论，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当时的所见所闻，回忆概述如下：

马日事变前湘区委对衡山地委的指示

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共湘区委派我到衡山地委担任宣传部长兼管工运。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总工会特派员。一九二七年四月，衡山地委书记向钧赴长沙湘区委开会，随后又去武汉出席党的五大，直到六月方返衡山。这段时间由我代理衡山地委书记职务。

“四·一二”事变后，湘区委曾指示衡山地委组织群众，举行反英讨蒋示威游行。同时以清除左社分子为中心，结合开展镇反运动。四月底，省农协特派员庞叔侃带来湘区委加速组织工农武装的指示，并指定地委宣传部长作为党组织的代表与群众见面，从五月一日起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红五月”宣传运动。衡山地委于五一劳动节派我代表中共组织讲了话，并检阅了工农武装和游行队伍。五月中旬，湘区委又接连派戴晓云、熊亨瀚来衡山传达湘区委关于应变措施的指示。当时湘区委曾以十万火急的通告文件传达了区委所拟的绝密应变计划，大意是：有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包括省防军）的地方，应严防挑衅袭击，严密控制工农武

装，严守革命纪律，严格服从上级命令……。总的精神是严阵以待，防备袭击，人不打我，我不打人，如遇突变，就地自卫。没有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的地方，应大力发展工农武装，集中优势力量控制城镇，严防县警备队和警察武装的异动。对左社分子和破坏革命的反动分子，应采取果断处置。为了统一指挥，湘区委还要求各地先秘密成立军事指挥机构。

衡山当时没有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和省防军，除县城有知事（县长）衙门所属警备队数十人枪、水陆警察约四十人外，所有原地方团防部队约八百人枪，已先后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城区和郊区驻有自卫军三个中队约三百人枪，其余分驻各区乡。城内工人纠察队人有一百多，但枪只有十余支。城乡梭标队则有七八万。五月二十日左右，我以代理书记身份在康王庙召开了地委紧急会议，会上由湘区委特派员熊亨瀚传达区委指示，并提议以我兼任衡山军委书记（在这以前地委无此职称），如遇紧急情况，可以中共衡山地委代表兼任军事指挥的身份公开活动。会议并通过了事先按照湘区委指示草拟的衡山应变计划。

马日事变后衡山的军事行动

大约是五月二十二、三日，柳直荀从湘潭发来一封急电，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长沙发生军事叛变，希各地严加防范。接着于五月二十四日发来一封电报，文字比较长，大意是：驻防长沙的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勾结反动部队，发动反革命事变，攻打省会革命机关团体，屠杀革命群众，我工农武装予以抵抗，损失甚大，要求各地共同声讨。由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署名，秘书长柳直荀副署。接着又有郭、易领衔的快邮代电，详述事变经过，声讨许克祥的罪行。这时，原由衡

山派赴长沙工农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学员刘亚球、睦元勋、陈佐清等先后从长沙逃回衡山县城，亦各就所见所闻汇报了事变情况。熊亨瀚也再度来到衡山，共同商讨应变措施。二十六、七日，又陆续接到柳直荀从湘潭、株洲发来电报，要求衡山的工农武装除留一部分控制城镇外，其余应迅速开赴湘潭江舍待命。衡山地委当即决定：派贺尔康带领三个中队（约三百人枪）向湘潭进发；同时以军委指挥部名义，命令河西各区乡梭镖队至福田铺和护湘关一带集结待命，河东各区乡自卫武装亦各按指定地点集中；在县城宣布戒严，检查邮电，控制水陆交通。这时又接到湘潭来电和柳直荀的密札，要求衡山工农武装担任反攻长沙的预备队。我们当即要求全县集合两万农民武装（主要是梭镖队）参加支援反攻长沙。三十日，贺尔康率领三个中队到达护湘关，他便直接与湘潭农军总指挥部联系，并受其调遣。衡山县城也在此时组织了一万多人的示威游行，发出声讨许克祥的通电。六月初，贺尔康返县城报告说，反攻长沙的工农武装已撤退，许克祥部队已到湘潭，并向湘乡方面进犯，企图不明；集结在湘潭一带的农军亦纷纷散退。地委即命令贺所率领的三个中队仍回原防，梭镖队则仍继续集中区乡重要市镇待命。

反攻长沙的计划及各路农军撤退情况

六月中旬，柳直荀偕同毛泽东、彭公达、王则鸣等几位领导同志来到衡山。地委在康王庙召开了干部会议。柳直荀在会上报告了马日事变及农军反攻长沙的经过，毛泽东讲了话。从柳直荀的报告中，得知反攻长沙的计划是当时临时省委商同柳直荀出面搞的，柳权宜借用郭亮、易礼容两个委员长的名义来号召，原计划组织三十万工农武装击退反革命叛变，以长沙邻近数县十万农军

围攻省会，要求活捉许克祥。军事部署分三路进攻长沙：一路以安源工人纠察队、株萍铁路工人纠察队和株萍沿线农民自卫军及湘潭河东部分自卫军为主攻部队，目标是长沙南门；二路为浏阳、平江农民自卫军及原从长沙城撤出的工农武装，目标是浏阳门、小吴门和经武门外的四十九标和五十标驻军；三路为长沙河西岳麓山、银盆岭农民自卫军及纺织厂工人纠察队，目标是长沙西门和北门。先设总指挥部于湘潭，继移株洲。柳直荀实际上任总指挥，彭公达、王则鸣辅之，但公开行文及发布命令仍以郭亮、易礼容二人名义相号召，并用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名义发过代电。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各按指定地点集中，作为总预备队。如宝庆县农民自卫军被指定到湘乡永丰（现双峰）待命；衡山、湘乡、宁乡各一部工农武装到江禽待命。各路攻城部队限五月三十日到长沙会师。

至于各路农军的撤退情况，据我的记忆是：总指挥部是接受中央命令撤退的。第一路前锋刚到达易家湾，领导人便命令后撤，有的从株洲撤到醴陵，有的从醴陵又撤到安源，只有少数尖兵部队因未接到后撤命令到达大托铺一带，听说长沙开来一列车反动军队，便也纷纷后退了。这一路由于领导人带头向江西方向跑，除株洲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尚能保持纪律各回原驻地外，农军的后撤队伍是比较混乱的。二路浏阳农军数千人由潘心源同志率领，打到小吴门，占领韭菜园至陆军医院一带，因孤军作战，激战一小时后，也被迫撤退，返回浏阳。后来听说浏阳农军攻长沙这一仗，曾打死敌军连长一人，排长二人，士兵十余人；农军因系攻击部队，伤亡更重些。三路河西农军约三千余人配合三叉矶纺纱厂的工人纠察队抢渡湘江，受到敌军阻击，且因听到攻城农军已退，便据守银盆岭一带，造了几天的声势，随后也就散了。当

农军进攻长沙时，龟缩在省城内的反动派惊慌万状，他们听到武汉国民政府要派人来查办许克祥，已暗令许克祥率部开往湘潭、湘乡一带暂避。此时虽由岳阳调来周盘师的一个团到长沙增防，但长沙城仍感空虚，因王东原的教导团、陶柳的学兵营大都是新兵和徒手，人数虽近三千，作战力量甚是薄弱。农军围攻长沙的先天（五月二十九日），许克祥部到达湘潭，当即与我驻湘潭城的工农武装接触，揭开了围攻长沙的序幕，因我方驻湘潭的工农武装是预备队（大都是农民梭标队），仓促应战，指挥失灵，结果一战即溃，担任指挥的杨昭植同志（县总工会委员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接着反动部队继续向湘乡进犯，湘乡和宁乡一部农军也各自退回。我们衡山的农民自卫军到达护湘关后，闻讯即停止前进，随又奉命退回福田铺至石桥铺一带。七月，我被省委派到宝庆去工作，得悉宝庆地委于马日事变后也接到柳直荀从湘潭发出的一系列电报。宝庆地委书记彭觉如命令农运特派员刘惊焘、鄢建农和农协秘书雷逸安等率领城区和东乡农民自卫军前往湘乡永丰待命。当部队行至湘邵边境太乙乡时，该乡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尹伊重突然叛变，将农军领导人刘惊焘、鄢建农、雷逸安等八位同志惨杀于团山。在城留守的工人纠察队及唐生智所属王锡焘旅的一个营，在陈光中匪部进犯县城时均被缴械（陈光中当时自称反唐讨赤军前锋总指挥）。此时湖南各地先后发生类似情况，只有边远地区无反动部队驻扎的县城，尚有我工会和农会在发号施令，有的到秋收起义时还在乡间开展游击活动，极少数地方坚持到年关暴动。湖南农民这种持续斗争，也许是当时中央决定组织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的事实依据。

结 束 语

马日事变后农军反攻长沙，是当时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组织的一次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但这次反攻长沙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当时的党中央的批准。中央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坚持用和平办法解决湖南问题，曾下令制止这次军事反击。加以临时省委领导人和具体负责指挥者如柳直荀、彭公达等都以为中央定有锦囊妙计，惟恐搞乱大局，负不起责任，只好遵照中央指示传令撤退。由于当时交通电讯有通有阻，致使各地进攻部队有进、有停、有退，结果弄得虎头蛇尾，溃退以终。

所谓十万或三十万之数，那是当时的计划和号召，事实上到达长沙和近郊的不到一万人（浏阳四千左右，河西三四千），中路主力也只一万余人，三路加起来不过两万人上下。至于预备队，除湘潭、湘乡、宁乡三县曾陆续集结于江麓一带约万人外，衡山虽动员了上万人，实际只派出三百多人去支援，到护湘关停了几天即奉令撤回。我们当时在衡山接到过柳直荀转来撤退的命令，说要静候武汉中央来解决，地委便遵令撤退；到六月下旬，又命令撤到岳北，因反动部队来追击，我们被迫据险还击，揍了敌人前锋部队一顿，敌人退了下去；后来还是因为农军内部发生叛变，才被打散，到秋收起义，只剩下一百余人参加。至于中央当时究竟是派谁来传令制止这一行动的，柳直荀同志没有说明，我们始终弄不清楚。

（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供稿）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袁 福 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使中央和湘赣等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根据地大部丢掉，红军被迫远征。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命令我们湘赣红军为先遣部队，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湖南等地区挺进，与贺龙同志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指定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为主席，领导湘赣红军行动。八月七日，湘赣军区指挥机关率红十七师、红十八师由江西永新的牛田、关背、遂川的横石，开始向湘南突围。我军在出发时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八月十一日，我军冲破了敌人二百多里的碉堡封锁线，到达了湖南桂东之寨前圩和沙田圩。十二日，部队在沙田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肖克同志为军团长，王震同志为政委。誓师大会后，接着进行西征。

我们红六军团转战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于十月中旬，在贵州石阡之甘溪与广西廖磊部激战一昼夜后，一度被截为两路，一路由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五十团（团长郭鹏同志）以及打前站的人员，于十五日在沿河县的沿厂坝与红三军和黔东独立师会合。另一路的大部份，由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于十月二十三日在印江县之木黄与

红三军会师。在会师的当晚，红十八师五十三团在木黄东一个山垭放了一个军事哨，红三军侦察连来摸我们的哨，一摸就被我们打跑了，一晚连摸几次都被我们打退。因为红三军没有电台，同我们取不到联系，虽然他们知道我们来了，可是又不知我军在什么地方。红三军侦察连听老百姓告诉他们，木黄今天来了一支打富济贫的军队，是真是假，他们还不清楚，因此，他们来摸哨，摸到快天亮时，他们又去问老百姓，老百姓还是说，昨天来的是一支打富济贫的军队，他们在这里打过土豪，将土豪的东西分给了穷人。这样，他们又来到我们哨前，这次来同以前不一样，一来就问：“你们是不是红六军团？”因为我们放军事哨的同志不知道他们是红三军，还以为他们是敌人，就回答说：“我们是红六军团，你们想怎么样？有本事就来！”他们回答说：“你们不要打枪，我们是贺龙部队的红三军侦察连。”我们放哨的同志听说他们是贺龙同志的部队，就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是红三军的同志，就请你们先派一个同志来接头。”他们当真派来了一位同志，一谈真是红三军侦察连。此时，我们放军事哨的指战员和过来的红三军同志都高兴得跳起来。我们把他们都叫到我们哨所，他们一来就象亲人见面一样，和我们热烈握手，亲切交谈。红三军侦察连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军部离这里约十五里。他们当即派了两位同志回红三军向贺龙、夏曦、关向应同志报告这一好消息。我们团将红三军侦察连的同志送到军团司令部，见了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第二天上午，贺龙等首长率红三军部队来到木黄与我们六军团会师。会师的当天部队没有停留，继续出发。两军于十月二十七日的四川酉阳之南腰界停下来，举行了誓师联欢大会。任弼时和贺龙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贺龙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根据地就在脚板底下。”我们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纳闷。我们原来

盼望在同红三军会合后，能在他们苏区得到一个短时间的休整，恢复一下疲劳，但是由于原洪湖和湘鄂西苏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夏曦同志执行了王明路线，使洪湖和湘鄂西苏区都丢掉了，原来的根据地没有了。在黔东临时建立的一小块根据地，又是很不巩固的，休整当然就不可能了。

我们两军开完联欢大会后，一方面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一方面根据中央指示，确立以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军事上成立总指挥部，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关向应同志任副政委。遵照中央总的战略意图，决定红二、六军团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湘鄂川黔边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借以钳制敌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由南腰界出发，与敌两旅战于凉风垭、毛岗、鼓石等地，复经蚂蝗井进占四川酉阳县城，然后继续向湘西挺进。十一月七日，红二、六军团攻克湘西之永顺县城，使我们脱离苏区经过远征苦战的部队，得到了一周的休整。在那里补充了人员、马匹，互相调整了装备，从六军团抽调部分干部到二军团，逐渐恢复了党团组织，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等。两军亲密团结和统一行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广大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部队士气倍增，战斗力有很大的提高。

正在这时，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部龚仁杰、周燮卿（绰号周矮子）两个旅和贵州的皮德培、杨其昌两个师约十个团的兵力，向我进行围攻。我军于十一月十四日退出永顺城至吊井岩一线，诱敌尾追，准备予以痛击。我军一天只走几十里路。我驻敌也驻，隔沟相峙，互相都可以望见对方的哨兵。我走敌又随，敌人也不敢向我军冒险进攻。过了龙家寨后，总指挥部决定选择十万坪的有

利地形给敌一个歼灭性打击。十一月十六日，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亲率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主力团为第一梯队，在十万坪的碑里坪、杉木村之间的山坡上埋伏，并亲临第一线指挥。王震政委下令：他本人不开枪，任何人不准先开枪，违者枪毙。我军设伏后，尾追我军之敌皮德培、杨其昌两个师，龚仁杰一个旅和周矮子率领的一个团先钻进我口袋。待敌进到离我埋伏阵地约二十米之处，王政委才打出第一枪。顿时，机枪、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紧接着王政委巨手一挥，六军团象潮水一般，冲向敌群，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红二军团在二梯队见此胜利时机，如猛虎下山，紧跟着敌人穷追痛击，一直追到永顺城，将其克复。这一仗除周矮子、龚仁杰、皮德培、杨其昌几个家伙带领一些残兵败将逃走之外，我军活捉了龚仁杰的参谋长，歼敌三千余人，缴获枪枝二千余枝和大批弹药，补充和改善了我军装备。这一仗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仗，是打开湘鄂川黔边区的局面、建立革命根据地带关键性的一仗，其意义非常重大，我军乘胜攻克了桑植、大庸等县城，直逼沅陵，以原湘鄂西苏区之永顺、桑植、大庸、龙山、来凤、鹤峰、古丈、慈利等地为基础，重新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大庸县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同志任书记，并成立了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贺龙同志任主席，又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同志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政委，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均为省委委员。接着以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十六团分兵于永顺、大庸、桑植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团和建立群众组织，成立地方革命武装，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十二月一日，省委颁发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不久，永顺、桑植、大庸、龙山、

古丈、慈利等县区乡革命政权相继建立，群众发动起来，进行了土地革命运动。十二月十日，湘鄂川黔省委等机关迁至永顺塔卧。在大庸的丁家溶和永顺的塔卧批判了夏曦同志的错误，并撤掉了他以前的重要职务。在塔卧又奉命建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贺龙同志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为委员。

十二月十六日，我军经过慈利在溇溪河消灭刚从湖北调来担任防守的敌独立第三十四旅罗启疆部的大部后，紧接着占领桃源。第二天，我前卫部队穷追猛进，一度攻入常德城内，但是由于我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赶到，被迫退出城外，待后续部队赶到，再包围了常德城。我军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七天，扩充红军数千，筹得大批物资。此举震动了国民党反动集团，何键急令其在湘南截击我中央红军之十六、十九、六十二三个师兼程救援常德等地。敌二十六师亦由江西驰援常德，从而分散了敌人用于“围剿”我中央苏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远徙。

由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节节胜利，敌人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调动了将近三十个师的兵力二十多万人，向我湘鄂川黔根据地压来，进行大规模“围剿”。敌张万信旅渡澧水向大庸边界进犯，郭汝栋师之王振东旅、李觉师之陈子贤、陶柳两旅，由慈利、桃源边境向大庸进犯，第一路司令陶广所部六十二师钟光仁旅，十六师章亮基所部之何友松旅，由沅陵向大庸、永顺进犯，陈渠珍师顾家齐、周燮卿、廖怀忠、戴季韬各部也向永顺进犯，张振汉率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从湖北鹤峰、来凤向我军进犯，在川东的王东原（湘军）等部驻守秀山一带，企图以大庸、桑植为中心对我取包围形势。南路章亮基部孤军深入永顺之高梁坪，我军予以迎头痛击，仅用四、五小时，歼敌戴鼎甲团和两个保安团，残敌仓

惶经王村向古文溃逃。三月间，我军一部主动撤出大庸城，向永顺等地转移。李觉、郭汝栋乘虚逼进大庸。三月二十一日，敌十九师、十五师从大庸城倾巢出动，蜂拥而至，妄图歼我于永顺、大庸交界之后坪。红六军团首长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心在后坪给予迎头痛击，军团首长令十七师五十团（原五十三团）为先头部队在拂晓前占领后坪通往永顺要道之鸡公垭，由于我五十团耽误了时间，结果鸡公垭被敌人抢先占了。我军不顾牺牲，对鸡公垭山头反复冲锋三十多次，激战一整天。我指战员英勇顽强，杀得敌人尸首遍野。第二天红二军团从永顺王村一带赶来后坪，配合作战，又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李觉、郭汝栋见我援兵已到，又遭到我军严重痛击，遂带领残兵溃退大庸城。后坪战斗计歼敌三个团约三千余人。我军伤亡也较大，约有五、六百人之多。五十团政委贺志高和五十一团政委周志斌以及六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等同志都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敌人虽然屡次遭受失败，仍然集中了强大兵力向我军围攻。四月九日，敌十六师占领永顺县城。十二日，湘鄂川黔省领导机关退出塔卧、龙家寨，向北转移至龙山兴龙街。敌当日占领塔卧。由于敌人的不断围攻，根据地越来越小，我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至外线作战，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最薄弱的一环，以便粉碎敌人的“围剿”。敌人当时的兵力部署：东南面为陶广、李觉两纵队，是敌人的主力，那里地势较平坦，靠近敌人的中心地区常德、桃源，不利我军活动。西北面是张振汉、陈耀汉两纵队，他们是从北方调来的，对我根据地地形不熟，不善于山区作战，所以我军决定向桑植西北面突围，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驻桑植县城之敌人陈耀汉派出张万信旅，先占领了陈家河，企图阻止我军北进。二、六军团总部决定，

先消灭陈家河之敌，打开一个缺口。于是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陈家河敌一百七十二旅，激战一昼夜。第二天上午，六军团十七师之四十九和五十一团以及十八师一同上阵，敌人向我北山攻来，当接近我们部队时，罗章同志带领五十一团第三营象猛虎一样冲下山去，我军其他部队也随着一起冲向敌群，顿时，将张万信旅全部歼灭，毙张于陈家河畔。陈家河战斗后，我军休整一天，打扫战场，清查战果。据二、六军团总部判断，驻桑植城的敌人陈耀汉师，可能弃城向塔卧方向靠拢。如果乘胜打击这支孤立之敌，是非常有利的。果然不出所料，盘踞在桑植城内的敌北路纵队司令陈耀汉，见张万信部被歼，感到极大威胁，急忙率领其五十八师向塔卧的李觉、陶广部靠拢，当晚宿营于桃子溪。我们指挥部决定急袭这股敌人，立即命令红十七师五十团为先头部队，神速插向桃子溪，包围敌人；主力部队则从大路正面压迫敌人。我当时是六军团保卫局检察员，被派在十七师工作，跟随五十团前卫营行动。我军前卫营与敌打响后，迅速勇猛冲至敌炮兵阵地，敌人的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企图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我五十团前卫营和其他部队冒着大雨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当即缴获敌钢炮二门（有一门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敌人乱成一团，各自逃命，溃不成军，除陈耀汉率特务连部分逃走外，五十八师师部和一百七十四旅全部被我歼灭，俘敌师参谋长周桂先以下官兵约二千人，缴获电台一架，各种武器二千余件。陈家河和桃子溪两次战斗，是粉碎敌人“围剿”、恢复湘鄂川黔根据地、转入反攻的非常重要的战役。

陈耀汉部覆灭后，我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五月六日，湘鄂川黔省领导机关由龙山的兴龙街迁至桑植的茨岩塘。接着我军又收复塔卧，歼敌钟光仁一八四旅三六八团及补充

第五团。五月七日，在塔卧通往永顺路上之茶林坡，又歼敌六十二师一个整营。五月九日，军委分会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分析了两湖敌人的矛盾，决定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对湖北方面的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南方面的敌人采取守势。我军大踏步转向西北，以六军团一部包围湖北宣恩县城，创造围城打援的战机。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该师等部十一个团于十五日向宣恩增援，我军得悉，立即转过头向张部扑去，将敌分割包围，张的师部和三个团，被我军包围于湖北来凤县之中堡一个山沟里。敌人挖战壕和防炮洞，企图进行顽抗。战至第二天上午，王震政委令钢炮营向敌轰击。第一炮就把张振汉的参谋长炸成两截，又连发几炮，炸得敌人乱作一团。王震政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一面吃着锅巴，一面下令发起总攻。我们二、六军团从两面一齐夹击，仅用约三十分钟，就将敌纵队指挥部和三个团全部歼灭，当场活捉了张振汉，残敌四处逃窜。

中堡战斗胜利后，六月十八日，二军团以一个师围困驻守龙山之敌师兴吾、刘文华两个团（我军其余部队利用时间进行休整），造成大举进攻龙山县的态势，以便诱击增援龙山之敌，消灭其有生力量，为在龙山、来凤、宣恩、咸丰、利新等县建立革命政权创造条件。二十三日，我军一面开始围攻龙山县城，一面在茨岩塘成立了龙山县苏维埃政府；在沙道沟成立了宣恩县苏维埃政府；在空壳树成立了慈桑县苏维埃政府。七月三日，我军主力一部在永顺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敌陶广纵队，歼灭其一个师的大半。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李朴同志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七月十日，二军团在象鼻岭击溃增援龙山之敌潘善斋的独立三十四旅，歼敌五百余人。七月十五日，我军在胡家沟打垮了增援龙山之敌黄新纵队，给了敌人严重杀伤。我军围困龙山县城共三十五天，达到了

围城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于七月二十七日撤了龙山之围。陈渠珍部于二十八日仍来增援龙山之敌，我们六军团在招头寨与之激战了一天，给了陈部周燮卿等旅严重打击，敌人伤亡惨重。可是王震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了轻伤。红十七师师长苏杰同志和五十团政委方振生同志壮烈牺牲。

八月三日，新从北方调来投入湘鄂川黔战场的敌八十五师增援龙山，我军集结了二军团四师主力十二团，六师主力十八团，六军团主力十七师之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以及其他部队的优势兵力，突入敌人纵深阵地，凭着有利的地形和旺盛的士气，采取伏击方法，在板栗园与敌打响，只经几小时战斗，就将敌八十五师全部歼灭，击毙师长谢彬，我军乘胜解放了宣恩。这次战斗后，我军成立了一个俘虏师。我被军团保卫局派在俘虏师做清查工作。这些被俘虏人员都是北方人，过不惯南方生活，一吃大米饭，就泻肚子，我们只好将缴获的白面给他们做煎饼吃。我们这些在俘虏师工作的南方人，吃煎饼也不习惯，只好勉强跟着他们吃。他们开始对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受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害怕杀头。后来，经过我们的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他们逐渐消除了恐惧，也敢同我们接近和谈话了。我们经过调查，了解了俘虏的情况，清出了一些军官，争取了一些士兵，愿意参加红军的就留下来，不愿留下的，就按照路程远近发给路费回家。

八月八日，我军在芭蕉托经过激战，打垮了敌陶广纵队十个团。至此，我红二、六军团在党中央、毛主席及省委和军委分会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给了敌人歼灭性打击，取得了解煌胜利，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结束了反攻阶段。

八月二十七日，我军开始由反攻转入进攻，主力乘胜东进，在津市、澧县地区，击溃了孙连仲部、庄文枢旅、王育英团，先

后攻占了石门、澧县、临澧等县城，并占领了号称小天津之津市，一时声势浩大。我军在这一地区赢得了时间，扩大了六千余新战士，筹得了大批物资，震动了蒋介石。不久，敌二十六路军及樊松甫纵队向我津市、澧县进犯，积极布置对我军更大规模的“围剿”。我军于九月上旬撤离津市、澧县、临澧，向大烟塘、王家厂等地转移。在大烟塘和王家厂附近与敌二十六路军和樊松甫纵队激战一天后，于十月二日，进入石门山区的磨岗隘、仙阳、皂角市一带进行休整，宣传组织群众，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游击队，扩大红军。蒋介石于十月八日在湖北宜昌设行辕，派陈诚为行辕主任，指挥何健、刘建绪、徐源泉、薛岳、陈继承、孙连仲等二十二个师、五个旅，共计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加上团防部队约三十万人来对付我军。陈诚将其指挥的部队分为“进剿军”和“堵剿军”两种，“进剿军”装备优良，战斗力较强，逐段筑碉前进；“堵剿军”实力较弱，只能依恃碉堡，进行活动，配合“进剿军”进攻。敌人采取碉堡战术，对我军实行四面合围，逐渐缩小我军活动范围，企图将我军压缩于桑植、龙山一带的狭小地区，一举歼灭之。不久，我军由东返回桑植一带集结，十一月四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重要会议，决定突围部署等问题。会后，接到了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发来的电令，令我军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远征，北上抗日。我军奉令后，即在桑植一带积极进行突围远征的准备工作：从主力部队抽调部分部队为骨干，并将各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集结起来，组成了红二军团的第五师和红六军团的十六师，各师下辖三个团，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储备各种物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安置伤病员；选择突围的有利方向；暂时留下红十八师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该师在贵州铜仁江口归

回了建制)。我军主力于十一月十五日由桑植刘家坪等地先后出发长征，北上抗日。

我们红二、六军团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短短一年时间里，与优势之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牵制着敌人约三十万之众，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并创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些伟大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以任弼时、贺龙同志为首的省委和军委分会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指示，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所取得的。

坚持白区斗争的湘江特委

谢 介 眉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在洞庭湖畔、湘江之滨有一个党的地下组织——湘江特委，坚持了白区斗争。

（一）湘江特委的建立

湘江特委的领导人袁仲贤，原名达三，又名策夷，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战争时在蒋先云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任三营营长。“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军队中清党，党组织派他回湖南，同郭亮一起工作，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马日事变”后，同郭亮一道，到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在进军闽粤的战斗中，任师参谋处长。不久，又被派到海陆丰搞军事工作。随后党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回上海，开设酒店，掩护中共上海分局机关。后因上海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一九三四年，他与在上海工作失掉党的关系的李灿英（郭亮的夫人）一起秘密到了益阳，由李开一小小的缝纫店，掩护他在益阳、湘阴、长沙一带进行秘密活动。这年冬天，在益阳恢复了袁海清（大革命失败后，由铜官逃到益阳开瓦货店隐蔽下来的）的组织关系，在铜官恢复了杨东贵（后改名杨汉章）、盛炳章、熊福容等的组织关系，同时在益阳的达人纱厂、铜官窑上和湘阴的樟树港等地，发展了几个党员。

袁仲贤同志虽然恢复和发展了几个党员,但仍然没有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对他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寻找党的组织。他首先想去湘鄂川黔苏区,但因国民党封锁很严,几次都未通过。到瑞金中央苏区去,中央红军主力又已离开出发长征。最后从报上得知,湘鄂赣苏区的一部红军在黄金洞一带打游击,便决定去黄金洞。

一九三五年二月,袁仲贤化名周仁,打扮成铜官窑上推销窑货的商人,带着益阳的王振武(党员)同行(王打扮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士兵,假装到平江等地寻找驻军中一个当官的亲戚,要他回家结婚)。两人很顺利地经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检查,在进入苏区地界时,被游击队把他当作奸细押送到省苏维埃机关。湘鄂赣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严修阁,副主席曾国其,省委白区工作部长邓洪等同志,对袁进行了审查。袁在受审查时,把自己的简历、失掉组织关系的原因、在铜官等地建立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来苏区找党的关系的意图,向省委作了详细的说明。由于傅秋涛对袁有怀疑,便盘问他:在一九三二年后,党中央有哪些重要决议以及第三、四、五次“围剿”苏区的情况。袁一问三不知,更使傅认定他是企图混入苏区刺探军情的奸细。并因此在省委内部引起了一场争论。因为留在苏区的省委和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开始后,与中央也失去联系。在缩小了的苏区周围,国民党用层层碉堡包围封锁,连白区的报纸也看不到,对苏区以外的斗争情况全不清楚,把凡是从国民党区去的同志都怀疑为奸细,这是常有的事。加以看到袁的牙腮和腿上都有子弹的伤痕,显然是个军人,这次来苏区却是商人打扮,还带来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人,便肯定他是奸细无疑。但曾国其和邓洪二同志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蒋介石用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不怕,今天周仁两人赤手空拳来到苏区,我们怕什么?

据周仁说，他与党失掉联系后，在白区发展了党的组织，他现在来到苏区找党的关系，我们就应该派人同他去铜官，看看到底有没有党的组织。白区党的组织已经百分之百被破坏，如果铜官还有党的组织，那就证明袁所讲的是实，我们应当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游击区。省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决定由邓洪正式与袁面谈，研究如何开展白区斗争的问题。

不久，湘鄂赣省委派李明秋（化名黄明秋）由袁仲贤陪同顺利地到达铜官，见到铜官等地果然有党的基层组织，便写了报告由李楚云（同来的苏区交通员）送到苏区。接着李又回到铜官，传达省委指示，要袁仲贤在沿湘江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让李明秋留铜官工作，住在袁惠村家中。袁装成是益阳窑货店来铜官办货的客商。并筹备在樟树港办一个织布场，以掩护李明秋。袁仲贤则仍回益阳，领导当地的工作。

四月底，杨东贵、袁海清二同志，从苏区回到铜官后，传达湘鄂赣省委指示，在铜官成立湘江特委和少共特委。五月初，李明秋要我脱产工作，先担任铜官第一支部书记。中旬，又派我担任铜官区委书记。

五月下旬，交通员李楚云回到铜官，带来省委批准的湘江特委名单：特委书记袁仲贤，副书记李明秋（兼管组织），委员：袁海清（兼管工运）、杨东贵（兼管宣传）、谢介眉（兼管青运）、李灿英（兼管妇运）。少共湘江特委书记谢介眉，委员：余应龙（益阳达人袜厂染工）、彭炳宜（窑工）。李还传达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命令，委派姚友胜为湘江地下游击支队长。随即由李明秋主持召开特委会议，于五月底正式成立中共湘江特委和少共湘江特委，特委机关设在铜官。

特委会议决定：袁仲贤、袁海清、李灿英分工负责益阳的工

作，李明秋、杨东贵、谢介眉分工负责长沙、湘阴等地的工作，谢仍兼任铜官区委书记，兼管湘江地下游击支队的政治工作。

（二）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铜官自一九二三年成立支部和中心区委（当时是直属湘区党委领导）以来，党的组织一直存在。省委和长沙县委机关也曾一度设在铜官，说明那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但在一九三二年长沙县委遭到破坏后，铜官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一度与上级失掉联系。经过一段时间，外奔的党员才陆续返回当地隐蔽下来。湘江特委成立后，首先面临的任務就是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

当时特委成员对领导地下工作缺乏经验。袁仲贤是搞军事工作的，虽在上海做过掩护党的机关的工作，但没有搞过建党工作。李明秋长期在苏区工作，到白区活动很不习惯。袁海清只善于搞公开活动。杨冬贵懂得一般的秘密工作，但发展党员的经验不多，不过他认识铜官过去党员较多。我呢？什么经验也没有，只凭一股热情和干劲，只要是干革命，什么都不怕。但在青年窑工中认识不少人，并有一定的威信，这都是发展党员的有利条件。因此，特委便把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的任务交给我和杨冬贵负责。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曾经遇到不少的困难。

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到袁家湖支部去参加会议。这个支部的书记杜福阶和支委周春泉工作颇有办法，我想向他们了解一点关于巩固党组织的经验。听了他的汇报后，大家要我讲话。我想先讲一下特委决定发展和巩固组织的意义。刚说上两句，支部书记打断了我的话，不满地说：“你不会当区委书记，连讲话的程序都不懂，应该第一，谈国际形势，第二，国内形势，第三，本地区形势，第四，工作任务。这样，才象个上级讲话的样子。”我

初上战场，就碰上程咬金的三斧头，砍得招架不住，浑身冒汗。幸好周春泉出来解围，说：“谢介眉同志虽入党不久，年纪轻，党把重担给他挑，我们应该服从组织决定，服从领导。只要是上级派来的，就是一砣泥巴，我们也要尊重他，这是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一个支部书记，这样高傲地对待区委领导是不对的。”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启发。杜福阶的三斧头，虽使我受了窘，却使我认识到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学会分析形势，才能做好领导工作，但是，处在当时环境下，找不到一本马列主义的书，连党内文件也没有，如何学习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同李明秋商量，认为只有利用国民党的报纸，从他们的材料的反面和缝隙里去分析形势，考虑问题，这样一条学习门路，就是在那次支部会上被杜福阶“将军”将出来的。

在恢复党员组织关系的工作上，也碰了不少钉子。那些和组织失掉关系的党员，有的怕和我们见面；有的见了面，谈别的问题还可以，一涉及组织问题，不是回避，就是谈党组织被破坏后自己所吃的苦头，表现出一种消极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经过研究，采取了通过熟人串连，先摸思想情况，然后从侧面进行审查逐步引导的办法，不急于求成，果然收到了效果。例如有个张贵生，是一九二三年入党的，当年工作很积极，大革命失败后，去津市卖窑货隐蔽下来，回铜官后，对恢复组织关系也有顾虑。他经常到我家来，知道我是党员，可以无话不谈。通过和他交谈，才使我了解他们的这种顾虑往往是由于过去工作方法不对头而产生的。以前党员没有注意隐蔽身份，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党员，以致一个人出了事，别的人怕受牵连，都要远走高飞。党的组织也常常自己暴露自己，好象生怕国民党不知道有共产党在活动，布置党员到处贴标语、发传单，还要署出组织的名

称，等于向国民党告密。只要形势一变，敌人的打击一来，整个地区的组织部不免遭受破坏，有的党组织布置党员装成叫化子，在那个门口坐一下，离开时就贴上了一张共产党的传单，引起敌人去查户口、抄家，搞得人心惶惶，群众很不满意。所以党的组织被破坏后，党员不敢去找组织，怕又要他们去执行这样的任务。这种思想情况引起了特委的重视，认真研究改变了地下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使恢复党员组织关系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三年中，先后恢复了刘先梅、杨复生、肖海、陈桂生、李梅生、谢振华、张贵生、易七圣、胡保生、李楚才、钟保生、刘菊生等四十来个同志的党籍，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和“马日事变”后的党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在湘江特委的建党工作中起了骨干作用。

在发展新党员问题上，也走过一些弯路。有的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个发展对象，以为满有把握，直接向他提出入党的问题，结果遭到拒绝。他们有各种顾虑，如怕杀头，怕全家遭殃，怕别人嘴不稳，漏出来闯大祸，答应要他做工作是可以的，就是不肯入党。这是我们在工作中犯了急性病，不是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启发他们自己申请入党。有的同志碰过几次这样的钉子以后，感到非常恼火。

特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加强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方法。首先规定党的地下工作必须采取严格的秘密方式，党员之间，各级组织之间一律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是一家人，在父母、兄弟、夫妇当中，虽然同是党员，如果不是同一个党小组，也不能发生组织联系；遇事要相互保密；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也只准了解自己分管的那个地区的组织情况。所以我虽在益阳工作过，但对那里的组织情况，并不完全清楚。总之，每个党员都要做到：不应该知道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不应该参加的会议

不去打听。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必须严格遵守。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才使湘江特委在坚持几年的斗争中，一直没有暴露，从未遭到破坏。

其次，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纠正了急躁情绪和拉伕式的做法，强调从交朋友入手的经验。特委号召各支部的党员，到群众中去广泛交朋友，选择建党对象，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启发其政治觉悟。交朋友可以根据社会上的风俗习惯，采取各种方式，如结金兰、结同年、走亲戚、搞各种文娱活动等等。铜官地方习惯于在每年的古历三月十五和五月十三，邀集一些知心的人结为兄弟或姊妹，我们也就利用这种方式去交结朋友，在交朋友之间建立了感情以后，就有意识地谈些政治方面的问题，逐步提高对方的觉悟，然后根据情况交给他一点适当的任务，使他经受锻炼和考验。到条件基本成熟时，便启发他主动提出入党申请，再向他进行党员的基本教育，如党的性质和纲领、组织纪律等等，最后才正式履行入党手续。事实证明，凡是采取这种方法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可靠，在群众中，能起到先锋和核心作用。

当时，湘江特委领导的组织状况大致是这样：

铜官区委，书记谢介眉（兼），委员盛炳章、刘先梅。

区委下属支部有：班竹坡支部（原一支部），书记谭湘泉，党员有二十多人。高岭上支部，书记杨福生，党员有十六人。袁家湖支部，书记易长生（后于一九四〇年被捕，自首后被活埋），党员十人左右，沙湾祠支部（原二支部），书记周春泉，党员十人。峡口子支部，书记叶桂华，党员十人。花果园支部，书记胡迪凡，党员九人。长岭上支部，书记郭木匠（忘了名字），党员六人。尖家山支部，书记谢振华，党员三人。杨桥支部，书记周××（忘了名字），党员七人。马厂坪支部，书记张××（忘了名字），

党员四人。丁字湾支部，书记陈桂生，党员九人。

樟树港（湘阴）区委，书记蒋××（忘了名字），党员二十多人（抗日战争初期，我去审查时，发现有成份不纯的现象，有些党员虽然出身贫雇农，其实是流氓成份）。

益阳县城达人林广支部，书记余应龙，党员人数不详。

全特区共有党员约一百五十多人。

（三）向苏区提供情报和材料

三年游击战争开始后，湘鄂赣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围攻，加上孔荷宠叛变投敌（任湘鄂赣反共挺进纵队司令），对苏区威胁很大。红军一天天减少，苏区范围一天天缩小，供给越来越困难，电台也被摧毁了，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对各苏区的斗争情况全不了解。在四周碉堡封锁中，我们的人只能在黄金洞一带的山沟里转来转去打游击，与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指示湘江特委，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进行斗争，还交给我们一项任务，就是要利用白区工作的条件，不断为湘鄂赣省委收集、输送各种资料 and 情报。

这个任务交下来，逼得特委的同志天天忙着看国民党区的报刊，分析形势，观察动向，整理成书面材料，连同重要的原始资料一起送往苏区。交通员李楚云为此经常来往奔波。整理材料的工作，主要是由李明秋、杨冬贵和我负担。我们三人经常把收集的材料在一起分析研究，加以整理。我们曾先后把遵义会议、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和西安事变等消息及中央的一些重要决议、决定（例如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党中央发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和随后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等等）送到苏区。

这些情报由地下交通员携往苏区，自然只能用密写的方法。这个书写的任务也就落在我身上。当时的密写技术很原始，只是用笔蘸米汤（后来又用五倍子泡水）写在白布上，捆卷成匹，和其他的布一起打包，由交通员化装成贩布客，带到目的地后，用碘酒在白布上一涂，文字就清清楚楚地现出来了。

（四）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

湘江特委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活动，既要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完成上级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又要保护本身不被暴露和破坏，这样，斗争方式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根据情况，审时度势，灵活地采用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决不能粗心大意，更不能任性蛮干。下面谈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一九三七年二月，李明秋从苏区回到铜官，召开特委会议，传达湘鄂赣省委要特委利用春季窑工不能生产的时间，把地下游击队员，年青党员和青工中的积极分子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的指示。并指定由谢介眉作出训练计划，报告省委。这个指示，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杨东贵和我提出了不能执行的意见。我们认为，湘江特委的环境是白区，不是苏区，虽然群众基础好，党在群众中有威信，但究竟是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党的活动是秘密的，我们没有条件搞这种训练。道理很简单，如果集中上百数人，等于我们自己向国民党告密；铜官出来了共产党，在公开招兵买马了。因此，我们主张，特委应立即报告省委，说明不宜执行这项任务，这是关系整个特委组织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特别慎重。何况当时特委书记袁仲贤同志去延安未回，这样的大事，不能不听取他的意见。于是，李明秋只好同意向省委请示汇报。

不久，湖南省主席何健，为了加强他的军事实力，在全省推行社会军事训练，以长沙警备司令罗树甲为训练总团头目，长沙县以县长王伟能为县社训团团长，龙汉清为付团长，准备在铜官进行社训试点后，再向全省铺开。龙汉清是个极端反动的家伙，曾任铜官区剿共义勇大队付大队长。这次铜官搞社训试点，又是由他来当大队长。他带领几十个教官，来到铜官，挨户进行登记，凡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丁，都要参加集训。我们得到消息，何健想在铜官把青年窑工训练一段时间后，编成一个正规团，由龙汉清当团长，中队长当营长，分队长当连长，小队长当排长。编好以后，就要开往苏区进剿红军。而且这次训练，要工人放弃生产，整天参加，时间为四个月到半年，受训的没有供给。这样，一千多窑工和其他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成大问题。党的各个基层组织，纷纷向特委反映。特委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李明秋和袁海清主张发动工人和商人起来反对社训。杨东贵和我考虑到铜官商会与龙汉清是一个鼻孔出气，不会站在工人一边，应想别的办法来进行这场斗争。我提出：社训这件事，特委必须插手，打破反动派的阴谋，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既然阻挠反对已不可能，就不如干脆参加进去搞合法斗争。上次湘鄂赣省委要我们对窑工进行军事训练，那是非法斗争，行不通的，现在他们搞社训，我们正好借题目作文章。我们可以发动所有适龄党员和地下游击队员同群众一道参加进去受训，我们自己不花分文，让国民党来替我们完成军训任务，我们估计，这次铜官受训的人，按年龄计算，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中党员、地下游击队员和进步工人以及我们的知心朋友约有五百人左右。让这五百人都去受训，不是很好吗？特委经过讨论，采纳了我的意见，并派我领导这个工作，在社训队组织党的临时支部，由我担任书记，并派李明秋去苏区向省委

报告社训情况和特委的决定，可是李明秋被省委派去延安后，留在那里学习，一直未回铜官。这时，袁仲贤由延安回到益阳，通知杨东贵去汇报，同意了特委参加社训的决定。

我们按照特委的决定和部署，挑选了几个我们方面的人充当代表，去和龙汉清谈判。要求解决训练期间的生活问题，经过摆事实，讲道理，龙汉清被迫让步，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将训练时间改为三个月，整天操练改为每天早晚各操练一小时。

铜官社训大队分成三个中队，十个分队。街道居民编为一、二两个分队，陶业工人按地区编成八个分队。龙汉清把街道上的一、二分队当成他的御林军，纵容他们欺负窑工的分队，造成街道和窑工的矛盾。我们便利用这个矛盾去孤立龙汉清，借各种机会给他出难题，让他出洋相，使他在训练队失去威信，指挥不灵。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到六月下旬，工人们已掌握了一些军事基本动作，如变换队形、刺枪、射击等，达到了特委计划的要求。龙汉清也以为达到了他升官的目的，忙着向何健报告成绩。国民党省党部又命令龙汉清在社训队办政治训练班，准备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省军管区也通知龙汉清：司令罗树甲和县长王伟能要在七月初来铜官检阅，准备将社训大队正式编成一个团。特委开会研究对策，决定要我负责去发动群众，破坏国民党的阴谋。

政治训练班由龙汉清兼任主任，主要是讲三民主义，首先训练社训队的班长。为此，我专门找了一本《三民主义》，认真阅读，熟悉它的内容，然后召集班长开会（班长大部分是党员，地下游击队员和知心朋友），商量好在政治训练班中进行捣乱的办法。

六月底的一天，政治训练班开学了，龙汉清讲话，结结巴巴地瞎吹了一通，什么大家都要学习三民主义呀，都要参加国民党呀，等等。每当他或其他教员讲三民主义时，都有不少学员根据事先

想好的问题，站起来提问和插话，而且总是用孙中山讲过的话去驳斥他们的各种反动胡说，弄得他们张口结舌，丑态百出。

当龙汉清想在窑工中发展国民党员时，工人们就回答他：“我们都是做窑的工人，只晓得靠劳动过活，既没有文化，也不懂规矩，更没有钱请客送礼，没有资格加入国民党，家里的人也不会同意。”

龙汉清打的是如意算盘，碰到的却是各种软硬钉子，他最后只好承认：铜官的工人真是不好惹。

七月六日的上午，龙汉清把十个分队全部集中在铜官的大操场里，接受罗树甲的检阅。当他陪着罗树甲登上检阅台时，满以为会象平时操练那样整齐出色，谁知检阅还未开始，我们布置的捣乱计划就抢先演出了。

正在调动队伍的时候，我们借一、二分队的人未经许可跑到五、六分队喝开水的事，和他们吵闹起来，而且越闹越凶，队伍也乱了，急得龙汉清从检阅台跑下来制止。他问了一下情况，为了尽快平息纠纷，只好命喝水的人罚跪，一、二分队不服，一齐跑出队伍，跪在操场里，说是如不处罚五、六分队，就都不起来。龙汉清不知所措，跑上检阅台和罗树甲、王伟能嘀咕了一阵，又疯狂地跑到五、六分队面前，要用马鞭子打人，要将全体罚跪。我暗地示意一下，窑工的八个分队便嚷了起来，大操场里的整个队伍全乱了，大家纷纷高呼：“惩罚一、二分队！”急得龙汉清拚命吹哨子，队长们跑来跑去维持秩序，但谁也不听那一套。罗树甲见到这个场面，吓得站在检阅台上发呆，引起操场周围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

过了一些时候，直到龙汉清把喝开水的人押走，操场里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在检阅时，大家拖着疲倦的步伐，东张西望地通过

了检阅台。罗树甲、王伟能和龙汉清三个熊包呆呆地站在台上，气得象个灵官菩萨。

经过这一闹，吓得罗树甲把在铜官编一个团的计划取消了，他怕这些兵难管理，龙汉清的威信扫地，团长也当不成了。窑工们也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下决心要除掉这条地头蛇。

七月六日晚上，社训大队部的门口，贴着一张未署名的标语：“天天升降旗，今日剥龙皮；打倒龙汉清，齐心抽龙筋。”这是一个工人自发地偷偷干的（以后一直未查出是谁），却说出了铜官群众的心里话，所以很快就传开了，工人们川流不息地跑去看。

这下龙汉清可发疯了，马上下令彻底追查。一、二分队为了报上次检阅时吵架的仇，便向龙汉清告密，说是王保生干的（王保生是个窑工，五分队的一个班长，那次吵架是他首先制止一分队的人喝开水而闹起来的）。龙不分青红皂白，马上逮捕了王保生，扬言要严加惩办。群众非常气愤，要求设法营救王保生。

特委认为不能坐视，应当领导这场斗争。便开会进行研究。有的同志主张发动全体社训工人，去长沙向何键请愿，要求释放王保生。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不妥，是送肉上砧板，何键正求之不得。他肯定会首先把为头的抓起来，请愿群众孤悬外地，生活无着，有分化瓦解的危险。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认为为了搞掉龙汉清，营救王保生，只有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先理后兵。首先激发群众的愤怒和仇恨，硬逼着龙汉清放人，如果他顽固不答应，就组织基本力量，把王保生抢出来，甚至把龙汉清干掉，替人民除害。如果乡公所的武装出面干涉，我们就组织地下游击队员抢枪，干脆带领社训工人队伍去黄金洞，与湘鄂赣苏区会合，这是最后的一手。但在行动时也要力争不暴露党的组织，最好是把这件事做得看起来是群众出于义

愤自发干的。会议还决定派杨东贵立即去益阳，向袁仲贤同志汇报请示。

七月九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下午，突然传来社训大队明天要回长沙，龙汉清要把王保生一道带走的消息。情况紧迫，等袁仲贤的指示已来不及了。我马上通知社训队的班长、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于当晚以去泗洲庙看戏为名，开会布置行动计划，决定派易金榜（党员）带一批会武术的青年工人，于十日上午乘大家列队欢送的机会，包围社训大队，抓走龙汉清，救出王保生；与此同时，由湘江地下游击队长姚友胜，带领队员到乡公所，监视反动武装。会议要求与会人员，连夜分头发动群众，于第二天上午按分队集合，去河边欢送社训队的长官搭船回长沙。

我们刚刚把任务布置好，放哨的工人慌张地跑来，说社训大队的分队长、教官在看戏时，知道庙后正在开会，他们私下议论，认为开会肯定是为了王保生的事，看来我们的计划有暴露的危险。我听后思考了一下，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和日本已经打起来了，国共合作的呼声正高，形势有利，还怕什么！干脆利用他们与龙汉清有矛盾，对社训队进行分化瓦解。于是立即派人把他们找到庙里来，开门见山的向他们说：“龙汉清仗势欺人，逮捕无辜工人，而且不听劝告，要在明天押往长沙，铜官三千陶业工人和一万多人民群众非常气愤，决心救出王保生，扣留龙汉清，不准他回长沙。”他们听了，惊慌得发抖。我又进一步说：“这事与你们无关，但要讲清两条，第一，你们如果胆敢向龙汉清告密，那就请你们也和龙汉清一样，一起留下来，交群众处理。你们已被铜官一万多人包围起来，几万只眼睛盯着你们，跑是跑不掉的。第二，如果你们保证做到不泄漏出去，那末明天上午，我们也保证让你们安全回到长沙。两条路随你们选择走哪一条。”他们听

后，才松了一口气，满口答应，保证不走漏一点风声。我们又补上一句：“话已讲清了，就是走漏风声我们也不怕，反正你们已处在包围之中，希望你们放聪明点，自己赶快脱身，日后也好相见。”

十日上午，铜官一万多群众，纷纷来到街上和河边看热闹，窑上八个分队敲锣打鼓，送社训队官员上轮船。突然，易金榜带领一群精壮青年，跑到大队部，大叫：“龙汉清把王保生交出来！”龙汉清气势凶凶地来到门口，拿出手枪喊集合。工人周桂生乘龙未提防，上前一拳，击落龙的手枪。工人张国和、朱念存等拥上前去，用绳子将龙汉清捆绑起来。登时人声鼎沸，齐声高喊：“打死龙汉清！”工人们押着龙汉清游街，沿路群众纷纷拥过来，拳打脚踢。谁知龙练有气功，根本不在乎，反而用仇恨的眼光盯着每一个打他的群众，好象心里在记帐似的。大家气不过，拿出一根索子，套在他的脖子上，使劲一拉，这条恶棍就一命呜呼了。

驻扎在乡公所的反动武装——铜官剿共义勇队，知道外面出了事，但见街上窑上人山人海，愤怒的群众有如火山爆发，自知不是敌手，再加上他们本来与龙汉清有矛盾，便带着枪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铜官附近的农民，听说绞死了龙汉清，都川流不息的来看他的尸体。有的扔石头，有的吐唾沫。都说：“这只恶狗也有今天！”

“铜官工人做了一件大好事，替我们除了一大害。”

我找到袁海清，商量善后工作。我们估计何键一定会派军队来铜官抓人。为了保护群众和党组织，决定立即进行疏散。首先疏散曾在泗洲庙参加开会的那些同志，要他们赶快离开铜官；凡参加社训的党员和工人，都到乡下的亲戚朋友家里住几天，等风声过了再回来；袁海清同志在这次事件中公开露了面，也必须隐蔽起来。凡是疏散对象，天黑前一律离开铜官。

打死龙汉清的消息很快传开。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登载：“共匪郭亮的余孽袁海清，在铜官煽动乱民，打死长沙县社训团付团长龙汉清……”。从消息报导看来，这次行动，除袁海清外，党的组织和党员，都还没有暴露，所以我放心地隐蔽在窑上，观察反动派的动静。

十二日一早，何键果然派一连人来铜官抓人，扑了一个空。留在铜官的，尽是老弱妇孺，仅带走了伪乡长和几个国民党分子，他们自以为没事，放心地留在家，作了义务的替身。以后抗战开始，何键垮台，也就没有人再来追究这件事了。

不久，特委派我和袁海清、杨东贵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和参加“八一宣言”发表一周年纪念大会。因缺少旅费，我就改去津市、常德一带，安排疏散同志的工作和生活去了。

（六）湘江特委的结束

十月，我由津市回到铜官，袁海清向我详述了去延安的经过。他说，他们向董老和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铜官斗争的情况，董老认为做得对。毛主席也接见了他们，对铜官的工作做了肯定，认为符合白区斗争的策略。

不久，袁海清同志被调到安源工作，他临走前告诉我：延安最近会派李涛同志来湖南工作，届时他会来铜官找我，并把接头暗号交给了我。后来，杨东贵从延安回到铜官，才知道李涛在来湖南途中，于武汉转车时，由于同行的一位同志不慎失密，被国民党宪兵查出大批党内刊物，要将他们扣留。董老认为李涛已经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做秘密工作，把他留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所以不能来湖南了。

十二月份，袁仲贤通知我和杨东贵去长沙，与中央派来的湖

南省委接头。我们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招待所（东长街徐祠巷明达小学内）见到了王凌波主任和徐特立同志。徐老那种老当益壮、为革命工作不知疲倦的精神，使我们感动得流出热泪。

我们还听了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和省委宣传部长任作民同志作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的报告，感到既新颖，又亲切。省委还送给我们很多小册子（如《反对自由主义》、《抗日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等）和党内刊物，这些东西也是我入党以来从未看到过的，真是如获珍宝。在长沙一个星期的学习，使我懂得了新形势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确是满载而归。

这时袁仲贤已调去山东搞军事工作，李灿英已调去做儿童保育工作，袁海清又早已去安源（后自动脱党），湘江特委原来的领导成员都已星散。湘鄂赣省委改为平江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湘江特委的组织关系，则移交湖南省委，在湘江之滨斗争了三年的湘江特委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省委决定，在铜官成立中心区委，由省委直接领导，并派我为铜官中心区委书记，杨东贵暂留铜官协助工作。

从此，铜官中心区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的几件事

汤 荆 中

我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今年八十三岁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的一些重要过程。最近，宁乡县人民革命史编写小组和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我回顾这段漫长的历史，我也有义务提供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以供党史工作者参考，爰就记忆所及，简要叙述于后。

（一）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宁乡传来了马列主义，也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赵恒惕政府想利用这个招牌，装饰门面；宁乡进步人士，则利用这个阵地，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云山学校和宁乡甲种师范学校（简称甲师）是在宁乡开展这一革命工作的摇篮，力行其事的，则为这两校的老师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梅冶成、陈章甫（陈昌）等革命前辈。

一九二三年秋到一九二五年冬，我是宁乡甲师第二班学生。学校放寒暑假时，老师就动员我们回乡办平民夜校。我先后在汤氏箬山小学、成氏梅湖小学、学堂弯李家祠堂等处，同汤克明、成祐之、成一中、李小泉、李少泉第十多人一起办学。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尽义务教学。还要到处募捐，替学生买课本；到处搜集废纸，供学生习作。学员是附近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开

始不大相信我们，只有少数男青年来进夜校，后来，连老的、女的也来了。有的夜校学员多达四、五十人以至百来人。教员都抱着高度的教学热忱，争先跑上讲台授课，学生也都争先到校认真学习。教学的内容只有两项，即文化课和故事课。文化课本最初是教师自己编的，后来采用李六如编写的《平民课本》。这是当时对工农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启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一部好书。内容由浅入深，文字由短而长，通俗易懂。第一册中有“衣、食、住的由来”一课，简要说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第二册中有“分工互助”一课，简明地揭示了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原因。第三册中有一课说：如果大家不赶快觉悟团结起来，将会埋在十八层地狱底下，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这样的文化课，实际上是马列主义的政治课。上故事课时，也多是旧瓶子装新酒，古为今用，或讲历代农民革命故事，或讲外国人如何压迫剥削中国人，或讲团结战斗的民间传说。这就把一堂故事课讲活了，也把革命道理讲透了。讲台下有时鸦雀无声，有时议论纷纷，有时也愤愤不平。通过平民夜校，提高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觉悟，培育了革命积极分子，为建立秘密农民协会打下了基础。一九二四年冬到一九二五年底，薪水四乡、流沙河、灰汤等地的平民夜校的学员中，就有秘密农协会会员约八百余人。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是怎样办夜校的？》发表在甲师校刊上。林若虚老师看见了这篇报导文章，作了一个评语：

“好人好事好文章，震聋发聩开民智”。这篇文章是总结参加夜校的工农群众的思想认识写成的，在认识上还不免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我则通过平民夜校的实际锻炼，开始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虽然我对革命理论还懂得很少，还没有跨进人民民主革命的大门，但却牢牢记住了屈原的《楚辞》中的话：“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的雪耻会

一九二五年春节前，毛泽东同志从广州回到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他在家乡养病期间，利用平民夜校培养建党对象，组织秘密农会。“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亲自在韶山如意亭杨家庄建立了雪耻会，吸收入会的有郭咏泉、柳季刚、成正清、彭卓夫、汤弼中、杨德松、钟志申、李耿侯、杨明坤、杨舜琴、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谭天民、贺尔康等同志，共约六十余人。进步人士刘润山运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写了一篇宣言，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地主对贫雇农和手工业工人的剥削，提倡国货，不用仇货。毛泽东同志称赞他写得好。当时农村粮荒严重，毛泽东同志就动员雪耻会搞经济斗争，平抑农村暴涨的粮价，并要求减轻农民的租额负担。恶霸地主蒋巨海、汤峻岩、成胥生等人告到长沙，请求赵恒惕政府捉拿毛泽东。农民郭士夔等听到了这个消息，当夜就飞跑到韶山报信，毛泽东同志便马上离开家里，绕道回到广州去了。

雪耻会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到农村宣传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罪行，喊出了各种革命口号，广大的革命人民都叫好，但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反对。如宁乡靳江小学有个叫成柏安的教员，一向崇洋惧帝，写了一封信给雪耻会，嘲笑我们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是不量力的幼稚行为。我们当即予以驳斥，并向靳江小学提出抗议，终于使这个教师受到了该校师生的谴责。

我参加雪耻会时，还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没有认识。通过“五卅”运动和雪耻会的教育，才开始投入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三) 宁乡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宁觉”

宁乡甲师和云山学校是宁乡人民革命斗争的两个摇篮。宁乡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建立于甲师。先后在甲师担任教职员的有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陈章甫、梅冶成、许抱凡、喻棣芳等革命前辈。喻棣芳老师在一九二三年写了一篇《学说浅释》，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教公民课时，就以这篇文章为教材，深入浅出地宣讲马列主义。这时宁乡的卫道士们叫喊：

“宁乡的风气之坏，就坏在何叔衡的《通俗日报》，坏在喻棣芳的《学说浅释》。”我们甲师同学对这些顽固分子给予了愤怒的回击。梅冶成老师教地理课时，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痛斥军阀丧权辱国的罪行，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拍案振臂，大呼报仇雪耻，学生无不为之感动。谢觉哉老师教国文课时，用他自己写的一篇《释团练》的文章作教材，揭露宁乡团防势力镇压人民的罪恶，土豪劣绅对他咬牙切齿，学生则从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由于这些革命前辈的言传身教，在甲师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为宁乡建党创造了条件。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湘区委（即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来到甲师，主持宁乡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大会，并决定这个支部直属湘区委领导，简称“省直特支”，代号为“宁觉”，取宁乡人民觉醒了的意思。参加这次入党宣誓的有夏尺冰、何立前、喻尔声、杨文寰、严凯成（这五位同志后来都成了烈士），戴卓良、严岳乔、刘之康、李拔群、尹正良、周湘圃（之舞）共十一人，多半是甲师学生。胡晖任支部书记，许抱凡为宣传委员，戴卓良为组织委员。胡晖是甲师学生会会长，一九二四年他以宁乡学生代表身份，赴长沙参加学代会，在会议期间，被吸收入了党。他

回宁乡后，积极开展建党工作，甲师第一批党员大都是他介绍入党的，许抱凡入党很早，是一九二一年他在长沙一师附小教书时，与何叔衡朝夕相处，由何介绍入党的。何立前是何叔衡、姜梦周两人介绍入党的。他在入党宣誓时讲过这样几句话：“混了半生，总算找到了真理，今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他实践了他的誓言。

我在这些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经胡晖、梅冶成介绍，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甲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特支的成员之一，我入党后，宁乡县委许抱凡、梅冶成要我到玉潭高小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工作，并兼任宁乡县农民协会秘书。我经常率领进步学生到靳水四乡和浏江流域及益阳飞山港等地，以演戏和组织游行示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并协助当地农民，镇压了大恶霸汤峻岩、刘昭和杨致泽，一度在这个地区掀起了革命高潮。

（四）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宁乡和全省各地一样，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肯放走一个”。仅在宁乡麦田乡，就杀害了三十多个革命同志。我的甲师同学何立前在长沙牺牲前，曾经对他的通讯员文少祥说：“我生是为了流沙河的苦难人民，死也是为了流沙河的苦难人民。我死后，要把我埋在响锣山，望着流沙河的苦难人民。他们总有一天会要翻身的。”他的遗言在全国解放后终于实现了。我的又一个甲师同学杨文襄被捕后，在敌人的法庭上，大骂土豪劣绅，推倒法庭公案，用石砚投击法官，反动分子为之心惊胆战，经过十几个日日夜夜的严刑审讯，他已是血肉模糊，体无完肤，最后壮烈牺牲。这年农历十

二月三十下午，我的入党介绍人胡晖、甲师同学汤忠澧及我的堂兄汤菊初，又都在备受酷刑之后，一同牺牲于宁乡县玉潭桥南的驿马坪，他们在临刑时，都曾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此短暂的半年中，我们县里还先后牺牲了文经西、易嘉胜、杨春楼、刘学陶、蒋国梁、廖正良、袁鹤皋、李福生等多位同志。我的甲师老师喻棣芳被捕后，在狱中写了一首题为“中秋吊月”的诗，诗云：“中秋原月白，今夜何墨黑？血染洞庭红，又溅出燕北。宇宙大牢笼，肃杀成浩劫！”我就是在这个“肃杀成浩劫”的日子里，被迫离开宁乡的。

一九二八年春，宁乡的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我被反动派通缉，军警多次对我进行追捕。在此情况下，我已无法在宁乡进行革命活动，只得前往武汉，想通过陈永清（原名成正青）找到党的组织。到武汉后听说陈已被捕，便只得和成一士东下南京。这时甲师同学刘立青已在国民革命军当排长，我即在他的掩护下，在他们部队里教文化课，对士兵宣传革命道理。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刘立青的部队调去武汉，我离开了他那个部队。随后找到黄钺先生。黄是宁乡西冲山人，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在甘肃秦州（即现的天水市）起义，成立甘肃革命军政府，出任甘肃都督，后因对袁世凯不满，被袁革职。他即追随孙中山先生讨袁（世凯）、驱张（敬尧）、倒吴（佩孚），以后并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是国民党的左派。他介绍我到山东莱芜成先杰先生（梅冶成同志的亲家、民主人士，也是我的小同乡）那里避难。不久，又随成转到湖北麻城。这时的麻城也同宁乡一样，革命人民日夜在流血。成对我说：“古人有句‘杀人如麻’的话，恐怕就是指这个地方吧。此地不可久留。”因此我们就离开了这多灾多难的麻城。

一九三〇年春，黄钺先生介绍我去民国大学找该校校长周震麟先生。因有黄的介绍，他资助我进了民国大学读中文系。我在民国大学读书时，结识了翦伯赞和李公朴两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进一步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北平各大学学生组织南下请愿团，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我就以悲愤交集的心情，参加了南下请愿团，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北平、上海学生在南京游行示威时，又遭到了蒋介石的残酷镇压。当学生请愿队伍刚走到南京城北成贤街时，大批宪兵和便衣特务就从街道两旁冲杀出来，打死打伤许多学生，许多人被推到河里，许多血流进了河里。我被打伤，并被推到珍珠桥下，几乎淹死，幸得同学把我救起，安置在鸡鹅巷清源小学黄育才、林克雄等几个同乡好友那里治伤养病。到一九三一年冬我伤愈病好，通过地下党同志许抱凡的介绍，前去上海，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与马浪路转角处天生祥酒店楼上，找到了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王凌波（化名王抚之）、梅治成（化名李治盛）两同志。这时王戴着四百五十度的老花眼镜，正在夜以继日地为党的事业刻钢板，象他这样一位有学问的老党员，党要他刻钢板就刻钢板，而且工作的时间很长，十分辛苦，他却乐而为之。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的好榜样。

我在上海没有住好久，王凌波即通过中央军委，派我和黄冠群（我化名汤鼐，黄化名黄因）回湖南，找江南红二十五军第二师联系工作。这支部队，建立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师长严岳乔、政委徐上达，都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在宁乡、安化、湘潭、湘乡等县边境山区游击，环境很艰苦，斗争很复杂，部队几起几落，牵制了湘中五县的地主武装。我们化装进入湘乡，住在华兴旅社，趁黑夜出发，分途寻找红二师的驻地，老黄去宁乡灰汤一带，我

去潭、湘、宁边区。我找到了潜伏下来的党员彭卓夫，他说红二师在高露乡、石潭乡打过几仗，抢了乡公所的枪，以后转移到雪峰山去了。我又找到了汤麓秋老人（革命的同情者，毛主席曾称他为老师），问他，他也不知道红二师转移到哪里去了。我只好仍赶回湘乡。刚走到华兴旅社门口时，老板刘康生连忙向我摇手，我知道一定是出了问题，马上避入对门商店里，见黄冠群被一群敌警绑出旅社，将他带走了。我在万分焦急中想起了老黄有个老朋友李植根在湘乡东山学校教书，就去求救于李老师。他慨然允诺，并要我赶快离开。经他营救，黄冠群本可很快获释。不料事出意外，王凌波根据我们行前约定的地址，用化名从上海寄来了一笔钱，名义上是给我们做生意，实系作党的活动费。敌人见财起心，又为了邀功，竟把黄押解到长沙清乡司令部。几经严刑审讯，老黄均未招供，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被敌人杀害于浏阳门外识字岭。据烈士的家属告诉我，黄就义前，写下了一首壮烈的诗：“酸辛遍体尽伤痕，骨肉行抛杂草丛，记取浏阳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当时敌人正在到处搜捕我，还派出军警到宁乡抄我的家，拘捕我的家属，弄得我妻离子散，全家逃亡在外，乞食为生。后来，我的父亲和弟弟因事回到家里，敌警又来搜捕他们，幸得邻居陶瑞村夫妇（现任宁乡县人大主任陶季斌同志的父母）多方维护，始得脱险。我在第三次东下京沪的船上，想起了许多战友的牺牲和自己的遭遇，不禁感慨万分，默默地念着一句古诗：“漫漫长夜何时旦！”

我回到上海，向王凌波、梅冶成两同志作了详细汇报，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安全，要我暂时转移到杭州两湖会馆李拔群同志的住处隐蔽下来。不久，红二师师长严岳乔也因部队被打散，左脚被打伤，从湖南经上海到杭州与我同住一起。还有刚从武汉出

狱的陈永清、黄力佛两位同志，也经党组织介绍，由我亲去上海把他们接到杭州休养。我们几个地下党员，每天清早起床，就去爬山涉水锻炼身体，以利今后再战。在反动派杀人如麻的日子里，我们就是这样度过来的。

（五）在南京搞地下互济会

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救济被关在监狱和流亡到本地的地下党员。一九三二年秋，在党中央技术部工作的王凌波介绍我到南京互济会工作。为了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我又去找黄钺先生想办法，他介绍我到南京内桥湾贫儿教养院教书。这个教养院是黄兴先生早年创办的，院长徐宗汉女士是黄的遗孀。由于徐院长不支持我们搞互济活动，我就找到了黄锡恭（党的同情者，马日事变后在宁乡掩护过我），在他和他的爱人柳树仪的掩护下，就把他们的家作为互济会活动的据点。头一年，王凌波每月从上海寄点钱来作为互济会的经费，我也把我的工资收入除了必需的生活费用外都交给互济会。王在上流被捕后，互济会所需的经费，就完全由我负责筹集。我为了解决互济会的经费问题，千方百计地找到乐育、学艺、现代、三民等四个中学教课。由于任课多，负担重，每天来回奔跑，不免心力交瘁。但我总是想着在牢狱里受苦受难的同志们，便忘记了自己的一切。我每次领到了工资，就去买些吃的、用的和学习的东西，拿到柳树仪家做好包好，由我和汤子声、陈泽纯、杨明坤、黄育才等人，以亲属的名义把这些东西分别送给在狱中的各个同志。当时关在南京汉西门外陆军监狱的有陶铸、曹瑛、梅冶成、毛福轩、徐上达、余喜文、龚饮冰等同志。关在城北中央监狱的有王一清、戴云等同志。龚饮冰是黄钺的女婿，经黄的营救，出狱较早。戴云、王一清两

同志也是我请得黄钺先生营救出狱的。陶铸、曹瑛、陈永清、梅冶成、徐上达等同志，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南京营救出狱的。毛福轩同志，不幸于一九三三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他的遗体是我亲自埋葬的。那个葬地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我们几个人每次去探狱，我照例要到每个窗口去看看问问，而我的话又比别人多，日子久了，引起了看守人员怀疑，受到敌人监视，我也就更加谨慎一些。

互济会的另一任务，就是救济流亡或转移到南京的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我在南京学艺中学，有两间小房子，最多时住过十二个客人，其中有地下党员陈永清、尹泽南，徐上达、严岳乔、余喜文（烈士）、杨子寿、喻中阳（烈士）、廖长顺、高振民、黄赤三、肖荣肤、李鹿门等和进步人士王世则、孙南栋等。大家都在地板上睡觉，肩摩踵接，热气腾腾。没有被子盖，有的人就和衣而睡，有的人则盖草席。走进室内，就象走进了“叫化子窝”。有的同志离开这个窝时，连草席都舍不得丢，把它夹在腋下带走了。我的胞妹汤子声和儿子汤震宇，都因为在宁乡不能安身而逃到南京。汤子声在缝纫学校教课，离我的学艺中学只有一里多路，她每天一下课，就来到“叫化子窝”帮我们做饭菜，吃了饭又赶去上课，还挤出时间替住在这里的同志缝缝补补。汤震宇只有十四岁，患肺结核，不能到贫儿院上学，也帮我们做些杂事。因为“叫化子窝”的“食客”很多，我的工资收入每月只有几十元，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只能以烧饼度日。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之间都能互相关怀照顾，真是情逾骨肉。

（六）从西安遇险到大荔出狱

我在南京搞了四年多地下互济会的工作，接触面较广，身份

有所暴露，已不能在南京立足了。适逢大革命时期在党组织里工作的丁祐芬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了南京，他邀我同去西安，找到了老地下党员向愚，通过他的介绍，我同西安地下党负责人江隆基取得了联系。江的公开身份是西安第二中学校长，我就暂时住在他那里。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党中央派伍云甫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向、江把我介绍给伍，伍为我接上党的关系，并把我安置在西安难民教育处当主任。我一方面帮助难民解决生活困难，向难民宣传革命道理；一方面从难民中挑选进步青年秘密输送到延安和我党主办的荣阳青训班学习，其中有王石、赵特夫等共一百多人。当时国民党为了阻止青年去延安，或公开设卡，或密布暗探，去的人有被赶回的，有被逮捕的，也有被暗害的。他们还设置便衣，扬言要杀害我。幸得民主人士朱雪真先生通风报信，大力维护，我才得以及时隐蔽下来。朱先生是湖南同乡，参加过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同志到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时，曾同朱有过密切联系，请他参加了西安和平谈判协议条款的起草工作。一九三八年，他在陕西省银行任主任秘书，对西安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由于我不断输送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被特务袁德新、彭旺臣、胡寅峰（彭、胡都是湘阴县人，解放后经我检举揭发，受到镇压。）所发觉，加以我揭发他们贪污救济难民物资的罪行，他们便密谋加害于我。朱先生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对这些坏人提出有力的驳斥和警告，迫使他们不敢下手，我才得以脱险。

我在西安实在站不住脚了，经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和江隆基两同志介绍到陕西大荔县立中学教书。该校是老党员姚一征创办的，并由他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我们在校内进行了革命活动。这时有个汤戈旦从延安带来了几百本党内书刊，都藏在我的寝室里，

由我分发借给贺丕烈、王怀堂、郝旭东、姚德昌、杨信义等进步学生学习。有一次贺丕烈向我借了一本《共产党宣言》，不慎被特务刘继昌发现，敌人即进行搜查，在我的房子里搜出了这一大批书刊，特别是搜出了谢觉哉同志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信纸信封写给飞的一封信，我和贺丕烈即因此被捕。我入狱后，遭受了敌人的严刑审讯，我忍受百般折磨的痛苦，始终坚持了我的入党誓言，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秘密，没有牵连任何同志。敌人对我就更加仇恨了，决定把我杀害。我在此关键时刻，决心以死报党，写了一封绝命书，买通看守人员寄到我的家里，勉励后代继续革命。不料绝处逢生，我又幸而得救了。因为当时国民党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的女儿陶铸仁（现名陶蕴华）姐妹是我在大荔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她俩得知国民党要杀害我，马上从大荔县赶到西安，要求她父亲出面营救，陶将军的秘书袁石安是同情我党的民主人士，与我早有交往，也尽力为我说话；于是陶峙岳将军亲自赶到大荔县（他的防区）邀同他的部下三十六军军长赵锡光一道把我营救出狱。

我出狱后，仍被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境，勒令回湘。在我回湘途中经过成都时，找到了过去在南京经我请得黄钺营救出狱的王一清、戴云两同志及曾在南京协助我做互济会工作的学生陈泽纯，他们对我的逆旅生活，给了很多帮助，并护送我到了重庆。我到重庆后，会见了老同志王自申、易礼容及过去在南京支持我做互济工作的黄锡恭、柳树仪夫妇。由于得到他们的帮助，使我顺利地回到了湖南，这时已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初了，我到家后，即会见了黄钺先生，我们畅谈了当前的大好形势和我近几年的遭遇，他兴奋地展纸濡墨为我写了一首对联：“天留余地开新运，人以无私致大同。”这说明黄先生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寄予了何

等真挚的信仰和热忱的企望！

（七）为培养革命青年创办学校

我回宁乡后，立即找到了韶山地下党负责人毛月秋，接上了党的关系。后来，在地下党员周汉平、庞桂中、周太暄、王野渔、周政等同志的支持协助下，首先在韶山创办复兴中学，接着又在宁乡紫林创办宗一中学，作为地下党活动的据点。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经常以卖布为掩护，化名唐老板，来到这两个学校联系，在学校里建立了党组织，并在宗一中学成立了紫林特支，由省工委直接领导。我们以宗一中学为据点，先后接受了地下省工委和湘中地工委派来的党员周太暄、何大群、田文、魏之文、王野渔、成治平、方用、汤子声、李卫中、成之桓、彭卓夫、黄力佛、汤甲真等同志来校任教，在学校里开展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协助紫林特支创办宁南女校和农民夜校，以周太暄为校长。他和爱人陶涛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调走后，经我商得特支书记王野渔的同意，派汤子声、汤健民接任校务和教学工作。我们在宗一中学、宁南女校和农民夜校，先后吸收党员五十多人，其中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党的骨干。一九四八年冬，湘、宁、潭地区地下党在湘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时，我又把宗一中学作为地下武装的联络据点。省工委派到湘中一支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如郭仁诚、刘正及医生陈枯鑫等十余人以及送往湘中一支队的一批医药器械，都是经过宗一中学由汤健民护送过去的。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前，我和周太暄、王野渔、许抱几诸同志，还把宗一、复兴两个中学联合起来搬到宁乡卓冲，使许多流亡学生免于失学。这时，毛泽覃烈士的遗孤毛楚雄的生活和安全，都处于困难境地，韶山党支部书记毛月秋就把毛楚雄交与

我，由我把他安置在宗一、复兴联合中学读书，并由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直到三五九旅北上时，我根据韶山党支部的通知，把毛楚雄同志送交三五九旅带去延安，不幸，在中途被敌杀害。

此外，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地下党省工委决定在长沙熙宁街设立秘密机关，需要营造几间房屋，号召党员捐献建筑费。我商得弟妹的同意，将我们教书所得工资银洋二百四十元捐出。这年秋初，我们又为湘、宁、潭边区地下党组织筹措银洋一百五十元，作为在韶山如意亭党的活动和开办友谊书店的经费。

（八）为三五九旅南征开路当说客

一九四五年六月，王震司令员和王首道政委率领三五九旅南征，进入湘北，逼近湘中。国民党用全部美械装备的“忠义救国军”好几千人，陈兵于三五九旅将要进军的途中。这是一支积极反共的部队。即使它不敢正面阻击三五九旅，至少也会起些扰乱的作用。韶山党支部书记毛月秋，派向保生通知我，要我利用我同“忠义救国军”司令何际元有同乡同学关系，深入虎穴当说客，为三五九旅南征开路。我接受这个任务后，即从我的家乡三仙坳出发，冒着倾盆大雨，通过泞泥的山路，跌跌撞撞，昼夜兼程，奔走一百八十多华里，赶到宁乡、安化边境的田坪里“忠义救国军”司令部驻地。时已深夜，何际元正在司令部大摆筵席，招待来自重庆的“贵宾”及当地官绅。他见我满身泥水，突然到来，急忙问道：“老汤，你有什么事？”我首先讲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转入正题：“老同学，恕我无礼，匆匆踏入高门，对不起满座贵宾，请司令包涵包涵，让我说明来意。”他很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那你就说吧！”我说：“我的家乡盛传八路军三五九旅过了洞庭湖，逼近了长沙、宁乡边界，这些地方正是司令的防区，请问司令有何对策？”

何骄横地回答说：“那有什么话说，他们来了，我就以美式枪弹迎接！”我看着他那股顽固的神气，就仿效张仪游说楚怀王的故事，装着为他出谋划策的神态说：“司令高见，可佩。但八路军远从延安出发，转战几千里，沿途都有国军堵击，也曾碰到了不少美械装备的部队，现在竟能来到湖南，决不可小看，连日本鬼子也闻风丧胆，不敢硬拚，司令若以枪弹相对，深恐有伤你部元气。”何际元听了我这番话，即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把他的军帽往桌上一砸，杀气腾腾地对着我嚎叫起来，说：“老汤，你赶快把你的红帽子取下来吧！”我却冷静而幽默地笑道：“何司令，请你先不要管我是红帽子，还是黑帽子，甚至是绿帽子（这时有的客人笑了），只要看看我跌成这样一个泥人。不辞路远而来，向你这位老同学进忠言，是不是有三利：一、是不是有利于打日本鬼子？二、是不是有利于宁乡人民？三、是不是有利于你的部队？你就会知道我戴的是什么帽子。记得我们在甲师同学时，曾经读过春秋时代的一个故事：有个卞庄子带着他的徒弟去深山猎虎，发现山下有两只虎正在相斗，他的徒弟马上拿出利剑，要奔下山去杀虎，卞庄子劝阻他说：‘两虎相斗，一死一伤，到那时，我们再去向虎投刺，便能一举两得’。从当前的军情来看，正象两虎将要激斗。司令如果不考虑得失，只凭着美式装备，不惜孤注一掷，可能同归于尽，势必给日本鬼子以坐收渔人之利的机会。请司令三思再三思。”当我这样向他晓以利害时，参加酒宴的个别官绅认为我讲的有点道理，也就帮着我打边鼓，建议何际元最好不打。司令部参谋喻勋衡、曹博（二人都在一九四九年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有点爱国心和正义感，也趁机劝何考虑我的意见，这就把何的顽固脑袋打开了一个缺口。他慢慢地回过头来问我：“老同学，那么照你这种说法，难道我就只有束手就擒吗？”我马上向他解释

说：“司令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八路军南下是为着抗日，不是来湘中抢地盘的，司令只要把部队撤退几十里，让出一条真空地带，河水不犯井水，我看就不会发生战斗。湘中人民是会欢迎司令这样做的。”在座的官绅，交头接耳，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何际元在利害面前也就软下来了。他马上叫来管电务的人，嘱咐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沅市、白箬铺、道林、大屯营、石潭、中路铺、花石、白果一线的“忠义救国军”分别撤退五十华里。当时何际元这样做，是迫于八路军的声威，我只是起了一点促进作用而已。就在我舌战顽固派取得胜利的第二天，三五九旅顺利进入了上述的湘中各地，沿途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我军在宁乡的大屯营、湘潭的中路铺等地，都获得了安全的休整。在此同时，我还说服了何际元把共产党员彭立人等，从他的牢里放了出来。现今彭同志还在健康地为党工作。

以上所述，均为抗日战争以前的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以周里同志为首的地下党省工委领导下，为湖南和平解放，在统战策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将另为专文记述。

三 去 延 安

杨 第 甫

前 言

本文记述的是我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十年间的一段经历，主要是一九三八年入党以后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因为我的活动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党的工作的一个微小部分，当然也就要反映那个时期有关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要从一九三一年写起呢？因为发生在那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我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从一个喜爱古典文学的青年走向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我是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和自我改造，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所走过的道路，和许多与我情况相似的同志走过的道路，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走革命道路的；“唯成份论”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把我的这段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写述出来，对于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和党的历史都有参考价值，对教育青年和后代也有一定的意义。

从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个时候起，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延安去。我曾有过三次去延安的机

会，第一次走到了延安的大门口，为了革命的利益，又回到湖南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第二次党组织已决定我去延安，我到了重庆，因为工作的需要，又转往鄂西，第三次才到达延安，偿了宿愿。因为“到延安去”这个思想，长期盘旋于我的脑海之中，鼓舞着我前进，所以我就用“三去延安”作为我的这篇回忆录的篇名。

一、参加爱国救亡活动

一九三一年，我在长沙私立广益中学高一班二年级读书。当时我喜欢阅读一些如《红楼梦》一类的古典文艺书籍，陶醉在故纸堆中。“九·一八”一声炮响，把我从书斋生活中惊醒了过来。

我们是住的集体宿舍，每晚睡觉时，互相传播新闻，议论国事。有的认为，我国积弱，反正打日本不赢，不如设法求和，等国家强盛后，再收复失地；有的认为，日寇得寸进尺，不能订城下之盟，要坚决抵抗，亡国奴绝不能当；也有的认为，这是政府之事，学子无能为力，还是读书为上。这些不同意见，经常争论到深夜。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的主张，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快放寒假时，东北兴起了抗日的义勇军。马相伯等人则在上海发起支援义勇军的募捐运动。许多爱国心切的同学，热烈响应，很快掀起了一个捐助义勇军的高潮。我也将家中寄给我买过年货的二十元全部捐出，还写了一首歌颂义勇军的七言古风，登在同学们自办的墙报上。诗的全文是：“北风卷地百草折，九月关东即飞雪。扶桑车马动地来，故国山河痛残缺。将军拔剑砍地起，怒发冲冠目眦裂。誓师杀贼血泪凝，斩将拿旗雄心热。朔风扑面面如割，甲冑沾肤肤似切。警驰夜起雪满衣，叱咤风云敌气折。只知敌忾灭同仇，何惜身躯裹马革。君不闻，张巡许远守睢阳，唐脉因之未倾跌。又不见，漫天烽火遍关东，抗日

英雄今尤烈。呜呼男儿，速起杀贼！”

一九三二年上学期，学校奉令举办军训。当我了解到当局搞这套玩意儿，根本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从精神上麻醉青年，作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骨干时，我就拒绝参加。虽然教育厅规定，无军训毕业证书，不发给高中毕业文凭，我仍坚持不参加军训。因此我的高中毕业文凭遂被扣留，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才补发给我。

这时，长沙学生为了开展救亡活动成立了省学联。湖南省主席何键想把学联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千方百计地收买各校的学生会，传闻按人数每人一元计算给学生会“津贴”。广益中学当时有六、七百学生，学生会看到可得六七百元钱，就同意参加何键控制的省学联。我们高一班是三年一期生，要准备功课应付毕业考试，都不肯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当我听到把我们学生作买卖时，很气愤，在一次纪念周的会上，我质问学生会负责人说：学校是清高学府，为什么做这样肮脏的事？并向全体同学慷慨激昂地说：“收买，拒绝收买；抗日，我自为之！”建议广益中学独自成立仇货检查队，博得全场鼓掌赞成，当即选举我为检查队队长。我们很快组成检查队，在八角亭、坡子街等中心市区检查仇货，予以封存。这时，有一个高小时的同学周怀度（当时在中山路劝业工场工作）告我，国民党省党部的人曾向他打听我的情况，劝我不要搞仇货检查队。同学们也劝我离开学校，免遭不测。这样，我就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农历除夕跑到南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准备投考译述讲习所学习德文。这时，同乡同学李文彪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他来南京邀我同去上海。于是，我又离开南京去上海，进入大夏大学附中三年级读书。

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上海，这座黄浦江畔的雄伟城市，在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它曾记录着广大劳动人民饱经忧患的辛酸历史，也曾纪录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它是“富者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殖民主义者巧取豪夺和互相角逐的场所。当时，我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学生，正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到上海不久，听同学们说辩证法能帮助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感到特别高兴，但不知辩证法为何物，曾经闹过一些笑话。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同乡同学李声玄等看到我有求知的欲望，便介绍我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以及日本河上肇著的《政治经济学》、李达译的《马克思传》、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从此我逐渐认识了人类社会是由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认识了社会自产生私有制后，便分为阶级，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也初步知道原始资本积累是用暴力获得的。

大夏大学的校址在中山路梵王渡，周围有工厂，又临近白俄开设的“丽娃丽达”娱乐场所。我每天早晨六点看到一批批的工人，挎着篮子去上工，下午六点又看着他们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家。夏天晚饭后散步时，看到女工们打着赤膊，连衬衫都没有穿；而“丽娃丽达”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两种生活的对比，加深了我的阶级观点。

上海是国际都市，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有“冒险家的乐园”

之称。一个犹太人哈同，随着英国殖民者来到上海，以他榨取的中国人民的财富和依仗帝国主义者的势力，用贱价购买了上海的一大片荒滩。随着上海城市的畸形发展，地价不断上涨（一九三三年时，一亩地皮价值二、三十万银元），他成了暴发户，家产达一亿英镑，南京路一条街几乎都是他的财产。他在上海修建了哈同花园、外滩公园等，公园门口挂上“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随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辟租界，上海又来了一批印度巡捕。他们缚着红头巾，中国人称之为“红头阿三”。他们在租界中站岗巡逻，对中国人，特别是对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等劳动人民，经常无故殴打。我目睹这种情景，更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帝国主义的憎恨。

我们在学校里，有时偶然在课堂的书桌抽屉里发现共产党的油印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苏区反围剿的胜利；有时在电线杆上可以看到写着共产党的宣传标语。特别难忘的是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清早起来，就看到镰刀斧头的红旗高高挂在学校旗杆上，迎风飘扬。思想进步的同学都面带惊喜的笑容抬头观看，而国民党的特务学生则慌慌张张地设法将红旗取了下来。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大。

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欧美各国出版的新书，很快就翻译成日文出版。上海北四川路有一家内山书店，是鲁迅的好友日人内山完造开办的，主要经营进步书刊，店中一时没有的书，也能代读者从日本买来。我就努力自学日语，经常去内山书店购买进步书刊。学校订有《朝日新闻》等日文报纸，我从这些日文报纸中间常看到有关红军情况的报导。特别是红军长征时，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如何被击溃、被消灭，而《朝日新闻》等日文报纸中则常常透露出红军长征的一些消息，虽然只是片断

的报道，而且也有歪曲，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真实情况来，使我受到了鼓舞。我当时尚未确立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个人一切的人生观，还不具备入党的条件，只不过是思想比较进步，有某些倾向共产党的言行。不料这竟引起了学校国民党分子对我的注意。

大夏大学学生章某，长沙市人，曾与我在衡湘中学（现为长沙市立十二中）初四班同过学。我不确切了解他的政治关系，但从他的言行看来，无疑是一个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假期中，他利用同学关系，常到我的宿舍闲谈，久坐不去。他在长期对我的监视中，未见我有什么共产党的活动，就想勾引我与他同流合污。有一天，他故意探询我的意向，说：“你要抗日救亡，就要参加组织活动，现在有一个组织以硬干、实干、苦干为宗旨，进行抗日救亡，你愿意参加吗？”我当时想，趁此机会打入国民党中去，探悉其罪恶勾当，加以揭露，岂不正好？但又不敢贸然从事，于是回答他说：等我想一想。不久开学了，介绍我看进步书籍的同学李声玄等回校来了，我把章某的谈话和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们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党又未派你去，这样做，可能遭杀身之祸，而且党也不会相信你。益友的劝告，对我的教益很深。于是，我对章某说：我自由任性惯了，父母都不管我，你上次说的什么组织，我决定不参加，因为我受不了约束。并向他表示，我决不向任何人谈论此事，如不相信，我可以离开上海。为了拒绝国民党的引诱，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学业。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辍学回家。

三、到农民群众中去

这年六、七月间，家乡发生罕见的旱灾。塘干坝净，井水也枯竭了。水田干得开裂，禾苗逐渐枯槁，吃水都很困难。有的人

到“白鹤泉”用斑竹筒插在泉水孔里一滴滴地把水接到桶里，有的人跑两三里路到涓江河里抬水吃。对于这样严重的旱灾，国民党政府根本无人过问，农民们只好求神许愿，寄希望于天老爷大发善心。可是，这样做了之后，还是赤日炎炎，滴水不见。看到农民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走投无路的情景，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从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入手去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通过实践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于是，我就找农民们商量，有什么办法抗旱？有的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办法，有的主张打河车，有的又说不可行。我邀了四、五个积极分子，边踏看河车必经的路线，边商量组织力量车水抗旱的办法。结果组织了三十来部水车，由二百多人一夜三班，轮流车水；并以我父亲的名义与有水圳经过的田亩地段的地主协商，实行借圳过水；抗旱费用则由我家垫款，具体行动由我负责。这样，有人有钱，又有了具体安排，看起来河车是可以打成了，但事情并不如我想的那样简单。首先，我的叔父就出来反对，说什么：“把钱垫给这些穷人，他们拿什么来还？这不是等于把钱丢到水里吗？”劝我父亲不要垫款。但我父亲比较开明，对我也还信任。他说：“与其我死后听他去花，不如我活着看他如何花，何况这是正事，花点钱也值得。”拒绝了叔父的劝阻。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把河水车上来了。原来对车河水抗旱缺乏信心的农民，看到河水源源不断地流进开裂的稻田，一夜之间，禾苗迅速返青，也争先恐后地来找我要求参加。有些地主看着水在他们的田边流过，就趁晚上把水圳挖个洞偷水，农民发现后前去制止，引起了一些纠纷，甚至动起武来。我只好每夜提着马灯，沿着水圳巡水。打河车的劳动强度大，最累最苦，一班有百十来人，不管劳动力的强弱（我们配备的劳力一般是比较

齐的），一声号子，都要齐头并进，一坐上水车，“一线水”不车完就不能下车。赤日炎炎，汗流如雨，要经常端茶水给车上的人喝。于是，水到哪家田里，哪家就自动派人送茶水。这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车水的人劲头更大，从而增加了水的流量。打河车近一月，中湾一带的水稻田都获得了丰收。

在打河车的过程中，河水流量逐渐小了。一天，我在河车埠头看水，忽然有几个手上拿铁棍的人从下流头走来，说我们不该塞坝车水。我说，我们并未塞死，水还是在流着。开始他们气势汹汹，象要打人的样子，可是一会儿，又突然变得和气了。原来这时我的背后来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农民，他们手里拿着锄头，是准备在必要时保护我的。从这里我初步体会了农民的情感和组织起来的力量，也初步认识了社会活动中哪怕是象打河车这样一件小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这次打河车以后，我常到农民家里去坐坐，有时也给他们出点主意，解决点小问题，就这样我与当地农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九四〇年冬，当国民党政府通缉追捕我时，当地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我从小在外读书，很少回家，我父亲长期抱病，足不出户，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从而保全了我家未受牵连。皖南事变后，我的爱人陈素要生小孩，作为我妹妹的同学住在我家，有半年时间。当地群众明明知道她的情况，都没有透露一点风声，保护了她的安全，这与我组织打河车抗旱所建立起来的群众关系是有关的。

四、投入“一二·九”运动

寇深日亟，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为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

震撼神州大地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三五年暑假，我得悉原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国民党学生章某已经毕业离校，便再入大夏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这时“一二·九”运动已波澜壮阔，席卷全国，我又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群众斗争中去了。上海学生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兴起后，立即组织了多次气势磅礴的游行示威。当时在学生队伍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不赞成游行示威，认为这样可能被捕牺牲，不如好好研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将来共产党胜利了，会要我们出来工作的。另一种意见与此相反，认为理论是为了指导行动，要抗日救亡，就要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应通过游行示威及其他方式，向全国人民宣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持这种看法的同学还强调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难道只让别人去流血牺牲，自己却躲在后面坐享其成吗？只有大家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抗日救亡。这些同学都积极地参加了游行示威。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七、八岁时在小学读书，就从“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他侵吞了。最伤心，五月七日噩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为奴为仆眼前到。这国耻，何日消”的爱国歌曲中培育了反帝的思想。中学时代，正值大革命，又从“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等革命歌曲中，培育了反帝、反军阀和拥护统一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将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送给日本，这比琉球、台湾要大得多。自蒋介石

窃夺北伐的果实，建立南京政府以来，蒋唐（生智）、蒋冯（玉祥）阎（锡山）、蒋桂（李宗仁、白崇禧）等军阀混战连年不止。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置之不理，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对红军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一九三五年日本订立的《何梅协定》，比袁世凯订立的卖国二十一条还要卖国。因此，把青年学生积压在胸中的爱国热情激发出来了。当时青年们不仅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行为极为愤怒，而且对国民党的整个统治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渴望有一个大的动荡，来改变国民党的统治。

“一二九”运动，就顺乎民情地爆发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大夏大学同学为反对华北自治，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到会的达一千多人，大会一致通过了组织大夏大学救国会，联络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民众团体，共起救亡等项决议。大夏大学附中的同学，也于十二月十七日在群贤堂二一二教室召开中学部救国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誓死反对华北自治。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复旦大学同学三百余人，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毫无结果。下午，他们又联络交通、复旦、大夏、暨南、光华、持志、沪江、大同、同济、法政、正风法学院、东南医学院等大学及中学共六千余人，齐集交大开会，四时左右由交大出发，循中山路、水电路前进，风雨无阻，一路高呼抗日救亡口号，于二十日凌晨三时到达复旦。接着在复旦图书馆，召开各校临时代表会议，推选出主席团。休息片刻，继续向市中心区前进。五时半，到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向市长吴铁城当面提出了书面要求：1.要求市长电告中央制止华北军政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2.要求政府即日出兵讨伐殷汝耕；

革命年代

3. 要求政府保全国领土的完整；4. 要求政府施行积极的革命外交；5. 要求市长立即释放交大被捕同学李振声；6. 要求市长保护全上海学生的爱国运动；7. 要求政府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吴铁城害怕请愿队伍继续扩大，假意答应接受书面要求后，即借口天雨（同学们冒雨游行了一夜，衣服都湿了）、路远，调集大卡车数十辆，把参加游行的同学分送回校。但不到半个钟头又有千余学生来到了市政府，南市各校学校闻讯，也在这天下午纷纷赶来。沪南中小学生则举行了环城游行。

十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受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横暴镇压。复旦大学同学闻讯，于当天上午十时在体育馆召开大会，决定立即出发，乘车前往南京请愿，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于同学们未出发之前，早已布置第九、十两个保安中队及大批警察从火车北站至宝山路一带，严加戒备。当请愿队伍步行至畜殖公司时，该处已满布铁丝网及路障，大批军警荷枪持棍，对学生进行威胁。同学们不顾危险，由两人横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晋京请愿讨逆团”的大幅标语奋勇前进。队伍经过商学院时，邀请该校同学一同进京，为该校当局所阻。继续前进时，吸取了商学院的教训，事先派人去水电站与持志大学联系，结果该校全体同学一齐参加。至宝山路，法学院的同学也赶来参加。队伍行至虬江路、宝山路口，又被铁丝网拦阻，全体同学奋勇冲出。行至宝山路、淞沪路铁栅栏前，警察早将栅栏门关住，走在前面的同学爬栅而过，将栅门打开，让大队继续前进。到达北站时已是下午一时了。同学们纷纷攀上停靠的一列特别快车，并将站长拥上车厢，要他下令开车。相持到下午四时左右，路局请示市政当局，下令一切车辆停驶，并劝乘客退票下车。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公安局长蔡劲军都来到火车北站进行威

胁迫。但同学们都不动摇，说这次请愿，纯系出自爱国热忱，一日不达目的，一日不离车站。二十四日，又有同济大学、大夏大学和东南医学院、建国中学、正风中学、光华中学、市北中学、黄花岗中学等校的同学一千多人，赶到北站加入请愿队伍。

二十五日下午，同学们占据了两列火车，并争取到了两位火车司机的支持。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立即指挥警察二百余人，手持长杆，横加阻拦，故意高呼：“不愿意去的不要上车。”同学们谁也不理睬他们，拨开长杆，挤上了两列火车的共二千多人。下午五时左右，火车开出北站，九时左右抵达昆山车站。因路轨破坏，列车被阻，同学们把路轨修好后，司机又不见了。第一列车内有一位同济大学的同学自告奋勇开车。并找了一辆摇车先行探路。这样，第一列车总算勉强开走了。第二列车因无车头，暂缓开行，当挂上车头，刚要开车时，上海市政当局竟派保安队到车站，用机枪阻止开车。相持到第二日，路轨又被拆毁一大段，列车已无法开行，同学们只好回沪。当第一列车抵苏州站时，虽被军警拦阻，仍然继续前进。至浒墅关，路轨又被拆去。列车不能前进。这时南京上海的教育当局和警备部队乘机阻挠，部分同学冲破阻拦，自己修复路轨后，列车又继续开行。二十六日拂晓到达无锡车站，再前进到石塘湾时，路轨破坏得更厉害了。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率领当地驻军、宪警将同学们团团围住，百般威胁阻挠。同学们由于在路上坚持了四昼夜，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有的已经病倒。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同意派少数代表晋京请愿。二十七日黎明，上海学生请愿团下车进无锡城，环城游行一匝，在中南大戏院开了全体会议后，于下午三时乘原车返沪。

这次赴南京请愿虽未达到目的，却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不抵抗，对内坚持“剿共”和残酷镇压人民的

罪恶面目。上海各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新的高潮正在酝酿中。国民党市政当局更加恐慌，为了釜底抽薪，公然命令全市各中学提前放假，对大学则借口有“捣乱分子”（诬指共产党）图谋不轨，须予查究，下令戒严。于是国特横行，捕人的事不断发生，白色恐怖笼罩了各个大学。他们还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用不参加毕业考试也可发毕业文凭来诱骗学生离校，这不过是与“提前放假”相配合的一个阴谋。同学们很快就识破了，没有上他们的当。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我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更加憎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也就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

五、决心投奔延安

一九三六年上学期，当我尚未直接取得与党的联系时，过去影响过我的进步同学都已毕业离校，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不向蒋介石国民党卖身投靠，就莫想找到工作；要是跟着他们走，就只好等着当亡国奴。记得在同学中间流传着一副以“毕业”二字冠首的对联：“毕竟是条死路，业无半点生机”，活画出了那时大学毕业生的苦恼。我虽然还未毕业，但也有所预感。我想，自己出身农村，亲戚朋友中又没有什么官僚财阀，将来毕业也无出路。何况处此民族危亡之际，读死书有什么用？又何能安下心来？湖南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搞得不错，我与本地农民的关系还好，不如回湖南去，还可以做些救亡活动。我当时写了两首诗，述说自己的心情。

七绝 闺 怨

凉风飒飒梦魂惊，寒月三更倍有情。

露湿桐阶花影动，倚栏无语到天明。

七律 春日

少小寻芳渭水阿，十年景物竟如何？

红桃映日飘红锦，绿柳迎风漾绿波。

沂水咏歌情自雅，兰亭幽叙兴偏多。

河山对我应犹昔，归去来兮纵啸歌。

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于一九三六年暑假毅然决然回到了湖南。

湖南在军阀何键的长期统治下，思想禁锢得很严。湖南大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埋头读书，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毕业后找到一个适当的职业。有的学生的案头上还摆着佛经，企图从中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为了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从上海、北平回来的学生，发起组织读书会，借学习讨论的机会，灌输一些抗日救亡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许多青年不知所措，有些人担心共产党会杀掉蒋介石以报仇，国家会四分五裂，日寇会乘虚而入。我们便在读书会上，启发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用许多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处理问题，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它的政策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不会计较一党一派的利益和恩怨。对蒋介石，则是利用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逼迫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不会为报仇雪恨而杀掉他。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形势的逼迫，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通过讨论，使青年们提高了认识，从而端正了对共产党的态度。

这时，北平的大学教授黎锦熙等，集资在湖南筹建国光印刷公司。黎是湘潭县人，我通过亲友关系，参加了他们的筹建工作。公司开业后，我担任了校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出现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当时，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思想斗争是很激烈而又具体的。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事实，如果要为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危亡而斗争，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共产党走，起码要吃苦耐劳，还要准备流血牺牲。象我们这样的大学生，利用家庭经济条件和自己的文化程度，谋个小职位，或经营点事业，还是可以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斗争，既具体又尖锐。我经过五年来的思想准备，在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基本能够明辨是非了，要抗日救亡，要跟共产党走。这在我的思想上是早已确定了的。但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就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与剥削阶级意识影响决裂。想是这样想，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一方面，父母年老多病，对我的感情又深，当时去延安，就是生离死别，我不能轻易抛弃父母；我是长子，弟妹幼小，父母又信赖我，把对弟妹的教养之责付托给我，我也不能不负责任地置弟妹于不顾。另方面，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可靠的介绍，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到了延安能找谁呢？党会接纳我吗？何况要彻底改变生活条件，在当时来说，也是要经过很尖锐的思想斗争的。记得有次我和湖大的同学在街上散步，大家合计买一块猪肉自己做着吃，但谁也不肯提着猪肉在街上走。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一块猪肉，还怕丢面子，要他们草鞋赤脚，背着行李走路，就更难了。正当我的思想斗争激烈的时候，原在大夏大学同学的李声玄从杭州回到长沙，故友重逢，促膝畅谈，他对我去延安学习极表赞助，并主动告诉我，他可以找到可靠的人给我写介绍信。“国亡无日，何以家为”，我的爱国热情沸腾起来了，加

上有李声玄的热情怂恿和帮助，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奔向延安。为了不伤老父母的心，临走之前，我只偷偷地告诉了十七岁的妹妹。到了长沙，买好车票后，才给父亲写了一封告别的信。后来据目睹父亲看信情景的亲友告诉我，父亲边看信，腿就发抖，信未看完，就双膝打跪，跌坐在地上了。

我和两个参加读书会的中学生一道，拿着李声玄通过党的关系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写的介绍信，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长沙乘火车去西安，当即被安排入共青团中央在安吴堡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

安吴堡是陕西三原县清王朝时代一个驸马的城堡，青训班的主任由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兼任，胡乔木同志负责教务工作，每期训练一个月。我们是第三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游击战术。此外，还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文献和中国共产党的册子。我到青训班不几天，就接到延安同志的来信，要我去延安，我把信交给直接指导我们学习的黄华同志，他说，我可以去延安，但要先完成一项任务，即组织好两湖回乡工作团（“回乡工作团”是青训班对一些表现较好，但尚不够条件去延安的青年，由组织介绍到本地去做抗日救亡工作而成立的一个组织）后再去。两湖回乡工作团开成立大会时，大家一致选我当团长。我解释说，我要去延安，不能担任团长。当时同学们以为我是中共党员（我是在青训班才加入“西北青年救国会”，即民先的，当时尚非中共党员），对我很信任，如我不担任团长，怕与党失去联系，因此一定要选我当团长。有的甚至说，“你不要把我们当作去延安的垫脚石啊！”我想，同学们到青训班来，是经过许多思想斗争，排除干扰，满腔热忱来找共产党的，如我硬不当团长而去延安，会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去延安是为了抗日救亡，干革命工作，回两

湖也同样是为了抗日救亡，干革命工作。虽然去延安对个人更有利，但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给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我把这些想法向黄华同志汇报后，经组织研究，同意我担任两湖回乡工作团的团长。于是，我就拿了青训班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同志的介绍信，以及“民先”的组织关系，带领两湖回乡工作团离开了安吴堡。两湖回乡工作团中的许多同志，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如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的创办人、总工程师田庚锡同志，治淮委员会的总工程师郭起光同志等，都是当时两湖回乡工作团的成员。

经过五年多的探索和反复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奔向延安的我，走到了延安的大门口，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又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回到湖南国民党统治区，投入了党的地下斗争。

六、抗战初期的湖南

“七七事变”后，长沙市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城市之一。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和后方加强联系，在长沙设立了办事处，地址在长沙市寿星街二号。中共中央派徐特立同志作为党中央和八路军的代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来到长沙，同时还派王凌波、王自申等同志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徐老是长沙县人，而且是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低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已五十多岁了，他在湖南的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威望。徐老一回到湖南，就和柳湜等同志出席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宣传部组织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要求他谈目前形势和任务，他很谦虚地说：“我是办教育的，不是政治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才是大政治家。我怕

讲不好，只谈谈八路军和前线的一些情况吧。”随后，地下党的同志发动文化界进步人士，将座谈会发展为讲演会，请徐老公开讲团结抗日的问题。第一次讲演会是十一月间在银宫电影院（即现在的新华电影院）举行的。不久又在青年会举行了第二次讲演会。来听讲演的人很多，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四周的窗户上都挤满了人。真是盛况空前。

湖南从“马日事变”后，一直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长期被国民党反动派压抑着的人民，亲眼看到徐老公开露面，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深受鼓舞，长沙市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出现了高潮。

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长江局派任作民同志来到长沙，与当时由北平清华大学回来的党员曹国枢同志取得联系后，由曹国枢、肖敏颂、曹国智三同志成立了党小组。以后于刚、苏镜自北平回长，冯秀藻、杨润湘自南京回长，李涵藏等由上海回长，党组织逐步扩大。这年十月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其中有李声玄、唐荣前等。一九三七年十一、二月间，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高文华、郭光洲、贾琏等同志；不久长江局又派来了帅孟奇同志。于是以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回来的党员和原有的地下党员及新发展的党员约共百余人为基础，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高文华同志任书记，郭光洲同志负责组织工作（一九三八年夏，蔡树彬同志接替郭的工作后，郭负责工运工作），任作民同志负责宣传、统战工作，帅孟奇同志任秘书长，兼管机关和妇女工作，于刚、李锐负责青年工作。一九三八年春，中央又派来了聂洪钧同志，负责省工委的军事和统战工作（任作民同志就不管统战了）。高文华同志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聂洪钧同志代理过省工委书记，有些同志就认为聂是省工

委副书记，其实当时并无此职称。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明一个问题：前些时候，看到高文华同志谈抗战初期湖南地下党情况的一个纪录稿，他说当时省工委书记是任作民，组织部长是袁策夷（仲贤），宣传部长是谭丕模，他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才接任省工委书记；对帅大姐来湖南的时间也说得不清楚。事实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前，高文华、郭光洲同志已由中央派来湖南，并确定由高任省工委书记；帅大姐也是在同年十二月奉派来到长沙的。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省工委以前，湖南地下党的工作，是以任作民为首，有袁、谭参加的三人小组领导的。一九三八年一月省工委成立后，就是高当书记，任改任宣传部长。这个情况，当时在湖南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显然是高老记错了。

湖南省在抗日战争初期重新建党，是以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为基地，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首先成立文抗支部，由丁务淳（清华大学学生）任支部书记，支委有卢良、罗曼士等。十二月，支部书记改由李声玄担任。一九三八年二月，文抗支部发展为长沙市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李声玄任书记，委员有白云（即王铁铮，东北人，由延安党校调来）、卢良、李仲融、唐揆斋、孙伟、唐荣前等。老周（任作民）以省工委宣传部长领导文委的工作，有些同志就认为老周是兼任长沙市委书记，其实当时尚未成立长沙市委。文委领导下有：文抗支部，支书杨第甫；育英支部，支书孙伟；一九三六剧社支部，支书唐揆斋；银行支部，支书余瑞生；中学支部，支书吴立朗；新声歌咏队支部，支书金汉虚；还有邮电支部、职抗支部、伤兵支部等。一九三八年“五一”成立长沙市委，市委书记宋濂，下辖南北两区。北区区委书记李声玄，委员有杨第甫、杨润湘、唐荣前等；南区区委书记先是吴继周，后

为冯秀藻，副书记李涵葳，委员有唐拔斋等。长沙市委成立后，撤销了文委，到长沙大火前夕，省工委决定将长沙市委与长沙县委合并，撤到长沙郊区，由长沙县委书记毛达恂同志兼任市委书记。

这段时间，在党的领导下，长沙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出现了大革命以来所未有的蓬勃气象。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激情满怀，斗志昂扬，纷纷组织或参加各种团体，开展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曹国枢、肖敏颂、曹国智等组织在长沙的知识分子约三十余人，成立前进社，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十月间，来到长沙的文化界人士愈来愈多，于是，由陈润泉、李仲融、谭丕模、吕振羽发起，成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设有理事会和办事机构。理事有田汉、吕振羽、肖敏颂、曹国枢、薛暮桥、翦伯赞、李仲融、谭丕模、陈润泉、张天翼、廖伯华、陈永清、张曙、杨东莼、孙伟等。李仲融、吕振羽、陈润泉、廖伯华为驻会理事。理事会下设四个部，七十多个干事。总务部主任陈润泉，干事有杨铁山、杨第甫等；组织部主任廖伯华，干事有卢良、彭宗蕙等；宣传部主任李仲融，干事有白云等；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干事有张迈群、张超等。后来又增设了救济部，总干事为杜辉义（即杜修经），干事有侯祥麟等。谭丕模同志则是当时党与文抗会理事的联系人（谭是中共老党员，民国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遇难）。文抗会自请徐老出席讲演会作了关于团结抗日的报告后，影响很大，声誉鹊起。许多青年知识分子都来找文抗会要求做救亡工作。许多青年通过文抗会党组织的关系而去了延安（当时党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大力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如康濯、柯蓝、杨迪、张正

文、彭辉、杨光等同志就是这样去延安的。有些青年学生经过文抗会工作的锻炼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吴立朗、李普、侯祥麟、章文青、张迈群、田庚锡、郭起光、刘建安、张正文等同志。由于文抗会的工作开展很快，活动面很广，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就引起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注意，开始是派暗探混入，进行监视，继而在讲演会上捕人，并规定讲演会和一切群众性的集会，都要经过国民党省党部批准才能召开，否则以违法论处。一九三八年七月，国民党省党部要求文抗会改选理事会，并提出了由他们指定的陈大榕、唐际清、易君左等六十人的理事候选人名单，群众则推荐刘岳厚、杨东莼、薛暮桥、刘良模等十人为理事候选人。双方相持不下。经一再交涉，刘岳厚、杨东莼两人还是没有被批准。改选理事后，国民党省党部进一步对文抗会采取控制和窒息的办法，一切群众活动，包括群众团体的建立和改组，都要经过他们审批，而所谓审批，实际上就是不批。尽管如此，文抗会还是有些内部活动，如时事座谈会等等。对此，他们就采取各种手段，诬蔑陷害各部主任和干事，以达到全部篡夺领导权的目的。他们借口总务部干事杨铁山向天伦纸厂退“一九三六剧社”演出门票手续欠缺，虽经补办了手续，仍以处事失当为理由，迫使该部主任陈润泉“引咎”辞职，而以仇兴接任总务部主任。他们又借口在青年会组织的讲演会事前未被批准，当场在主席台上逮捕主持会议的文抗会干事杜辉义，破坏了讲演会的举行。他们还使用流氓手段，在给陈润泉的恐吓信中指出要杨铁山、肖敏颀、唐挾斋、卢良几个人即日离开湖南，否则将以“最后手段”对付。面对国民党日益加紧的迫害，省工委于一九三八年八月间，决定将文抗会中的骨干力量转移到各地去：杜辉义、杨铁山等去国民党七十军在益阳马迹塘办的训练班，张迈群去邵阳宣传基站，唐挾斋去国民党

某个部队的文工团（宣传队），张生力、郭起光去湘岸盐务运输处。从此，活跃一时的文抗会就趋于衰亡了。但文抗会在湖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特别是在聚集党的力量和培养干部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通过文抗会的党组织，吸收、培养和输送到各方面去的党员干部为数很多。当时省内各地的负责干部，如新化县委书记苏镜、湘潭县委书记谭伟、常德县委书记白云、邵阳县委书记刘建安、湘西工委书记李声玄等，都是省工委从文抗会中选调出去的。解放后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或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见诸报端的，随便数一数，就有李锐、于刚、李普、侯祥林、章文晋、薛慕桥、翦伯赞、吕振羽、黎澍、张天翼、杨迪、苏镜、许庄、张正文、黄绍湘、肖敏颂、田庚锡、郭起光、杨荣国、康濯等许多同志。

“七七事变”后，随着救亡运动的开展，各种进步报刊也如雨后春笋在长沙市办起来了。其中有肖敏颂、曹国枢办的《前进报》，潘开茨、蒋牧良、张天翼、张生力办的《大众报》，李声玄、冯秀藻、杨荣国、魏猛克办的《民族呼声》，田汉、廖沫沙办的《抗战日报》，以黎澍苍为主的《火线下》，还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理事有覃振、翦伯赞、吕振羽等）办的《中苏半月刊》，以赵君迈为处长的湘岸盐务运输处办的《时事动态半月文摘》等刊物。这些报刊，都是以长沙的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为骨干，团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调动了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如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和爱国的资本家（如唐文燮）的积极性，由他们出名、出钱、出力办起来的。

为了更好地向湖南人民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二月间，以任作民同志为首的湖南党的领导机关，就决定把现有的几种报刊如《火线下》、《大众报》、《民

族呼声》等的力量集中起来，办一份带有省委机关报性质的报纸，并定名为《观察日报》，由谭丕模负责领导，唐文燮、黎澍出面，唐文燮、邓克生（党员，其父为商业资本家）出钱；以黎澍任社长，杨隆誉任总编辑，唐文燮任经理，组成班子。《观察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长沙创刊。开始尚以一般进步报纸的姿态出现，到这年夏天，就正式以省工委的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了。十一月长沙大火前夕，报社迁到邵阳继续出版。人事作了一些调整：潘开茨代理社长，李声玄任主笔，唐旭之、罗高、张天翼、杨荣国等任编辑，王南秋、张君穆任经理。由于当时湖南党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观察日报》迁邵阳时，搬运机器、铅字等设备都是用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到邵阳后，又通过徐老与国民党邵阳警备司令岳森的关系，要求让报社派人到警备司令部电台抄新闻电报，八路军办事处迁到邵阳后，就在办事处抄报。《观察日报》曾用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聂洪钧同志还化名聂弗，在《观察日报》上发表署名的专题社论；以至有跑到报社来找省委的。由于这张报纸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忌恨，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被国民党邵阳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邵阳县政府和县党部勒令停刊。从此，党在湖南的一个主要宣传阵地失掉了，救亡运动的中心也就逐步转移到桂林、重庆去了。

省工委搬邵阳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八路军邵阳办事处召开了省党代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工委书记高文华，委员聂洪钧、徐特立、任作民、郭光洲、蔡树彬和帅孟奇，以及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原长沙市委书记宋濂、湘宁中心县委书记袁得胜（袁学之）、南华安中心县委书记曾惇、新化县委书记苏镜（女）、长沙县委

书记毛达恂、常德县委书记白云、益阳县委书记李文定（李鳌）、青年团委书记李锐、观察日报支书李声玄、宣传基站负责人张迈群等同志。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出席了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选出了高文华、聂洪钧、徐特立、任作民、王涛、郭光洲、蔡树彬为省委委员，帅孟奇、袁得胜为候补委员。

省党代会以后，特别是《观察日报》被迫停刊以后，省委认真总结了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把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严格分开，又对各地负责干部作了一次较大的调动，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因此，在一九三九年以“平江惨案”开其端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湖南党组织没有遭受严重的打击。

七、在斗争中学习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由安吴堡青训班回到湖南后，参加了湖南的文抗会工作。一九三八年二月由李声玄、白云同志介绍，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由党组织通过黄绍湘同志（清华大学学生）的关系，介绍我到湖南省难民救济处担任第七难民收容所所长。第七难民收容所可容六百人，主要是收容江浙难民，每人每日伙食费一角钱，其他伙房用人，水电房租均由公家拨款，不管难民是早上、晚上来的或走的，也算一天的伙食费。难民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有百把人出出进进，因此，每天有五、六元钱的伙食费是空额。当时生活标准低，只有六元左右一担的米（一担合一百四十八市斤），集体伙食每人每日只要八、九分钱就够了。因此，每月伙食费共可多余二、三百元。我邀请了两位北洋工学院的同学郭起光、刘春明一道工作，除三人吃饭不要钱外，还经常养活一些一时无处容身的平、津、沪回来的大学生。这样，每月

还可以余二百多块钱，就每星期全所打一次“牙祭”来改善生活。办了一个月后，难民救济处组织其他六个收容所都来第七收容所观摩学习，连美国新闻记者也来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兴高采烈，认为养活了一些流亡同学，又有公开职业掩护，不仅不向难民救济处要工资，连办公费有时也忘记按时去领。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初出茅庐，不懂得社会生活，不懂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情况，更不懂得我们党的公开合法斗争策略。原来收容所这两笔钱，是所长的“合法”收入，我们用它来改善难民生活，认为这两笔钱是应该这样花的。可是，其他收容所的所长相形之下，不能毫无忌憚地贪污这两笔钱了，就群起向难民救济处攻击我。难民救济处不仅认为我是“傻瓜”，而且怀疑我是共产党，竟借口我有一个晚上外宿未请假（我当时是文抗会支部书记，因帮助一九三六剧社筹备演出，一晚未回所），免了我的所长职。当时，有些难民要请愿挽留，我们怕暴露，就此离开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这种“左”派幼稚病，连一个小小的难民收容所的阵地都无法占领，只搞了两个月就丧失了。我吸取了这次教训，当在湘岸盐务处工作的同志要将每天出差费四元钱的剩余部分上交时，就要他们交了党费，而不退还盐务处的会计了，这叫做“同流而不合污”。的确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离开第七收容所后，组织上调我在北区区委和长沙市委工作了一段时间，七月就调我到省委工作了。这样使我有机会能直接接触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甚至党中央负责同志，从而受教益不少。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个秋光明媚的下午，聂洪钧同志陪同一位高大英武、四十来岁的客人，来到我们的住宅。客人坐定后就问：你们凭什么住这么一栋房子的（当时我们在北区玉皇坪租住了一个国民党旅长齐某的两层楼房）？聂指着我问回答说：就是凭

他的名义租住的(当时我与帅大姐以姊弟名义租住这栋楼房,而我是以地主家中的大学生身份出面的)。我听了他们的问答时想到,连住房子还要有条件,好认真,好细致啊!随后,来客用广东客家官话向我们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在坐的有帅孟奇、聂洪钧、李锐、郭光洲、蔡树彬、宋濂等同志,我也参加了。听传达时,大家都认真地记笔记,我尚无记笔记的习惯,只是认真地听,边听边想。客人口若悬河,深入浅出,说得头头是道,扣人心弦。传达了三、四个小时,客人走后,我问宋濂同志,才知道是名闻中外的叶剑英同志。通过听这一次传达,我才初步懂得中国共产党是担负着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有独立自主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因此全党都要懂得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省委组织我们认真地学习了叶剑英同志的传达报告,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积极布置向各级党的组织传达贯彻。我被派赴湘潭县,向县委进行传达,从而认识了当时县委书记谭伟、组织部长熊怒飞、宣传部长王汉新等同志。回到长沙后,就参加了撤退、疏散党员和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当时对省委机关设在哪里,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跟着国民党省政府跑,在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时,准备把省政府搬到沅陵,以后薛岳又确定搬耒阳。如果跟着国民党省政府跑,我们的省委也要设在沅陵或耒阳;一种意见主张设在邵阳,认为地点适中,有利于领导全省的工作;沅陵、耒阳太偏处一隅了。正在争论中,恩来同志来到了湖南。他说:不要把抗日战争的希望主要着眼在国民党上层,要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工作应主要着眼于战区、敌后。要发动全国人民,支援战争。沅陵和湘南的工作应当加强,但省委以设在邵阳为好。这样既便于支援湘北前线,

又能统一领导湘南、湘西的工作。于是省委决定搬邵阳，并加强湘南特委和新设湘西工委。当省委机关已全部撤离长沙后，十一月十二日清晨，我和省委组织部长蔡树彬同志一道，检查各方面的撤退情况，走经寿星街二号八路军办事处时，只见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正在门前眺望市容，一看到我们就问蔡树彬同志，你们为什么还未走？并告诉我们当天办事处有一辆卡车去衡阳，要我们坐这趟车走。我是久闻恩来同志之名，而未见其人，当他和蔡树彬同志谈话时，我边听边观察他的风采：步履从容，静如泰岳，威严的浓眉下，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关切地注视着我们。我想，恩来和剑英同志，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在危城之中，与国民党当局望风而逃的不抵抗主义作顽强的斗争，而对我们又关心备至。这就使我真正体会了我党同志之间的无产阶级感情，从而也认识了我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与国民党迥然不同的。自这次一面，周公的风采，使我毕生仰止。

我们坐上办事处的汽车到湘潭县城对河时，蔡树彬同志给我一次回家探亲假。他下车过河去湘乡，我则继续乘车到下摄司下车，经易俗镇回家。睡到下半夜时，忽闻人声鼎沸，狂呼“起火”。我翻身起床，到屋前红石子岭上远远望去，只见长沙方面红了半边天，我估计是国民党当局放火烧长沙了。因为在离长前，风闻省政府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计划在日寇抵新河时，即放火烧毁长沙。这时我想：可能敌人已陷长沙，不可在家久留。于是我向父母说：“敌人已侵占长沙，我要马上走。”父亲问我他们怎么办？我说：两老年岁已高，身体不好，如日寇来了，父亲可去冲里亲戚家躲躲，估计日寇兵力有限，只能占据城市和交通要道，无力盘踞乡村。并向父亲说明：怕只怕敌人可能要利用父亲搞维持会，“在汉苏武节”，是父亲谆谆教导儿子的，只要父

亲坚持民族气节，人民会设法保护您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带着两三年的孙子，敌人来了躲到山村中去，敌人一走又回家，问题不大；反正我们家里的年青一代——满弟、满妹和媳妇都去延安了，仅仅两三个人是好躲开敌人的。我不能留在两老的身边，留下来不仅不能照顾两老，反而会增加两老的困难，因为敌寇一来，一定要逮捕我，这样反而会牵连到父母；何况儿子已将身许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抗战进行到底，所以我只能走。老父母听我这样说，只好让我走。父亲表示：绝不会出卖灵魂为儿女羞。就这样，我只在家里住了半宿，在战火的催促下，辞别了年老体弱的双亲，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途。

我走到湘潭县城时，天还只蒙蒙亮，在县委所在地宣传基站，正碰上李锐同志。我们和县委书记谭伟同志共同研究了下一步工作部署后，就和李锐一道，步行一百华里，在湘乡县城，找到省委。聂洪钧同志要我负责将省委机关的档案、物资等运到邵阳。我和挑运人员一道，连续步行了三、四天抵达邵阳。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旅途滋味。到邵阳后，我与帅孟奇、聂洪钧、宋濂、蔡树彬等同志一起住在蕉园。

帅孟奇同志，当时不过四十来岁。因为她与敌人作斗争英勇顽强，坚贞不屈，赢得同志们的尊敬。从省委书记起，都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帅大姐”。她是湖南省汉寿县人，父亲是民国初年湖南省议会的议员。她与许子桢是姑表兄妹，由父母指腹为婚。许子桢初中毕业后，他的家庭无力负担他继续升学，帅大姐的父亲也只能供给一个人上学。于是她让许子桢进甲种工业学校读书，自己就辍学了。一九二〇年她与许子桢结了婚。帅大姐是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的（她是汉寿县第一个共产党员）。许子桢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入的党。她俩曾一道在武汉做党的秘密工作。随

后许奉派去海参威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定送帅大姐去苏联学习，走到海参威，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是留在这里和许子桢一道工作，还是去莫斯科学习？大姐从党的需要出发，毅然决然去了莫斯科。她在苏联学习一年，被派回国工作。一九三二年六月，她在江苏省委工作时被捕，关在南京监狱里。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她始终大义凛然，毫不屈服。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极力营救，加上她的父亲找了一些门生故旧的社会关系，进行疏通，这样，她才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被保释出狱就医。出狱后，经过多方医治，生命不息的老布尔什维克帅孟奇同志，又康复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她来到湖南省委工作，从长沙到邵阳，一直和我住在一起，从政治思想到生活方面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记得在邵阳的一次支部会上，为了帮助一位同志，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会后，和大姐一道步行回机关，她边走边评论这次会议，表扬了我的发言，又启发我要善于吸取教益，最后还鼓励我说：“小杨，好好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争取成为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对此，我时刻铭记在心。那时候，我们经常是清早出去，深夜归来。每天早晨，大姐一听到我们起床，就在隔房招呼说：“碗柜里有早点。”深夜回来时，她总是给我们留着热的吃食。她自己身体本不好，工作又很忙，却对我这样一个年青的党员关怀备至，不仅使我永志不忘，而且使我懂得了关心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一九四一年，我到延安时，立即去看帅大姐。我以为她已与许子桢同志在一起，幸福地过着革命家庭生活。可是当我见到她时，她还是一人独居。后来她告诉我，许子桢一回国，中央组织部就通知湖南省委，调她去延安，因工作需要没有去。一九三九年冬去延安，是因为中央准备召开“七大”，催她去的（帅大姐是湖南产生的“七大”代表，除她以外，还有高文

华、欧阳方、梁春阳、毛朗民四位同志）。我问到许子桢同志的情况，大姐说：他很好，党分配他做工人运动的工作。他长期在苏联，生活安定，身体很健康。我在牢狱的摧残下，身体垮了，我不愿以百病之身拖累老许，影响他的工作。征得老许的同意，向组织上打了报告，请求批准我们离婚，让老许另找一位健康的女同志，便于他俩并肩战斗。我听完大姐的谈话。对大姐这种高尚的情操，纯真的美德，激动得热泪盈眶。十年内乱中，当时的中组部派人找我了解帅大姐的情况。我说：大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记得在延安时，我还见到康生表扬大姐的题词。调查材料的人瞠目结舌地说，那是她骗了“康老”。遁词知其所穷，明明是康生阴一套，阳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政治骗子，反说大姐欺骗了他，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历史是无情的。大姐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康生之流则不仅是“尔曹身与名俱灭”，而且是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省委为召开党代会作准备，派我去湘潭、宁乡、湘乡三县做整顿党的工作。我先到湘潭，和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熊怒飞同志一道，跑遍了湘潭全县各个支部。这次因为接触的人多，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引起了湘潭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一九四〇年冬，湘潭县政府呈报省政府悬赏缉捕我（一九四九年接管湘潭时，在敌档案中看到了这个通缉令），祸根就出在这里。

一九三九年二月，省党代会召开之后，省委派我和郭起光同志去湘北前线做国民党部队某个团的工作，想通过这个团的唐团长来掌握这部分武装，作为发展游击队的基础。唐团长原是王凌波同志的好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有些正义感，对蒋介石不满。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三个多月，逐渐取得了他的信任，这个团有两个营长和团部的工作人员，也基本上被我们掌握住了。不久这个

团改编入十八军，要调四川万县。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只好离开该团，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回到了邵阳。省委又派我去衡阳中心县委工作。离开湘北时，我曾动员郭起光同志化名郭淮投考国民党政军在重庆办的一个军事工程学校。他考取了，但对去重庆有畏难情绪，到衡阳来找我，想不去重庆。我对他说，打入国民党的军事机构，对党的工作极为有利，既然考取了，就要去，为了党的事业，刀山火海也要上。他说，交通也困难呀！我说，爬也要爬去！这就是组织的决定。郭起光同志根据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去了重庆，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得还不错，可惜在重庆大轰炸时，把关系“炸断”了。解放后，他又重新入了党。

我在衡阳中心县委工作了两个月，省委又派我和陈素同志到长沙建立党的机关，我们就在这时候结了婚。陈素同志是湘乡县人，父亲是乡村裁缝。她在本地族小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考入省立桃源四中，因而获得了陈家宗祠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后，无力升学了，就在湘乡图南小学教书。一九三八年九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是在一九三九年她在湘潭县委党员训练班学习时，我去学习班讲课而相识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战斗了二十八年。她不幸在十年内乱中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被迫害致死。我到长沙时，南阳街有个书店，经理是王南秋同志，这家书店，是省委的联络点。我们在南正街的吴恒泰酱园建立了立足点。吴恒泰酱园是江浙资本家在长沙设立的分号，湘潭的吴恒泰，是吴家在湖南的总号，设在长沙南正街的叫南号，设在北正街的叫北号，设在小吴门的叫东号。我从王南秋同志那里了解到南号的经理姓彭，是易俗河人，与我家是远亲，我借买酱油和他攀上了亲戚关系。有一天，我和彭经理在闲谈中，他问我打牌不？我说打。以后我经常利用在吴恒泰打牌的机会，约人接头。有一晚，国民党长沙

市警备司令部突击检查，我就去吴恒泰组织打牌，把秘密文件寄放在他们那里，省委的负责同志也以看我打牌为名，躲过了这一关。有时候为了同国民党的进步军官或我们打进去的同志约会，我也利用吴恒泰和吴元泰的少老板等在旅馆开房间打牌的机会来会面。因此，谁也不怀疑我是共产党员在做地下工作。

八、二次去延安未成

一九四〇年八月，省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将湖南地下党大部分县委级以上的干部和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大规模地撤往延安或去新四军工作。聂洪钧同志代表省委通知我和陈素同志说：省委决定我们一道去桂林，已决定我去延安，陈素去不去延安，要到了桂林才能决定。他还教育我们说：如果两人不能一道去延安，也要为了党的利益，不纠缠于儿女私情。我们把省委的介绍信缝在陈素的鞋底里，临走时省委某负责同志交待我，路过衡阳时不要去建成酱园了。当时建成酱园的经理是王南秋同志。我问这位省委领导同志发现了什么情况？他说，没有别的情况，不过王南秋是个店员，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经济活动能力，而且他花钱很不在乎，这样的党员不可靠，我们准备割断与他的联系。我想，王南秋同志是店员出身，一九二四年就加入了党，他对吴恒泰、吴元泰两个酱园从老板到学徒都很熟，各个分号的经理，差不多都是他的师兄弟，彼此之间关系很好。他为了党的工作，有时不得不搞些应酬，花上一些钱，他利用这种关系东挪西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自己家庭生活却很困难，孩子们都穿得很破旧，省委负责同志对他的怀疑并没有任何根据，如果把这样一个同志丢掉了，实在太不应该。但是，我知道省委这位负责同志以前是陕北苏区主持肃反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受极左路线的影响

很深,对不同的意见他是听不进去的,甚至会对我产生怀疑,只好不做声了。

车到衡阳,我还是去建成酱园看了王南秋同志,并对他说:白色恐怖就要到来,你活动面很广,容易暴露,最好马上跟我走。他说建成是一些朋友看他的面子办起来的,他要清理好手续才能走,要我等他三天。我再三说明时间很紧迫,要他当晚就把来往银钱写一个账目,自己的钱,除了去桂林的路费外,都留给妻儿,明早即走。他却硬要我等他三天,并替我俩安排住处。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等他一走开,就马上去火车站搭上去桂林的火车走了。

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的是石磊(即曹瑛)同志,他看了介绍信后,很热情地说:“你们来了很好,组织已经决定,你俩一道去延安。”听到石磊同志这样一说,我们相视而笑,正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消除。办事处的同志安排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第二天遇上警报,我们因为初到桂林,不懂防空情况,只好跟着旅馆里的人跑。警报解除后,组织上来人要我们转移到办事处的招待所去住。一到那儿,李克农同志(当时桂林党的负责人)就对我们说,一跑警报,他就关心我们的安全。他还批评了办事处的同志不应该把我们安排到旅馆里去住。我们到招待所的当晚,刚刚睡下,有人来找我,一看是王南秋同志,我见他来了很高兴。当时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王涛同志也在桂林,他了解王南秋同志,组织又要我给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就把他留在办事处。一九四一年我到延安后,听说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分区税务局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时,在天津又见到他,当时他任天津市税务局长。一九五一年他回湖南探亲时,是上海市税务局长。以后听说他调北京了。一九七八年我去江西时,江西省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王南秋同志是江西省计

委副主任，一九七七年在计委一次党组会上，他发言后，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养神。散会了，大家都起身走，他仍坐着不动，同志们以为他睡着了，唤他起来又不应，推他也不醒，一摸鼻息，已经停止呼吸。江西省委的同志说：王南秋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王南秋同志的一生来看，我们党员中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应当深思的。

我们在桂林住了三、四天，就乘办事处一辆运汽油的卡车去贵阳，住在办事处设在贵阳的转运站，站长为袁超俊同志。他告诉我，办事处没有车去重庆，要我们夫妇带领高文华同志的三个女儿一道买“黄鱼”票去重庆。“黄鱼”是商用汽车司机偷带的客人，票款为司机的“外快”，但如被关卡检查发现，就要罚款，客人也要另买车票。因此，每快到一个检查站时，司机就停车让我们下来，步行过关。有时汽车因受检查耽搁了，我们先过去，就在前面等车；有时车先过去，就等我们。这倒是一个自愿两利（司机赚“外快”，我们无通行证，要躲避检查）的办法。我们利用司机熟悉关卡的情况，顺利地由贵阳到达了重庆。我们在码头上雇了挑夫挑着行李，穿过市区，走化龙桥，上红岩咀，直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即南方局所在地。办事处安排我们在对面的招待所住下来。听同住的同志谈到，在来办事处的路上，“黄篱树”是判明生死路的一个标志：上坡沿黄篱树向右边走，到了办事处，是条生路；向左边走，到了特务机关，不管你是否共产党员，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是条死路。我们事先毫无所知，听了以后，不禁毛骨悚然。

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南方局组织部钱瑛同志找我俩谈话。她回了我们的情况后说：本来决定你们去延安学习的，因为工作需

要，南方局准备改变这个决定。接着她转述了鄂西特委书记何彬同志来信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陈诚到恩施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去了许多特务，企图镇压我党领导的鄂西人民抗日救亡活动。何彬同志已不适合继续留在那里工作。南方局同意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钱瑛同志接着说：她已和二十四位同志谈过话，组织上认为你俩是比较适合的人选。她问我们是否可以牺牲去延安学习的机会，而去鄂西工作。这时，我的思想斗争相当激烈：因为交通困难，湖南地下党的同志去延安的条件限制很严，当时省委规定，要县以上干部、有培养前途的同志，才能批准去延安；能够夫妻两人一道去的，就更少了，有些同志就是由于夫妻两人不能一同走，而滞留在桂林。我俩都已被批准去延安，不仅自己高兴，同志们也以羡慕的眼光看待我们。从湖南到桂林，过贵阳，抵重庆，沿途关卡林立，特务横行，真是千难万险，好不容易闯过来了；今后由周恩来同志出而，公开派车送我们去延安，万无一失。到了延安，不管是学习或工作，都可以提高自己，而且在自己的政权下工作、学习，可以扬眉吐气，无个人安危之忧。到鄂西去，则不仅生活艰苦，而且随时随地有牺牲的可能。钱瑛同志的谈话，只是征求意见，并非组织上的决定，从个人利益出发，可以要求维持原来的决定，让我们去延安。可是听到钱瑛同志说，她已与二十四位同志谈过话，认为我们去鄂西工作比较适合。党对我们的信任，不仅使我感到无限光荣，也鼓舞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看到钱瑛同志以鼓励和信任的目光盯着我，我想一个共产党员首先应服从党的利益，而不要考虑个人利益。既然组织上信任我们，而鄂西又迫切需要派人去，我们应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接受党交给我们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用目光征求陈素同志的意见，她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也和我想到一块了，

就毅然决然地向钱瑛同志表示：我们完全服从党的分配。于是，满怀希望第二次去延安的我，为了党的利益，走到半路上，又折回来，转到艰苦的鄂西工作中去了。

九、从重庆到鄂西

南方局决定我们去鄂西工作了，组织部通知我，周恩来同志要接见我和刘蕙馨（鄂西特委派来南方局汇报工作的同志）、陈素三个同志。接到通知后，我们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能够直接听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不安的是，恩来同志这样忙，还抽时间接见我们，亲自指示我们的工作，可见鄂西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党员能够不负重托吗？一九四〇年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恩来同志在红岩咀十三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二层楼上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他一一问了我们的姓名和情况。当我谈到由贵阳到重庆的途中，用自愿两利的办法买“黄牛”车票，利用汽车司机熟悉情况，顺利地通过沿途关卡的经过时，他纵声大笑起来。他还表扬了刘蕙馨同志利用来南方局汇报工作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好学精神。我们初次见到党的领袖人物，开始不免有点紧张，听了恩来同志爽朗的笑声和亲切的谈话，使我们感到非常融洽温暖，开始见面时的那种紧张心情迅速地消除了。接着，恩来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然后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鄂西的情况。他说：目前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虽然尚能继续抗日，但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是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蒋介石派陈诚到恩施设立六战区

五〇月〇日

长官部，就是想要守住重庆的门户。鄂西是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地区，是我二方面军贺龙同志所创建的老苏区，地形好，群众条件好，也是我们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一九四五年，王震、王首道南下支队集中干部，我原是被指名集中的。刚打好背包准备去飞机场集合时，忽然接中央组织部电话通知，要我不去集中了，到中组部去谈话。原来，中央决定，由廖志高同志负责去湘、鄂、川、黔建立“隐蔽根据地”，恩来同志和董老要我负责在党校二部集中一批干部，准备去那里工作。日本投降后，才另行分配我们的工作。我直到这时候，才真正认识了那个地区的重要性。）你们去那里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贯彻中央指示。首先，要把建立农村支部作为工作的重点。所有干部都要社会化、职业化，干什么，就要象什么，而且要成为本行的能手。譬如学生，就要是优才生，要以自己的学业和品行，树立威望，团结同学。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他抱有所谓“建设新湖北”的野心，这次带了政治部的一批特务去鄂西，会对我们党下毒手的，你们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准备。但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坚持鄂西工作，不要随便跑到这儿来。恩来同志给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临走时，他还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他那威严而又慈祥的目光，从头到脚地看着我，使我激动异常，一时热泪夺眶而出。同志间的无产阶级感情，领袖的周详指示和亲切关怀，指引和鼓励着我满怀信心地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第二天，我们悄然离开招待所，躲开了特务的耳目，走到江边搭轮船去万县。我们是坐的统舱，铺连着铺。睡在我旁边的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下级军官（连长或连附）。从交谈中知道他也是去恩施的，我就主动和他交朋友，请他抽烟和吃零食，利用他同行作掩护。船行一天多，到万县码头，我们即搭划子过江，

在云阳县境起坡，走利川，到恩施，一路崇山峻岭，险峻栈道，真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感。

到恩施县城后，我和陈素住旅馆，刘蕙馨同志和我们约好了接头的暗号后回机关去了。第二天下午，一个颀长英俊、约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来旅馆找我们。接好头后，他提着我们的箱子走头，我们在后面跟着，他走得很快，时常放下箱子等我们。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特委派来的机关干部。到特委后，才知道他就是闻名已久的特委书记何彬同志。我们在特委机关住了两晚，同何彬同志一起研究了恩来同志的指示。他要我去湘鄂西老苏区，首先健全咸来中心县委，然后向湘西的龙山、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开展工作。他认为，咸来中心县委（包括咸丰、来凤、宣恩、鹤峰）机关应设在距龙山县城十五华里的来凤县城。要我先到咸丰找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共同研究后再进行工作。

十、鄂西的斗争

由恩施县城到咸丰县城有二百四十华里，我们在秋雨蒙蒙中，沿着公路走去。黄昏时，雨下得很大，我们到一个镇上找旅店，只见满街住着“糟殃军”（老百姓称呼国民党军队），连门坎上都坐着人。碰上他们，我们避之唯恐不及，只好摸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昏暗中看到一间单独的屋子，走去借宿，原来是个小庙。我们取得“庙祝”的同意后，找些草铺在殿堂上睡，屋漏，睡到半夜，被窝都淋湿了，只好坐以待旦。第二天早上，和“庙祝”商量做早饭，原来他是个叫化子，连自己都无米下锅，只好买了几个萝卜当早饭。步行四天，抵达咸丰县城，找到了马识途同志（四川人，大学生）。我向他和张思载（咸丰县委书记）、胡传统（咸丰县农业实验所技术人员，咸丰县委委员）同志传达了恩

来同志的指示。马识途同志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和何彬同志的意见，决定让陈素去宣恩一所小学当教员，作职业掩护，我暂留在咸丰，准备去来凤建立中心县委。后来，我去来凤时，顺路到宣恩陈素所在的小学了解情况。原来这所小学是李家的族学，校长是当地大地主、帮会龙头大爷李某的儿子。此人是个高中毕业生，在学校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李家住了两晚，了解到他家不仅是个封建地主家庭，而且他的父亲是当地一霸。他入党是赶时髦混进来的，对党、对共产主义，连皮毛认识都没有。当时我想这样的人，应在清洗之列，怎能靠他办的学校作职业掩护呢？白色恐怖一来，陈素就会作为他叛变投敌的献礼（果然，皖南事变不到一个月，他就登报自首了）。我一到来凤，就与在来凤工作的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克东同志商量，马上派交通员老李同志把陈素接来，并决定割断与李某的联系。这样才使党未因他后来自首而受到损害。陈克东同志建议我在来凤园艺场工作作职业掩护，我认为这不仅不能自由地到各县跑，而且许多人要和我联系，容易暴露，决定以小商贩面貌出现，俾能更好地社会化，也更便于往返各地。陈克东调走了，我和陈素就在来凤县城租了两间屋住下来，还有原中心县委留下的一个小向和我们同住，作为我们请的“伙计”。

不久，马识途同志从恩施来，传达特委决定，由我任中心县委书记，张思载（他的公开职业是甲马池中学英文教员）任组织部长，刘蕙馨同志任宣传部长，陈素同志任妇女部长。马走后，我立即去咸丰县甲马池中学通知张思载，约他在咸丰县城参加中心县委第一次会议；接着又和陈素分途到咸、来、宣、鹤四县的党支部了解情况，准备在中心县委会上，研究哪些同志需要调离，哪些人要割断关系，依靠哪些党员骨干，进行整顿和健全农村支

部生活，如何严格分开城市支部与农村支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去。后因情况发生变化，中心县委会议没有开成，只好由我和陈素两人分工来抓，我主要负责整顿支部和转移工作重点，陈素负责处理撤退、调离和割断党员的关系等工作。当咸米中心县委的工作刚做出一点眉目，准备研究下一步开辟湘西工作时，晴天霹雳，发生了突然事变。

一九四一年一月，正是农历除夕的黄昏时候，交通员李同志跑来告诉我，他到恩施时，看到街上呈现一种紧张气氛，许多军警向特委机关那个方向跑去。他怀疑出了事，一打听，果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抓共产党。他不敢再去特委机关，就连夜赶回来了。我分析当时情况，知道我们住处的只有马识途和交通员，马刚离开这里，还未回到恩施，交通员已经回来，当然不会有问题。又考虑到大年三十晚上，人地生疏，无处投奔，如果除夕搬家，反而会自我暴露，不如暂时留在此地。因此，我与陈素商量约好，如发生了问题，就把临街的窗帘扯开一个角。于是，她住机关联系，我则以拜年为名，去各县布置应变措施。我到咸丰找张思载，未联系上。回到来凤，马识途从利川派黎智（利川县委书记）来，通知我特委已遭到破坏，何彬、刘蕙馨同志被捕，他自己即去重庆找南方局，要我今后也直接与南方局联系。

何彬同志，湖北人，父亲是有名的老中医。他在大革命时加入共产党，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一直做地下工作。被捕时，他是湖北省委委员、鄂西特委书记，年未满三十。被捕后，开始敌人严刑逼供，他坚贞不屈。继而，敌人采取欺骗的手法，企图软化他，给他单间住，陈诚亲自找他谈，许诺他说：如果自首，可当湖北省三青团干事长，还拿着任命状，要他去当县长。何都怒斥其奸，大义凛然。一九四一年冬，敌人看到何彬同志软硬不吃，

又对他说：“你身体有病，可以出狱就医，什么手续也不要办理。”企图跟踪侦破我党的组织秘密和破坏他的声誉。何彬同志回答说：“你们无缘无故地把我关起来，现在又想放我出去，那就要登报声明，承认抓我是错误的，我才出去。”敌人技穷，终于对他下毒手了。一九四一年冬，何彬与刘蕙馨同志一道就义于恩施。人民为了纪念他们，便将其骸骨在恩施建立了烈士墓。刘蕙馨同志是安徽人，大学生，是马识途同志的同学、战友和爱人，曾任鄂西特委妇女部长。被捕时，为咸丰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因生小孩，尚未到来凤工作。她带着小孩在监狱里斗争了一年，热情帮助被捕的同志，鼓励她们坚持斗争，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就义时，她仍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走向刑场，刽子手将小孩夺下丢在路旁，一位姓伍的菜农把她捡起来，藏在菜担中挑走了。等到敌人注意到烈士的遗孤，企图“斩草除根”时，女儿已抱在伍大嫂的怀中了。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全国科技大会时，马识途同志尚未找到这个女儿。一九八〇年，我到四川参观沼气时，老马告诉我，女儿已找到了，她随伍家父母住在汉口，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接到马识途同志的正式通知后，我就集中精力作巩固党的工作。先去咸丰与张思载联系。这时，胡传经同志告诉我，他按照我上次的布置去了甲马池，见到了张思载，但张不愿同他谈工作，一见面就要他走，并说今后不要再去找他了。为了把情况弄清楚，我还是要胡再去甲马池一趟。他回来说：张思载已离开了学校，但未听到有捕人的事。根据这一情况分析：张思载可能是动摇逃跑了，也可能秘密自首了。我于是要胡想办法躲开一下，约定过一个月再来找他。接着，我又回到来凤，与陈素商量，我们一致认为，中心县委虽只剩下我们两人，但我们一定要遵照恩来同志的指

示，坚持在鄂西斗争和开辟湘西老苏区的工作。随后，我们遴选了咸丰的胡传经和来凤的谭怀安两同志作为培养本地干部的对象，和我们一道开展活动。当时，我们由湖南家中带来的钱只剩下两元了，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和党的活动经费，我们只好把两个人的毛衣拆下来，由陈素编织成小孩的帽子出卖，并把我穿的皮鞋也卖了，来维持三个人的生活 and 党的活动经费。我注意到小向自特委遭受破坏后，情绪不稳定，同时经费也确实困难。他是鄂东人，是陈克东同志留下来的干部，我就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介绍他去找陈克东同志。为便于工作的开展，我与谭怀安同志商量，由他找亲朋戚友集资做小生意，逢集赶集，逢场赶场，他当雇员，我当老板。在去赶集的路上，他挑货担，我背背包。快到集场时，我换上长衫、礼帽，作为一个赶集的有钱人，去找党的同志研究工作，他就到集市摆货摊。收摊后，到约定地点会合，我换了衣服，背上背包，又装起老板来了。就这样，我们把咸来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四个县的党支部巩固下来了，并把以城市活动为中心的党的工作，转移到农村，建立了巩固的农村支部。

一九四一年五月，应付事变和巩固党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陈素同志分娩期近，为了吸取刘蕙馨同志因生小孩被捕的教训，我与胡传经、谭怀安商量，借去湖南贩货为由，把陈素送回我家里去生小孩。取得他们同意后，我要谭怀安筹措一笔办货款，邀约他的一个侄儿同行，并到县商会领了介绍信（即通行证）。我们一行四人，取道龙山、大庸，坐民船到津市，经长沙，于某日晚上到达湘潭县城，在河街上一个旅馆住下。半晚，听到隔壁房里有人谈话说：今晚警察局有事，不会来查夜了。接着，就议论起时事来。一个人气愤地说：彭德怀在前线抗日，他家犯了什么法，

为什么逮捕他两个弟弟？一个被当场打死，一个被抓起来，连审问都不审问，就把他们一起八个人枪杀在易家湾，这太岂有此理了。另一个附和着说：别人我不知道，刘积瑞是我屋门口人，他年未三十，医道很好，我们那一带被他救活的人不少，为什么也把他枪毙在易家湾？“糟殃军”把他打死后，丢在粪池里，推倒厕所墙把他的尸压在下面，家乡老百姓，扒出他的骨头，送到祖山安葬，替他做了道场，他如果不是好人，为什么老百姓这样不怕死，替他收尸呢？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得悉湘潭县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虽然事已过去了三四个月，看起来情况还很紧张。于是，我和陈素天未明即起床，趁清早行人稀少，步行至河口我舅舅周家冲家里，要表弟挑点东西走在前面探路，我们远远地跟着。到家时，父母见到久别的游子，惊喜交加，母亲马上到厨房切腊肉为我们做饭。我对母亲说，我不能吃饭，吃了您的腊肉，您可能会丢掉一个儿子，请您老人家把陈素生孩子的事安排好，儿子就很感激了。母亲忙从柜子的夹层里找出几十块银元给我，我喝了一口茶，就辞别父母走了。为了躲开白色恐怖，筹措一笔经费，我到了沅家河林荫梅家。林荫梅是个小地主，法政大学毕业，当过国民党省法院的录事，县法院的承审员，又在乡里当过保长，但为人有正义感，好打抱不平，日寇侵华后他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我和他有亲戚关系，在他最困难时，我帮助过他，他对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女儿林舜英受我的影响参加了党，牺牲在贵阳。由于她女儿的关系，省委聂洪钧夫妇在他家住过，湘潭中心县委袁学之、谭伟等同志都利用他家作过联络点、避风窝。解放后，证明他一直对共产党是同情的，对地下党的同志，都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我到他家时，他知道国民党政府正在通缉我，主动说服他的爱人，把刚到手的二百两出租田银子借给了我（后来我父

亲归还了他）。我把它换成“法币”约三百元左右，拿这笔钱贩了一批平江大布，又转回来风去做生意。因为有了本钱，经过一段时间，生意做得更兴旺了，差不多咸、来、宣三县的集市，都知道有个“杨老板”。

有一次我们到黑洞赶场，刚把摊子摆好，忽然走来一个人，向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江湖黑话，我听不懂，只望着笑。他就骂我，向我吐痰，有意进行侮辱。我们怕引起纠纷，暴露自己，只好装副笑脸，由他去骂。可是，他越骂越凶，旁边的人实在看不过去，群起制止，他才悻悻而去。群众告诉我，这个家伙是这里站码头的（即帮会流氓头子），想敲我的竹杠。群众还好意地劝我们快点走，免得他再来时吃亏。我们赶快收拾好摊子就走了。谭怀安同志很生气，一路走一路骂。走到离黑洞十多里的一个山坡上坐下休息时，我劝老谭说：你不要生气，这个家伙是个小流氓，算不得什么。我们做的是蒋介石的大生意。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我们党夺取了政权，就要搞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这里也会要修铁路、公路的。人民就不会象我们现在这样肩挑背负来“上天砧”了。对这么一个小流氓，也值得你气成这个样子么？老谭听我这么一说，转而发笑了。其实，我当时也气得要命，和老谭这么一说，自己的气也消了。

我们在报上看到，蒋介石政府召开第三次参政会会议，因为新四军事件发生，我们党中央决定抵制这次参政会会议，共产党的七位参政员都不出席。由于在新四军事件中，我们有九千人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中，叶挺军长被俘，项英等同志下落不明，而我们党又拒绝参加参政会第三次会议，这就影响了某些同志的情绪，甚至有悲观失望的。我和胡传经、谭怀安等同志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按照列宁的学说，当我们的力量弱小时，要

争取参加国民会议，把它作讲台，来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当我们的力量强大时，就拒绝参加国民会议，不去为他们的假民主装点门面，以此来揭露反动政府的不民主，教育群众，认识他们的反动性。我们拒绝出席参政会，就是遵照列宁主义行事的。新四军原来只几个支队，皖南事变后，迅速发展为七个师，这不是我们力量壮大的证明吗？同志们都同意这个看法，更加信心十足、斗志旺盛地工作着、战斗着。

十一、到达延安，得偿夙愿

我在送陈素回家生小孩之前，曾给南方局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鄂西的情况，和我们的应变措施。六月，接到南方局调我去重庆的信。我安排好工作后，邀谭怀安同志一道，于七月间出发，一路赶场做生意到万县，再乘船到达重庆。走到红岩咀十三号南方局，接待我们的是龙潜同志。我把南方局调我的信交给了他。这时，孔原同志（南方局组织部长）出来了，他认识我，马上安排我们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下来。谭怀安同志不久又回鄂西去了。

在鄂西的艰难岁月里，虽然看不到党的指示，还是要为党的事业而工作。为了坚持斗争，不得不随乡入俗，经常过着自己实在不习惯的生活，如在饭铺睡觉，要脱得赤条条的（这叫做“细睡”）睡在浓血疮痂沾满的被子里，有时还要两三个人共一床被子。吃饭时，一桌人共用一个木制的调羹喝汤。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我传染上了“湖北板疮”，连凳子都不能坐。住在南方局招待所期间，周里同志告诉我一个药方：把斑麻虫焙枯碾碎，与熔化的硫磺拌和好，灌入斑竹筒里，阴干后取出和麻油磨成浆擦患处。我如法炮制，治好了身上的疮。在鄂西时，自己处在敌特的严重威胁之下，仍要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生活上不安定，经济上无着落，还要

帮助同志们解决各种困难。到南方局后，看到中央文件，听到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食粮极为丰富，又不担心个人的安危，衣食住行都有保证，尤其是领导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使我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不久，南方局分配我在宣传部做发行方面的工作。当时，宣传部经常将《新华日报》择要摘录，印成四开版面的资料，寄给海外华侨和知名人士。有一期，我发现一些数字互相矛盾，如实地向领导上反映，恩来同志很重视，亲自用墨笔修改更正，并要我们对照改正后再寄出去。

我在威来中心县委工作十个月，由于鄂西的党遭受破坏，所有党的活动费，干部调动费，同志们南来北往联系工作的路费，以及我和陈素的生活费，都是我们自己筹措的，在经济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没有钱添制衣服和日用品。到重庆时，我连衬衫也没有一件，洗脸盆还是一位女同志把她的洗脚盆消了毒送给我的。组织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董老（当时他是南方局的宣传部长）亲自在南方局的党委会上提出要给我添置衣服。组织部还给了我五百块钱寄给陈素作路费，调她来南方局。南方局领导同志对党员从政治上到生活上的关心，工作的深入细致，使我感受很深。特别是恩来同志和董老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益。

一九四一年九月，孔原同志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送我去延安学习。他说，因为国共关系恶化，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延安的车，还是恩来同志亲自找蒋介石批的条子。他又说，陈素同志来重庆后是否能去延安，不能保证，不过组织上一定负责，只要有可能就送她去。他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如果统一战线破裂，也可能夫妻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最后他征求我的意见说：你去延安学习，组织上虽然决定了，如果你要等陈素，也可以选择，这儿还有同

志要求调你到昆明去工作哩。去延安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孔原同志刚一说完，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服从党的决定，坚决回延安去。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我们一行共约百把人，由石磊同志带队，分乘四辆卡车，由重庆出发，过成都，出剑门，越秦岭，经宝鸡，走交道镇（边区的交界处），最后到达延安。车过交道镇时，我情不自禁地口占一绝：

驱车直出剑门关，秦岭云横行路难。

喜听宝鸡报天晓，放歌齐唱颂延安。

经过十年的漫长岁月，走过许多崎岖曲折的道路，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党校学习和整风、生产运动中，度过了四个年头。陈素同志在党的关怀下，也于一九四三年回到了延安。我们一道学习，携手战斗，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而积极斗争。一九四五年冬我们奉调离开延安去东北。一九四九年又由东北南下回到了湖南。

“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我虽年届七旬，追忆当年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进行地下斗争的生活，不禁心潮澎湃；面对四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和美好前景，仍然信心百倍，豪情满怀。

一九八二年九月

湖南种子东北花

——协助韩梅村将军凌源起义经过

邓 钧 洪

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东北冀察热辽老解放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军区召开了一次会议，专为总结国民党嫡系将领韩梅村当年五月一号在热河凌源率部起义的经验。会议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主持，有副司令员黄永胜、杨梅生、宣传部长赵毅敏、城工部长李乐光、公安部长杨奇清等近二十人参加。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里派去东北策划韩部起义的周太暄和我也被邀参加了会议，由我详细汇报了策划起义的经过。经过到会同志的深入分析和热烈讨论，最后程子华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大意是：一、韩梅村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是关麟征、杜聿明的老部下，抗日时期曾任国民党军五六六旅少将旅长），他的起义是主动追求已久，并在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前后实现的，与其他战败被围或被形势所迫而起义的性质完全不同。对此，我们的同志往往缺乏足够估计，思想落后于形势；甚至当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偷过封锁线来接洽起义时，我们有的同志还在半信半疑，不敢大胆放手协助，几乎给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二、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快，我们即将转入大反攻。既然在国民党军嚣张一时，我们放弃延安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还能主动追求起义，那末，即将到来的反攻胜利形势必将促使更多的

国民党军弃暗投明，起义自救。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和气魄，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敢于迎接胜利。三、这次起义，正当我军即将大举反攻的前夕，对韩的老上司、老同事杜聿明、郑洞国及其他东北蒋军将领来说，确是一个晴空霹雳，对国民党军盛极一时的嚣张气焰，是一次当头棒喝；对蒋管区特别是东北军队士气的瓦解是一付催化剂，而对坚定我军大反攻胜利的信心，鼓舞我解放区人民的斗志，提高对形势发展的认识，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四、打入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部，协助韩梅村司令举行起义的，正是我湖南地下党派去的同志，这就说明我地下党的秘密革命活动是错综复杂，非常艰巨的。湖南地下党撒下的种籽，居然在东北开了花，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可以断言，在我军即将举行全面反攻的大好形势下，这种有利于我们反攻的意外好事，还会层出不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尤其要吸取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作好充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一）离湘出走

湖南地下党撒出的“种籽”，为何会飘荡到了东北呢？原来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经过谈谈打打，正进入最后决裂时期。国民党部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不断运往东北，当他们的前线部署接近完成时，就撕破和谈的假面具，凶相毕露地大动干戈，说什么“三个月”、“六个月”要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因此，他们在东北、西北、华北、山东都大打出手，而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则推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当时长沙盛传反动派已经秘密列出了六十二个人的黑名单，要捕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一九四五年底和四六年初，我正在长沙和刘东安、刘国安、

雷天一、刘建安以及韩淑仪、常杏云等一起，在周里同志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而以开书店（邓晏如主持的“兄弟书店”，实际是“三联书店”的分店）和从事新闻报纸（国民日报）的编辑工作作掩护。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在国民日报遇见了原来在省立第一师范和我同班同学的毛孝祥。此人是三青团的骨干，我一九三九年在第一师范作地下党支部书记时和他是死对头，我毕业离校后去湘北抗日前线作民训工作时，就是被他们告发而被捕入狱的。这时他已被提升为省三青团的科长，专门追踪侦察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把这情况向周里反映后，他叫常杏云转告我：省工委决定我马上离开长沙。

到哪里去呢？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护送邓晏如的爱人周玲去汉口联营书店（三联书店的分店）生小孩，并把原新知书店经理华应申（他当时在淮阴新华书店当经理）的母亲和妹妹华应吉送到南京和上海的三联书店（也就是新知书店）去，想通过新知书店经理沈静芷、刘逊夫介绍和掩护我通过封锁线到新四军首府淮阴去。但当我到达上海时，形势已很紧张，前线封锁很严，无法进入解放区。只好再找第二条出路。

第二条路是到东北去。还在当年四月份，我就接到东北阜新市国民党市政府主任秘书杨明清的信，邀我去那里工作。杨是我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一九四二年又同在桂林铁路子弟学校工作过，他当时表现进步，和我们常有来往。但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便打听我的组织关系，只是猜测我在桂林开的平明书店可能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他有个小同乡叫韩梅村，是杜聿明的亲信部下，抗日初期曾任国民党军五六六旅少将旅长，后因带兵练兵有点模仿八路军的作风，被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撤了职。他当时闲居在桂林，曾托杨明清想通过我取得与地下党的联系，终因不

能肯定我是共产党员而未敢启齿。此事我是后来从杨明清口中得知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韩以少将高参名义随杜聿明去东北接收阜新市并任市长。杜聿明原想照顾他去阜新市发一笔“劫收财”，而他想的却是如何励精图治，解民倒悬。他到阜新以后，照样穿旧军衣，吃高粱米饭。把接收的小轿车卖了办学校，自己出门只骑脚踏车。并采取一系列进步措施，压制豪强，关怀民瘼，保护进步人士和解放区的被俘人员。可是他的这些作为，解放区的人们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却无法理解，没有向他作出任何反应。于是他叫主任秘书杨明清给在长沙的朋友写信，要求我们派人去协助他工作，并暗示“英雄有用武之地”，意思是想依靠我们去打通当地的党和解放区的关系。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我把邓晏如和华应申的家眷先后送到汉口和南京。到南京后，我先后住在华应申的哥哥和姐夫家里。他的哥哥华应元思想进步。而他的姐夫（忘其姓名）却是南京警察厅的秘书长，专门做捕杀共产党人的工作的。他当然不知道姨妹华应吉和我正是要到淮阴新四军华应申那里去的。我们在他家住了几天，接受他的客礼相待，还安全地利用了他这把保护伞。我和华应吉到上海四马路找到三联书店，又在法租界新知书店找到沈静芷、刘逊夫以后，得知去淮阴的路已经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不能通过。当时新知书店周围都布满了特务暗探，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不能在那里久住，住旅馆没有钱，又无亲友可投。至于党的组织关系，则要等工作地点确定以后，才能慢慢转来，而且出了省，还要经过中央或中央局。许多人因此暂时丢了党的关系。这时真是走投无路，进退两难，最后只好决心冒险去东北。

去东北也很不容易。当时铁路、公路均已破坏，陆路交通完

全断绝，只有海上尚可来往，而又只有几条破船，尽被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家属占了，有等上几个月仍无着落的。而且黑市船票比官价高一百多倍，没有特殊关系还买不到。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暂回南京，一是找华应元向有关部门活动，看能否找到优先去东北的证明；二是去梅园新村找董老，说明湖南党的正式关系一时难于转过来，是否能够另想办法去四军。结果二者皆告落空，我又不敢再去找首都警察厅那个秘书长，最后还是经人介绍到大刚报记者李凌冰那里搭铺挤着住了几天。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在报纸上看到招商局一条最大最好的海轮蔡锷号第二天要开往天津的消息。我想，我不能困死在这个鬼地方，穷人也可想出穷办法，路是人闯出来的。于是我在第二天一早赶到上海，当蔡锷号正在升火起锚的时候，我雇上一只划子，冲向黄浦江心，攀上了蔡锷号海轮，混入人群当中。到查票时，我摆出新闻记者的架势，大模大样地从船头走向船尾，他们居然没有拦阻我，让我自自在在地到达了天津。

到天津以后，再乘火车出山海关。那里国民党军警检查很严。我考虑东北是新收复区，买不到进步书籍，为了工作需要，带了一大箱子马列主义书籍，上面盖些《三民主义》之类的书作掩护。当检查时，我照样大大方方，拿出我的记者身份证，主动打开箱子请他们检查。两位八爷一看，表示完全信任，不予翻检了。我就这样侥幸地混出了关。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太冒失了。

（二）东北扎根

一路上经过多番折腾，我终于在六月底到达东北阜新市，找到了杨明清。他把韩梅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我和韩初次见面时，难免有些对旧高级军官的那种隔阂，但几经

交往，就顾虑全消，非常融洽了。他是那么坦率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一般高级官吏的傲慢态度和腐朽习气。他生活朴素，廉洁奉公，衣着饮食，与平民无多差别，从不追求个人享受；思想作风也很正派，坚持真理，不计名位，不畏强权，更不作威作福，以势压人。一心兴利除弊，为民造福。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确使我惊叹不已，感到剥削阶级队伍和反动阵营里，也还有方刚正直、志行高洁、追求进步的人，不能从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他们抱成见。从此，我和他心气相通，无所不谈。他开始要我作市政府的教育科长，我和杨明清商量后，认为最好是当机要秘书，便于做秘密工作。

我们认为，要在阜新树立廉正清明的政治局面，首先必须自己做到，不贪财嗜利，不徇私舞弊，不养尊处优，不欺压人民。吃粗杂粮，穿棉军衣，关心民瘼，勤求民隐，除自己应得的薪水外，一尘不染。我们这样做了，就给阜新人民造成一个很不寻常的印象，纷纷谈论，有口皆碑。那些被权贵推荐来想升官发财的人，看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市长，也不免大失所望，一个个借口开溜，另图高就去了。

其次必须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阜新当时的主要反动势力是国民党书记长江济、参议长王涵之、贾玉昆和大蒙奸李守信及土匪头子崔兴武、索华忱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鱼肉乡里，欺压人民，阜新人民恨之入骨。韩征得杜聿明的同意，扣押了崔兴武、索华忱，赶走了李守信，杀住了江、王、贾的气焰，阜新市及附近各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而江、王、贾等则到处造谣，说韩梅村所作所为，完全象个“八路”。

第三，我们注意了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和福利工作，我们查禁过阜新市的反动书刊，办过宣传革命的油印进步报纸，去北京买

回了不少进步书籍，办起了以韩和我兼过校长的阜新中学。我还去省立中学高中毕业班兼过课，尽力向青年学生们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启蒙教育。还组织中学生公演过宋之的剧本《转形期》（描写解放区县长与农民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我们还办过托儿所、幼儿园和救济院。这并不是我们抱有什么“乌托邦”的幻想，而是觉得只要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麻痹手段，宣传启蒙进步思想，给群众一点实际的物质利益，即使搞点改良主义也是好的。

第四，我们在打击反动势力的同时，还想尽办法保护革命进步势力。阜新邻接解放区，出城向西二十里就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当地军警和公安局经常送来抓获的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和区乡干部，当时监狱里已关着二、三十人。我们决定来一次清狱，由我负责把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进行“审问”，只要是与八路军、解放区有关的“人犯”，都借口证据不足，案情很轻，予以释放了。

（三）设法找党

经过三个多月政治上的苦心经营，我们在阜新的声誉更加提高了，韩、杨的信心也更足了，我也站稳了脚，扎下了根。接着就着手进行下一个步骤。这一步的主要课题有两个：第一是设法与解放区、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叫东北人民解放军，本文统称解放军）取得联系，打通与当地党的关系，以便得到党的直接领导，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前面说过，当时陆路交通破坏，南北不通，在解放区与蒋管区互相封锁隔绝的情况下，与地方党是无法直接打通关系的。要做到这点，必须经过延安党中央，那在时间上不允许，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我们后来起义进入解放区，还是经过中央通过香港南方局钱瑛同志与湖南

党联系，才接上组织关系的，但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第二是建立自己的武装，并收编和集中地方武装，以防止他们对解放区的骚扰和对老百姓的残害，进而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协助扩大解放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率队探察解放军的动向，以便与之取得联系。当时阜新的西、南、北三面都被解放区包围着，出城二十几里就是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但是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在没有打通关系以前，根本无法找到他们，只能听到一些传说的“神话”，如说什么红梅女司令（内蒙游击队女司令）如何来去如风，令人谈虎色变。至于解放军正规部队的动向，就连传闻也听不到，我们在没有办法当中，不得已采取了一个带几分冒险性的办法，带一支小的队伍到游击区去，进行探察联系。九月的一天，我带了一排阜新县保安大队的骑兵，到阜新西北地区距城三十多里的边境去巡查。那个地区是大蒙奸李守信部（约有千余人枪）活动的场所。阜新参议长、大地主王涵三当时也在李的司令部活动，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不时对解放区进行骚扰。他们把我请去会谈，说八路军已离此地很近，就要向他们发起进攻，请我赶快离开，避免遭受损失。实际上是他们对韩和我是存有戒心，对我下逐客令。我知道在他们的怀疑和监视下，不可能达到探察联系的目的，只好带着队伍暂时回来，我们刚启程，后面就响起一阵枪声，无疑是他们搞的鬼。

二、建立部队，扩充实力，准备起义。我到阜新以后，感到为了对付地方团队和地主武装，为了工作的开展以及在适当时机宣布起义，把队伍拉向解放区，我们有自己建立和掌握武装的必要。于是韩、杨和我共同商议，由韩写信给杜聿明，建议在阜新建一支部队，由韩掌握。杜同意了，我们便以原驻热河凌源的东北

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不听调遣为由，把这个支队的七、八、九三个团约三千多人整编为七、八两个团，又把阜新地区的地方团队整编为第九团，成立新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部，由韩梅村兼任司令，刘清霖任副司令，归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挥。但是这个部队的参谋长却是东北保安司令部介绍来的，三个团的团长、团附也都是极其反动的旧军官，他们除军事指挥上能服从韩的命令以外。在政治思想上是很难接受其影响的。因此，一切起义的策划只能在韩、杨和我之间进行，对他们必须严格保密。有一次，后来提升为第八团团长的钟良请我吃饭，饭后第九团团附涂怀忠突然假装开玩笑地当众对我说：“你很象共产党的××首领。”我也开玩笑地回答：“要有这样的好事，我一定委派你当总司令。”看来他们对我这个“机要秘书”是目为异类。对我们释放解放军和边缘地区的俘虏及政治犯，限制军统、中统特务活动的行为已很怀疑，只是碍于顶头上司对我的信任，不敢公开捣乱而已。我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在没有取得与当地党的联系以前。只能依靠韩的军事命令来掩盖自己的革命意图和行动。这就给策划起义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三、由我去北平找军调部中共方面的负责人，说明我们的意图和要求，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打通党的关系并和解放区取得联系，同时顺便购买一批进步书籍，供青年们阅读。这年十一月底，我到了北平，首先找到“读书生活出版社”，谈及我过去和三联、新知书店的关系，并选购了大批进步书刊，由于他们也是受上海三联、新知总店领导的，对总店负责人沈静芷、刘述夫等同志都很熟悉，听到我谈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已相信我是地下党的同志，但按照地下党的组织原则，彼此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位同志（忘其姓名）终于认为我所谈的情况和要求非常重要，是

一件关系党的革命事业的大事。当即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北京饭店二楼去找军调部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徐冰和张香山同志。由美国马歇尔倡议成立的中国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包括美国、国民党、中共三个方面的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国民党代表住一楼，中共代表住二楼，美国马歇尔等住三楼。当时国共关系正处在最低潮，中共方面负责人叶剑英已回延安，当我通过一楼国民党的监视走上二楼时，接见我的同志也不知是否徐冰（因我从未见过他）。他看到我穿的一身国民党棉军服，感到非常突然，不免有些吃惊，劈头就问：“你怎么能通过一楼到这里来的？要小心啊！”当我说明来意，详细地说明韩梅村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当时我们在阜新的情况和意图时，他表示很为难。我要求他无论如何设法帮助我接通解放区和当地党的关系，他沉吟了很久说：“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尽这个义务，可是难啊！我们这里是公开谈判机关，不允许干这种秘密工作。如果被国民党侦察到了，那就会出大问题，给党带来麻烦，造成被动。我们是心有余而势不许，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原谅这一点。”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何况我又没有党的正式关系，只好一再保证自己不会泄密，求他尽量设法，他只是摇头说“不行”。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我只好自觉告退。

四、写信到湖南，向周里同志求援。信中用隐语说，我在阜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生活困难，请求他介绍当地朋友给予援助，并把我的衣服鞋子赶快寄来。这就是说，我在万分焦急地等待组织关系。不久，周里就派了原在宁乡一个中学当校长的党员周太暄和他的爱人陶舜荪到阜新来工作，并嘱咐他们通过湖南党在南京的联络员刘寿祺去梅园新村找董必武同志，请董老给我们接通东北党和解放区的关系。后来据周太暄说，他未找着董老，

就是找着了，也难一下打通关系。这一着又未达到目的，我们只好一面靠通讯和湖南党保持联系，一面用我们自己的革命行动去争取与解放区建立关系了。周太暄夫妇到达阜新时，已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我把他们暂时安排在阜新市中学任教。从此，我们多了两位得力的同志。加以我原来留在长沙的两个学生胡良杰和邓敏捷，也由湖南党的同志找到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把他们当作难民子弟送到东北，我们的起义准备工作就又增加了几个帮手。

（四）一场误会

既然通过上级组织沟通与当地党的关系的愿望不能实现，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没有与当地的党取得联系就停止革命工作吧？于是，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取自己上门去找的办法，再作一次侦察联系。就是由我们的同志带一支部队到边界去巡逻，把解放军引出来，再派人去向他们说明情况，以实际行动来争取他们的了解和信任。我们的打算是在取得解放区的信任以后，先在边缘地区建立“中间两面”政权，以便逐步扩大解放区。所谓“中间两面政权”，就是那里的区乡政权，名义上是国民党政权，由我们供给经费，实际上解放区派人领导；表面上为国民党办事，实际上为共产党解放区办事。希望用这种波浪式推进的办法，来逐步扩大解放区。暂时不公开宣布起义，尽量争取更大的成果。这种打算，如果能得到党的领导和解放区的周密配合，未始不可实现。但是，后来由于没有得到解放区的有力配合，以致计划未能实现，只好匆匆举行起义了。

正当我们打算带队出去探察时，阜新地区的国民党党棍和地主恶霸造出舆论，说我们不打“八路”不反共，却把他们坚决反

共的部队整编了。国民党书记长江济、县参议长王涵三等联名向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告状，说韩梅村“政治主张极为乖谬。”于是韩为了掩人耳目，借机行事，便集合五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一个特务排，带上团长钟良、赵序伍、团附涂怀忠，王茂恩等一同出发，装作打解放军的样子，向阜新西南二、三十里的王府与红帽子一带边缘地区推进。一路浩浩荡荡，故张声势，名为巡边，实际上是要找机会和解放军联系。

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到达离阜新西面三十余里的红帽子。前面侦察兵回报说，离我们二十里处发现有解放军。我们马上下令驻扎下来。同时考虑到要和解放军取联系，韩在此诸多不便，万一事机不密，会使他首当其冲，我们便建议他当天下午返回阜新，只留下我和几个团长、团附去周旋，由我相机行事。当天晚上，我们指挥部驻扎在红帽子的一个大地主的大院里，院子的高墙四角均有炮楼。除了韩带回阜新一连以外，其余四个骑兵连和一个步兵连都部署在大院周围。当晚风平浪静，没有得到任何解放军向我移动的情报。我正在考虑着如何才能第二天创造条件，找到借口，以便偷渡过去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午夜过后，前哨仍无动静，除担负巡逻、侦察和岗哨的士兵外，大家都安然入睡了。到凌晨三、四点钟，当人们正在酣睡时，突然枪声四起，大院被解放军紧紧包围了，我们赶紧起来弄清情况，发现布置在大院周围的五个连全部不知去向，估计是溃散了，这种突然事变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几个团长、团附向我建议，要带几十个精选的卫队突围出去。这可把我急坏了，如果突围，不但我们的人都会被打死，对方也会受到损失。我只好打电话给在阜新的韩司令（我们是架了军用电话的），说明不能突围的理

出，请他下令定夺，意思是即使被俘过去也是好的。韩当然是心领神会，立即下了不能突围的命令，团长们一听不妙，害怕要当解放军的俘虏，一个个开溜逃命。他们是从丈多高的围墙跳出去，找到一个包围圈的空隙跑掉的。接着，厚实牢固的院门烧着了，机枪手榴弹都打到院里了，眼看解放军就要冲进来。我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与对方联系的，我们即使不被打死，也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最好是暂时离开这里，等到战斗结束后，再回头来找他们。于是我也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从那个墙上的空隙处跳了下去。不料那个空隙被发现了，机枪封锁严密，一连串枪弹就落在我们脚下，打得尘土飞扬，我幸好没有中弹。

我们离开大院以后，通过小镇的曲折街巷，到达了旷野平原。那时天尚未亮，皓月当空，茫茫积雪，一望无际。在雪光反映下，人影清晰可见，后面高处的一挺机枪，一直对准我们射击，打得前后左右雪粉纷飞。小孩吓得哭不出声来，我连忙按着他一齐趴下，等到机枪不响了，又爬起来跑几步。如此反复多次，才算逃出了射程。向东走出三、四里后，天已发亮，隐约看到一个村庄，农民们惊慌地走过来，把我们领进了暖炕。这时我们的马匹行李都已丢光，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步行回去是有困难的。恰好碰上一辆去阜新的大车，只好暂时搭上先回阜新。休息好了以后，再化装出来找解放军。

由于这次“误会”，我们丢掉了一个精锐连和一个特务排，连长、排长和士兵几乎全被消灭，解放军肯定也有伤亡。特别是想到解放军亲人的伤亡，我不禁阵阵心痛。这是一个不小的代价啊！



（五）两进解放区

回到阜新的当晚，我向韩梅村汇报了情况，当经商定，由我单独秘密进入解放区去执行联系任务。第二天清早，他派亲信借来了小商人的衣帽鞋袜，我就装成小商人，带上阜新地图，奔向王爷府（此时王府已被解放军占领。我们的那个“精锐”连就是在这里被歼灭的）。当我绕过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十三军的哨所到达王府时，却不见解放军的踪影。我找到一位老大娘向她打听，顺着她指点的方向走去，约走了三、四里路，到了一个小村庄，在那村旁的灌木林里发现闪闪发光的刺刀在来回晃动。我当时心中一怔，不是害怕，而是感到既亲切，又陌生。我一生还没见过解放军，今天有机会见到他们，能不激动得心跳吗？

战士把我引进一幢民房，看样子是个连部，有二十多人在忙着做饺子，包的包，蒸的蒸，喜气洋洋，这才使我想起那天是四六年除夕。他们有说有笑，亲如家人，对我这陌生人也十分亲切，热情地招呼我吃饺子，还怕我没有吃饱哩。他们纯朴真挚的感情，使我第一次感受见到革命亲人的喜悦。当我说明有重要情报需要见到他们有决策权的上级时，有个调皮战士问：“有什么大好事情，可以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吗？”旁边有好几个战士说：“这是秘密，你有资格问？”接着，连长就派了一班骑兵，带来一匹马，把我送到营部。营部又连夜把我送到团部。我不知到底到了哪一级的军事单位。为了保密，他们不说，我也不问。只说明事关重大军事秘密，问他们是否有权决定回答。结果，又连夜把我送到二十里外地名桤桤台的一个军事机关。到时已是午夜，一个姓曹（忘其名）的科长接待了我，说是“首长”早已睡熟，明天早上再谈。在我的卧室对门，住了三、四个青年，非常活跃，有唱有笑；其



中一个二十来岁，满口进步名词，口口声声要继承八路军的革命传统，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作风。这个青年叫皮广正，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三支队的一个排长，不久前被八路军俘虏过来的。八路军优待俘虏，他就伪装进步，表现积极。他们跑来打听我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显得非常亲热。我只说是个商人，往来阜新北票一带接洽买卖的。

第二天早饭后，有一位首长单独接见了，我才知道我已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十七旅司令部（当时民主联军独立作战的军事单位是旅（师），旅以上就是纵队）。接见我的是政治部主任李质。政委谢镗忠没有出面。李质声称他能代表上级单位决定答复我的问题。于是我就向他介绍韩梅村和我自己的情况与意图，并提出在边缘地区搞两面政权的想法。李质似乎半信半疑，他直爽地说：

“由于南北交通隔断，党的关系转不过来，这是客观困难，但我们却不能没有根据地随便相信一个人，这是革命斗争，尤其是军事斗争的原则问题。因此，我们既应把你当同志看待，又要当敌人来防备。这是血的教训，我想你是能够谅解的。”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当然懂得这个道理。难道我没有任何根据，就想凭三寸之舌来取得你和党的信任。但我完全有信心，总会取得你们信任的。现在就请你们提出具体要求，让我来接受考验吧。”我口里虽这样说，内心还是感到有些委屈。因为一般策动起义，总是党和革命队伍派人去做对方的工作，而今却要我来说服革命队伍，乞求起义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在没有接通组织关系以前，就这样拼命地往解放区闯呢？然而不这样，难道因为怕困难、受委屈就不革命了吗？我这时内心矛盾得有些烦恼了，紧接着说：

“说吧！你要我们干什么？怎样来考验我们？”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见我这样一问，便不加思索地说：“我们向你和韩司令要

两件东西：一要二十张盖好大印的阜新县政府（韩兼县长）的空白公文纸；二要阜新市和阜新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地图，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十三军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防御工事等等。”他说完望着我，似乎很得意地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没想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说：“行！你派谁跟我去取？”他说：“我们再商量一下，看派哪个干练得力的人去。”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当天下午，他们就派了一位侦察员，扮作赶毛驴的，与我同去阜新，由接待我的曹科长带一排骑兵护送我到王府边界。从桤桤台到王府四十里，中间又在我来时的那个团部停留了一会。接待休息之后，团长对我说：“李质主任来电话，我们这里有照相机，要我们合个影作纪念。”我已猜到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不痛快，便说：“要照就照我个人的吧，何必合照？放心，我不会计较的。我很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真没想到，为了革命来策划起义，也要经过这样复杂的内部斗争。然而，我认识到干革命工作，在特殊情况下，是难免会有内部斗争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虽辱犹荣，只有决心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对方的信任。照了相，我们重新上路，赶到王府，已是黄昏时候。护卫我们骑兵象急风骤雨似的，围绕王府奔驰了三圈，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然后我选在人们看不清的一角，急忙下马，换上毛驴，后面跟着化装佣人的侦察员，与曹科长匆匆握手告别，再走十余里，黑夜里遇上了阜新的巡逻骑兵，他们非常紧张，要把我们扣留检查。我随身带回了许多共产党、解放军准备反攻的宣传品，深恐遇上了十三军的巡逻兵那就麻烦了。但我表面还是镇静自若，掏出我的机要秘书的符号，命令他们派一班骑兵送我去韩司令家。原来他们是保安第三支队的，正好归我们管辖，就乖乖地听从我的命令，把我护送到了韩家。

回到阜新以后，我发觉那个跟我来的侦察员，不能胜任带回重要文件的任务，就写了几个字交他带给李质。约好过两天由我亲自将文件送去。随后我要杨明清办好盖了大印和私章的阜新县政府的二十张空白公文纸；请韩梅村司令命令三支队司令部的心腹人绘制好阜新地区防御部署的详细地图。事情办妥以后，我在第三天又去到王府，在约好的地方去找解放军，谁知又无踪影。我怕他们怪我失信，就在该处被作战时烧毁的一根房柱上，用钢笔写了几个字：“我已到此，不见其人”，然后再出王府向西寻找，没走几里，终于找到了他们。又和前次一样，我被辗转护送到了旅司令部。我见到李质，把他所要的东西统统交给了他，这次他特别高兴，对我亲热起来，不再把我当敌人看了。当即给我安排了特别房间，由曹科长陪着住宿，和李质两人单独一起开小灶。他还指着他的高头大洋马说：“这次我一定用我心爱的坐骑送你回去。”我说：“谢谢，我骑不了你那个庞然大物，还是上次那匹中国马安稳些。只是请你注意那个俘虏来的皮排长，不要让他逃回去危害我们就好了。”他说：“这事我们一定会小心。”第一天，我又向他提出上次的工作方案，他基本上同意了。但对于要求他们派人住到阜新去，以便彼此联络，筹建中间政权一事，他开始同意派曹科长，后来又说还得请示冀察热辽军区和中央分局，才能确定人选。他建议我先回阜新，等中央分局和军区批准后，再派人来找我联系。我希望越快越好。第三天他们把我送到王府。我仍在黄昏时候匆匆下马和他们分手，独自一人，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之夜，通过二、三十里的茫茫雪野，朝阜新方向走去，没有行人没有路，也没有村落人烟，只好借着雪光反映，在积雪尺余的无垠旷野，摸索前进。走了约三个钟头，才远远的听到犬吠，见到灯光，知道已近阜新城边。这时我已是气喘吁

吁，坚冰在须，手脚冻僵，精疲力竭了，但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六）变生意外

我第二次从桤桤台回到阜新后，已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了。我们日夜盼望解放区派人来，等了个多星期，仍无消息。一天，我从司令部出来，正在门口碰上了那个被俘排长皮广正和他的连长王善章，不知他是什么时候从解放区逃回来的。他看到我便惊呆了，接着就紧紧跟住我。我故意往韩司令家里走，他们也跟到韩家，坐下来以后，皮说：“我认识你，你是到过桤桤台的。”我说：“什么桤桤台？你是谁？你认错了人吧？”他说：“没有错，就在八路军十七旅那个地方，你说是阜新的商人，怎么又到了这里？”我说：“你疯了吧！你知道我是谁？敢这样瞎说！”韩夫人张剑云也说：“他是司令的机要秘书，你胡说些什么？”他俩有些困惑不解，就搭讪着起身走了。

我从韩家出来，感到有些不妙，就找杨明清商量，杨想了很久，最后说：“干掉他！否则很危险。”我说：“还不到采取这种最后手段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制服他。那样把事情弄大了，反而不好。再说，革命非到不得已时，是不能轻易伤害人命的。我想，最好让韩司令把他找来，说是司令亲自派我到八路军去做反间工作的，这是重大的军事秘密，如果泄漏出去，就要砍他的头。这样一吓唬，是可以把他吓住的。”杨同意了我的主意。我当即去找韩，说明情况和我们的意见。他也很同意，便把皮广正叫了来。他对皮说：“你很忠诚，应该嘉奖，但你哪里知道邓秘书是我派去向八路军做反间工作的，这是军事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讲。”我立刻严厉地对皮说：“你知道吗？没有我去桤桤台。阜新和你们都完了。八路军来势这么猛，你是见过的，没有我的反间

计，能挡得住吗？这个重大的军事秘密，你要是透露出去了，就要砍你的头！”我打起国民党的官腔，使皮广正吓得连连称“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十七旅负责人的不负责任，几乎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月中旬，周太暄、陶舜荪（涛）、胡良杰、邓敏捷等都先后到了阜新，教的教书，读的读书，给阜新中学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学生们受他们的影响，逐渐活跃起来。皮广正虽然不敢把秘密泄露到外面去，但对他的亲密上级和心腹朋友，总难免透露一些风声。加上我们在阜新的所作所为，我两次出入解放区，看见的和知道的人也不少，因而流言蜚语，早已暗播全城。只是慑于韩是杜聿明的亲信，又是“阜新王”，那些党棍恶霸还不敢公开叫嚷。恰在此时（约三月初），杜聿明为了进攻辽东临江一带解放区，把原驻热南凌源的中央军都调去了，命令韩部移驻凌源，担任锦（州）承（德）路护路任务。周太暄等随韩部去凌源，我暂留阜新办理学校移交事项，同时等待我的妻子、当时的朋友李茵从上海来阜新，共同参加起义工作。

韩部调离阜新时，阜新地区的党棍恶霸江济、王涵三等。立刻活跃起来。他们在交通要道刷标语、写传单，到处发快邮代电，还通过中央社发布消息，说韩梅村带着部队投降八路军去了，不久就要带六千人来攻海州（阜新别称）。这条“新闻”，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北平的民国日报都登了。一时谣言四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当时也有些后悔，不该留下来担这个风险，等了一个多星期，李茵赶到了。我于是公开宣称：“韩司令刚一离开，你们就敢这样造谣诬蔑，我马上去把韩找来，同你们算账！”话虽这样说，还是有些担心他们采用卑劣恶毒手段进行暗害，好在杨明清还在代理县长，量他们也不敢太放肆。至

于谣言，杜聿明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一则韩是他的亲信；二则部队是他调动的，他心中当然有数。我为了脱离这是非之地，便在三月中旬，赶紧和李茵一起动身去凌源，为防万一，我没有乘直达锦州的火车，而是经新立屯、新民绕道沈阳，在沈阳休息两天，再经锦州转锦承路去凌源。

（七）三进解放区

当我赶到凌源时，正是我军退出延安的时候，周太喧已经接受任务在两天前化装农民进入解放区。他请了当地的一个老农作向导，托词是奉三支队派去侦察解放军情况的。他们刚进入解放区，便被抓起来了。周暗中示意，要解放军把他和那个老农分开。然后，他也被送到一个旅司令部，这就是驻防热南的十六旅，和热东北的十七旅是兄弟部队。这个旅的司令员是张德发，一个粗犷善战的老红军，待人热情坦率；政委就是南下后湖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周太喧向他们叙述了我们和十七旅一再联系的经过，并谈了十七旅既不敢大胆放手帮助我们，又未能认真妥善地保护我们，以致让皮广正逃了出来，在阜新给我们制造险恶环境的情况，他们立刻请示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分局和军区早已了解我们在阜新时和十七旅接触的全部情况，以及由于十七旅负责人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险恶处境，因而更加信任和关怀我们。这从后来分局、军区召开的起义经验总结会上程子华同志的总结发言（大意如本文开头的所述）可以领会到。于是经过上级批准，十六旅就派了他们的作战科长戴平带领五名老侦察员，化装我们的侦察员分别住进了三支队司令部和侦察班。戴平、周太喧和我一起住在韩司令公馆里，不和外人接触，我们日夜细谈，增进了相互了解。当戴平知

道韩和我们的身世、经历、为人，以及在阜新的工作和与十七旅联系的经过情况后，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好同志。然后，韩和我又和他一起环绕凌源县城，观察了城防阵地，商定了解放军来接应我们起义时的路线。

本来军区首长还打算让我们继续留在国统区，不必急于起义，以求扩大战果。但我们考虑到部队处境危急，且有被编入补充石觉的十三军的可能，经过研究，认为还是提早起义为好，决定让戴平在我们作好起义准备以后，返回解放区，要求上级立即派部队支援我们起义，因为我们是处在国民党十三军和九十三军的包围中，没有解放军的接应，是很难把部队拉进解放区的。四月中旬，戴平返回凌源，告诉我们：军区首长已同意我们在四月廿三

（四）日起义，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在凌晨以前迎接前来接应的解放军。但在四月二十日，我们得到情报，说石觉的部队二十三、四两天将有两个师由东向西，路过凌源，开往承德。这对我们的起义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们赶紧在二十一日，一连三起，派遣解放军留住三支队司令部的老侦察员，先后进入解放区，以防万一一起出事，另一起就可接上去，不致有误，俾能及时向解放区报告这个紧急情况，请求改变起义时间。随后又让戴平回解放区，向军区首长请示，另订起义时间。过了两天，戴平再次回凌源，传达军区首长指示，决定把起义时间改在五月一日。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的起义酝酿，总算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至此，我们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八）“五一”起义，叶落归根

用部队起义来庆祝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和意义深远的事！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

情，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首先命令铁路沿线的驻防部队立即集中凌源车站附近待命，然后再次去城外观察地形，检查部署情况，布置通讯联络；同时指派部队看守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仓库，严防敌人破坏，以便起义时全部带走。三十日晚，解放军分三路出动，以两部分破坏凌源东西两面铁路，堵截国民党军前来增援的部队；十六旅的主力则于黄昏以后逐步接近凌源，直接进城迎接起义。当十六旅的部队到达城厢和车站外围时，我们便下令把所有三支队的城防部队集中在城内一个大院内，让开通道，使解放军迳直入城。这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六旅司令员张德发和曹副政委象疾风一样奔向三支队司令部，进入韩司令家。两位司令员紧紧拥抱，我们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马上召集部队官兵在司令部门口大坪集合，由韩司令宣布起义。十六旅早在解放区动员了一百多辆大车，把所有仓库中的粮食、布匹、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装满。中午时分，起义部队、全部人马、车辆浩浩荡荡向解放区宁城、八里罕进发。沿途居民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到了八里罕后，我们立即草拟了起义宣言，通电全国，历数蒋介石国民党的滔天罪恶，说明我们起义的原由；同时发出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这些都刊登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八里罕是宁城地区地委、军分区和十六旅司令部所在地，经过几天筹备，各领导机关召集周围数十里的居民和军队一万多人，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并送来许多慰劳品，使起义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

大会以后，我们应邀到了冀察热辽解放区首府赤峰，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以及分局、军区、热河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随后又把韩梅村接到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军区首长招待了将近一月。接着，将起

义部队整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四野）独立第六师，由韩梅村任师长。此后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始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新阶段。

韩梅村起义以后，分局和军区召开了起义经验总结会议，对起义的性质、作用和经验，作了本文首段所述的总结。不久又根据韩的请求，审查了他的生平历史，并报请中央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以国民党嫡系少将的身份，在起义后立即经中央批准入党的，还只有他一人，我和周太喧、陶涛三人的党组织关系是在起义后经由香港中共南方局钱瑛同志转到中央，再转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在封建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的组织活动不得不采取特别秘密的方式，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特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后来进入解放区的两个学生胡良杰，邓敏捷和我的妻子李茵，经过起义工作的考验，也很快入了党。周太喧、陶涛夫妇在参加辽沈战役后留在辽宁工作。我们四个人经过辽沈、平津两战役最后都南下到了湖南。韩梅村则领导他的独立六师，与四野一同南下打到江西，被任命为江西浮梁军分区司令员，后转业任农垦厅副厅长，现已离职休养。

这里还要附带交代几句：即杨明清当时留在阜新代理县长，当我们在凌源起义时，他没有来得及赶到凌源，以致没有和我们一起奔向解放区。在辽沈战役解放锦州时，我才见到他，安排了他的工作。他虽然不是党员，但一直是拥护革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他对我们的起义工作，不仅有引进之力，而且有参与策划之功。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并衷心感谢他的。

战斗在国统区的演剧六队

刘 斐 章

(一)

一九三八年，在保卫大武汉闹得热火朝天之前不久，国共两党合作组成了军委会政治部，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第三厅主管全部宣传工作，由郭沫若同志领导。

当时，许多由东北平津一带来的流亡学生，和一些在上海地下党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民间救亡文艺宣传团体，都陆续荟集武汉，我们民间救亡演剧第八队便是其中之一。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席是郭沫若）和十多个救亡演剧队，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组织起来的。救亡演剧队只在救亡协会备案，领取印记、队旗，就出发工作。我们救亡演剧第八队是在上海地下党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夏衍的领导下，得到于玲（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剧联”负责人）的具体帮助组织起来的。我当时是剧联的成员，地下党要我当这个队的队长。救亡演剧八队成立后，辗转于安徽芜湖、太湖、桐城一带前线工作了十一个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到达武汉。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和救亡团体，按蒋介石的旨意是要驱散，不准停留在武汉的。经过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军委会政治部才同意将这批青年收编成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均属政治部第三厅建制，担负抗日宣传

任务。民间救亡演剧第八队改编为抗敌演剧第八队，仍由我担任队长（一九四〇年在长沙工作时，抗敌演剧第八队改为第六队，直至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

周查改编以后的各个文艺组织，因机构庞大，分布很广，除行政事务仍由政治部第三厅管理外，还成立了一个中共特别党支部，直接归南方局掌握，负责领导各演剧队和抗宣队的党支部。一时尚未成立党支部的演剧队和抗宣队则派有指导员。特支书记由冯乃超同志担任。长沙大火后，周恩来同志曾指派夏衍、冯乃超、于伶、左洪涛等同志先后担任分布在西南各省国统区的演剧队和抗宣队的联络员或领导人。演剧八队成立之初，指导员为石凌鹤同志。从武汉撤到衡山后，由杜国庠同志（地下党员代理第三厅厅长）直接领导我们队和孩子剧团。

在各演剧队和抗宣队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号召大家克服一切困难，深入前线，宣传民众，巩固部队，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演剧队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排戏练歌，作好上前线的一切准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突然发生大火。第三天，我们被急调去参加火后的救济、宣传工作，直到一九三九年春节才开始深入到湘北前线巡回演出。

我们第一次到湘北前线是从衡阳出发的。出发前，驻衡八路军办事处请叶剑英同志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他指出，自武汉、广东撤退后，敌人采取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其用心是险恶的。演剧队深入前线后，要用最大的努力宣传民众，鼓舞士气，坚持团结抗战。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实际上是演剧队出发前的动员令，队员们听后，个个情绪激昂，信心百倍。

临动身时，我们从八路军办事处要了一大批《新华日报》和《群众》，带到前线，散发给中下级军官。记得当时李仙洲部九十二

军二十一师一位叫艾媛的旅长，向我索取了整套《群众》和不少《新华日报》，并向我提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否继续合作等问题，我当然只能根据人民的愿望和党的方针给予回答。

这段时间我们深入前线演出的戏，除自编的多幕剧《生路》外，一般都为独幕剧，如《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英勇不屈》等。每次演出之前，都要与士兵一道唱几只抗日歌曲，有时还派人下连队教唱。这对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巩固部队抗日情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对演剧队的控制逐渐加紧。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演剧队的处境已非常艰难。首先他们强迫我们全体加入国民党。针对这个情况，一九四〇年九月或十月，地下党组织指示当时与我们一道在长沙工作的二队队长吕复（地下党员）：为了积蓄力量，坚持在国统区宣传抗日，当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可以集体参加。于是，演剧二队和八队的队员连同炊事员等都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接着他们又大放厥词，说什么“知人知面不知心”，阴谋用“攻心”的手段来分化瓦解演剧队伍。国民党第九战区政治部第三科科长龙步云采取突然袭击，以个别谈话为名，进行思想摸底，妄图从个别队员身上打开缺口。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造谣惑众，伺机取缔我们。一次，我们在邀请舞蹈家吴晓邦来长教舞蹈常识时，组织了两场演出，其中有一个舞蹈节目叫《火》，演员用一块红绸起舞，他们便造谣说我们有意把红旗在台上飘来舞去地宣传赤化。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

面对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和蓄意诽谤，周恩来同志指示各演剧

队，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宣传只有通过民族团结的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对国民党人员，包括直接主管演剧队的那些国民党政工人员也要进行宣传，争取他们抗日；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要学会交朋友，扩大社会影响。最后，还嘱咐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先由广东地下党传达给当时在广东工作的一、九两队（后改为四、七队）。一、九两队借着随第四战区组织的宣传团访问第九战区的机会，全体来到长沙，提出要与在长沙工作的二、八队交流演剧经验，各队依序上演一个戏，互相观摩学习，其实是想借着四个队相聚的机会给二、八队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并共同研究如何贯彻。这就是一、二、八、九四个队的“长沙会师”。

参加这次长沙会师的还有一个驻在湘北前线国民党第四军的铁血剧团。这个剧团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其经过是这样的：演剧六队于这年春节，深入湘北前线劳军演出，国民党第四军军长欧震要求我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完全与演剧队一样的剧团，并希望我们派出得力的同志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个剧团。我们认为在国民党前线宣传党的主张是一个有关斗争策略的大问题，经过队务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同在湖南工作的演剧二队（当时二队已有党支部）的意见，答应了欧军长的要求，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剧团的人事、剧目的选择和上演，剧团应有完全的自主权；第二，剧团由军部直接领导，不由军政治部代管。两个条件欧震均同意了，并亲自给剧团起名为铁血剧团。八队队务会议决定派王逸（八队领导成员，队中唯一的导演）担任铁血剧团团长，并派陈景源协

助。因此，这个剧团在组织形式和指导思想等方面，都是与抗敌演剧队一致的。如在剧团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和我们演剧队一样，无论团长、团员每月生活费一律为二十五元；将剧团成员编成若干小组，定期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外团结一致，严守纪律等等。后来的战斗实践证明，他们都是这样做的。那个剧团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姊妹团体，这次也和我们一道参加了长沙会师，听取和学习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

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时，我们讨论得最热烈的是如何交朋友，扩大社会影响，和妥善处理与上级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关系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交朋友，扩大抗日阵营，增强革命力量。哪怕国民党控制再严，演剧队困难再多，工作条件再艰苦，也要继续坚持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会师以后，各个演剧队的显著变化之一，是都交了许多朋友，从而有了“队友”这个名称。所交的朋友中，以新闻、文艺界人士居多，有的是支持我们的进步作家，有的是队员们的老师或同学，有的则是我们在帮助各个学校的群众团体排戏、练歌、举行各种文艺活动时结识的青年学生。朋友增多了，社会影响扩大了，加上我们注意了和国民党中、上级军政人员进行接触，做争取团结的工作，我们和政治部中国国民党头目的关系便不象过去那么紧张僵硬了。同时，由于演剧队的业务和生活费用可以靠自己的演出收入来维持，使得国民党从经济上控制我们的力量也减弱了。这样一来，不但我们的处境比原先主动得多，而且每当我们巡回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局面也比较容易打开了。

随着演剧队处境的变化和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演出的内容和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改变和提高。一九四三年以前的一段时

间,我们以深入湘北、鄂西前线演出为主,演出的多是独幕剧。后来发觉群众对形式单调的宣传已经不感兴趣,我们就在逐渐改变演出内容和提高艺术水平的同时,开始从“草台班”走向艺术性较强的剧场公演。在日本投降前后,我们的陆续上演过夏衍的《一年间》、《愁城记》、《心防》和老舍、宋之的合写的《国家至上》、阳翰笙的《草莽英雄》以及沈浮的《金玉满堂》、陈白尘的《悬崖之恋》等戏,达到了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统区到处锣鼓喧天,庆祝抗战胜利。可是演剧队特别是演剧队的负责人却感到焦急不安,象只没有指南针的船,飘航在大海中,无法确定航向。因为抗敌演剧队是为了宣传抗日,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而成立的。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共同的民族敌人没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瓦解的危险。那末,长期坚持在国统区的演剧队还需不需要继续存在下去?如果需要继续存在的话,以后的局面将是个什么样子?与国民党又是个什么样的关系?若内战爆发,演剧队能否迅速地撤到解放区去?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和演剧九队队长吕复一道去重庆请示夏衍同志。夏衍同志接见了我们,和我们亲切地谈了很久。他说:自从日寇入侵,全国广大地区沦陷多年,现在日本投降,失地收复,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需要你们去占领文化阵地,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关于对时局的看法和前途的估计,他说:国共两方的和战问题,郭老(郭沫若同志)曾问过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国民党对“和谈”没有诚意,迷信他们的武力,还想走抗日战争以前的老路,内战恐怕是难以避免。要是国民党打起来,东北是我们可靠的后方,那里是不成问题的。至

于要打多久，恩来同志估计，打日本用了八年，和国民党打，大概五年总够了吧。

我们来重庆请示时，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一天，郑君里通知我和吕复到他家里去。到君里家里后，知是夏衍同志要我们换换衣服，一道去中共代表团驻地去听重要报告。我们三人换上西装，带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直奔曾家岩50号。到该处后，才知道是听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介绍他们代表党中央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到会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有被称为“七君子”的爱国领袖，有社会科学权威和大学教授，约四十多人，都是当时重庆知名的进步人士。除郭沫若、茅盾和夏衍等几位文艺界的老前辈外，其他我们熟悉的不多。而且大家象事先约好了似的，彼此不寒暄交谈，静静地等待着周恩来同志到来。等了约半个钟头，周恩来同志来电话说：由于谈判议程有变动，他不能按时赶回来，要大家不要散，一聚一散，必将引起特务的注意。并吩咐代表团的同志分头到离得远一点的地方去买包子给我们充饥，但决不要由一个人在附近买许多，以免国民党特务怀疑。后来代表团的同志在分给每个到会者两个包子时，还以数量太少而表示歉意。其实，当时大家都急切地盼着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根本不觉得饿。恩来同志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们非常感动。

不一会，周恩来同志回来了。为了使坐在两间房子里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讲话，他站在两间房子的通道口，笑着对大家说：“房子小，条件不好。”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接着他说：“不久前，蒋先生一再催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毛主席真来了，我们也来了，正式的谈判开始了，可是国民党连一个提案也没有准备，这能说明他们有诚意吗？”周恩来同志介绍了谈判的具体情况之后，表明了我党的态度。他说：“谈判有阻碍，进展缓慢，关键是国民

党仍不肯放弃他那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立场，特别是只要一个军队，也就是要取消八路军，这怎么办得到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人民的血汗总不能白流嘛！为了和平和民主，我党是抱着克制和忍让态度的，但决不能毫无原则。人民军队，不能取消，只能和国民党按比例缩减。”

随后，王若飞同志就谈判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补充。

听了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的讲话后，我们知道内战是难免了。但心中还有些疑团没有彻底解决。怎么办呢？考虑来考虑去，最后产生了一个想法：直接找恩来同志，把心里的问题通通摆出来，听听他的具体指示吧。于是鼓起勇气，到代表团找徐冰同志陈述来意，没想到恩来同志在百忙中，马上就同意了，约定在当天晚上十二点接见我们。

当晚，演剧九队代表吕复、四队代表魏曼青、新中国剧社代表石炎和我四人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提早到了代表团。在等待周恩来同志时，从徐冰和陈舜瑶同志的闲谈中，知道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每天深夜归来，还有一大堆重要公文等着他处理。那天晚上，快十二点钟了，周恩来同志才回来。一进屋就问我们来了没有？边问边向我们坐的那间小屋走来。见到恩来同志，我们都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憨笑着站成一排。还是恩来同志先开口，说：“你们都来了，很好。都坐下来吧。”他要我们先谈。于是我们一个个汇报起来，他认真仔细地听着，有时笑着插上几句，譬如，当我们汇报到曾在各地多次上演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一剧很受群众欢迎时，他说：“这个戏我看过，写的是回汉两族人民识破了汉奸挑拨离间的阴谋以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故事。这戏不错，还可以多演嘛！”又如，当汇报到我们许多同志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国统区呆下去，都想

早点转移到解放区去时，他爽朗地笑着说：“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要是有那么巧，你们正在国民党的前线，国民党的部队被我们包围解决了，你们也全部被俘了，那么一下就可解决问题，都进到解放区了，可是事情没有这么巧呀！”停了一会，他又恳切地说：“看来你们还不能急，还有必要在国统区再坚持一段时间。你们可以配合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嘛！局势也会一步步地明朗起来的，等到那时再说吧。”

我们都已汇报完了，恩来同志仍慈祥地望着我们，看我们还有什么要讲的。我们没有再说什么，他就开始讲他的意见。首先，他充分肯定了我们前段的工作。他说：“抗战八年了，你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限制和迫害，而自己又很穷，工作条件极差，可以说是三面受敌，可是你们都走过来了，真不容易啊！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其次，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即使国共谈判成功，国民党在协定上签了字，也是不可靠的，内战恐怕很难避免。你们一定要作好两种准备，尽可能不再到国民党前线的队部去，因为在前线更没有民主，他们反共，肯定要逼着你们也作反共宣传。但现在马上转移到解放区去，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你们还必须坚持在国统区工作一段时间。”最后，恩来同志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他说：“回去以后，你们可选择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的大中城市开展工作，配合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抗战胜利以后，群众普遍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国民党却置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坚持独裁，自恃有本钱，一心想挑起内战。你们要按照演剧队本身的特点，顺应人民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上演反共反人民的‘戡乱戏’。同时要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以任何借口搞政治迫害。”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指示，一直成为在日本投降后直至解放战争后期指导我

们工作的方针。

谈话结束时，已是深夜两点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恩来同志。临走时，恩来同志嘱咐我们：“夜深了，不要四个人同时走出这个房子，要分散走，以免周围的特务暗害。”恩来同志不顾一天的疲劳，通宵达旦地接见我们，不仅给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而且还对我们的安全关怀备至，使我们十分感动，终生难忘。

一九四六年，演剧六队由重庆东下。本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命令是要把我们配属到他们的王牌军七十四师张灵甫部去的，这个师实际上是一个军，全部美式装备，为了守卫南京的北大门，而被安放在苏北的。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不要到国民党前线部队中去的指示，我们设法推脱了。到达武汉后，我们知道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便找到行辕方面的人，对他们说：武汉沦陷多年，现在收复了，应该加强宣传。象我们这样的宣传队伍，华中、华南一共只有四个，武汉这么大的城市，又有行辕在此，却没有分配一个，反而分了一个给七十四师，实在不合理。他们一听，颇有点情绪，认为政治部调配不当，立即表示要我们留在武汉，一切应办的手续都由他们负责。我们达到了不去苏北前线的目的，大家都很高兴，马上与演剧四队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影响，造成既成事实。以后，在汉口与演剧四队轮流进行多次公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直到后来，因为冲不破国民党控制演出场地的困难，才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向长江以南转移。

一九四七年底，我们四、六两队一同转回长沙。回长沙后，两队下了最大的决心，节衣省食，买下一座简易破旧的剧场，名曰联华剧院。经过两队逐日轮流演出十一个月，才还清买剧场的欠款，获得剧院所有权（解放后，我们将这个座落在怡长街的剧院交给了

国家，改建成今天的湖南剧院）。有了这个基地，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在演出场地上对我们的控制，而且逐步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为后来执行周恩来同志关于配合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开展工作的指示，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从武汉回到湖南主持军政。他不象蒋介石的嫡系那样强迫我们上演反共反人民的“戡乱戏”，这对于我们适应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开展宣传工作是有利的。这段时间，我们先后演出了许多进步作家的剧本，如田汉的《两人行》、阳翰笙的《草莽英雄》、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陈白尘的《悬崖之恋》、沈浮的《金玉满堂》、郭沫若的《孔雀胆》等，后者演出时间最长，上座不衰。写戊戌变法的《清宫秘史》、高尔基的《夜店》以及古装戏《钗头凤》、《郑成功》、《明末遗恨》等，也很受群众欢迎。我们强调演出的艺术质量，不单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拒绝反动派交来的“戡乱”剧本，即使被说成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管他。

一九四八年秋末冬初，华南地下党组织托人带来口信，安排我们去香港听取中共中央文委的通知。这时湖南地下党派张立武同志来队，以联华剧院总务的名义主持工作。我把去香港的事向他汇报，经过商量，最后决定以联华剧院购买电影机为名，让我、刘琼和马英（联华剧院经理）等三人去香港。

我们到香港后，先找到了夏衍同志。他告诉我们：中央文委已指定冯乃超同志负责处理演剧队的转移问题，要我们直接去找冯。按照夏衍告诉的地址，我和六队的刘琼一道找到了冯乃超同志。我们向他作了汇报，除本队的情况外，也谈了我们所了解的兄弟队在西南各地的情况。我们第二次和冯会见，是约在一家热闹拥挤的酒家，三人边吃边谈。冯对我们说：演剧队现在可以从国统区撤退，转移到解放区去了。你们演剧六队预定分配到现己

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去工作。我当时曾提出是否可以让我队的同志先去一人打前站,以便于今后联系?他说,从香港到解放区也并不是容易的。过去曾利用苏联船只,把我们的同志装作临时雇用的锅炉工混过去。现在国民党政府通过香港英国当局进行严格检查,很难通过,除非个别同志在国统区遭到迫害,无法立足,必须从此路转移外,一般不走这条路。末了,他和我们约好,回湖南后,一切准备就绪,就发个电报或写个简信给他,只要说“姑母病已痊愈”,他就可以用无线电向刘、邓大军方面联系,等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就会有部队前来接应。

我们回到长沙,将经过情况向张立武同志汇报后,他说,中央文委既已有决定,他马上向湖南地下党汇报,今后如何安排,等待地下党的决定,但目前一定要注意保密,对六队的一般成员也不要透露。过了两天,张立武对我说,地下党已派人去联系,商量走哪条路到大别山去的问题。他没有说明到什么地方与哪方面联系。关于演剧队如何转移,以什么为借口离开长沙等问题,也未谈及。我却考虑得多些,认为要是全队秘密离长,突然失踪,必然要引起别人注意;要是先撤主力,留下的继续组织演出,又有一定的困难,拖久了也会暴露。张立武对这些问题也没作明确表示。我很着急,每隔几天就去问张。他先说人已派出去了,还没有消息。过了两天又说,派去的人碰上了麻烦。过了些时候又说,派去的人牺牲了。怎么办呢?我召集了队务会的成员商量,大家认为到大别山这条路不容易走,是不是另想办法?听说二队已从北平全部转移到解放区了,四队也有部分人转移成功了,九队在上海通过联络站也有人转移了。商议结果,拟派吴榕、康庄夫妇到上海去联系,经六队党支部同意,批给他们三百块光洋作旅费,估计如取不到联系还可回来。吴、康抵上海后,来信说,上海情况变化很

大，可能很快就會發生戰爭，到解放區去的聯絡點已撤銷了。又過了幾天，我們和吳、唐兩同志的聯繫也中斷了，且聽說解放大軍即將渡江。正當隊務會的同志們焦躁不安的時刻，張立武同志傳達了地下黨的指示：既然轉移有困難，就留下來投入迎解鬥爭好了。我們去解放區的計劃就這樣告吹了。

由於我們在香港時與馮乃超只約定我們準備就緒後如何告知他的暗語，至於後來情況變化，轉移不成，其中經過又比較複雜，怎樣給他通訊卻不曾約好，因而無法聯繫。馮乃超同志對我們這些情況一概不知，直到解放後，他還以為我們發生了意外的事故。

（四）

我們決定在長沙迎接解放，這就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工作，一方面要抵制反動派對我們的壓迫和控制，一方面要發動群眾，開展鬥爭，保護城市。

從國共談判破裂那個時候起，反動派對我們這些文藝團體就很不放心，曾使用各種陰謀手段，企圖把我們縛在他們反共反人民的戰車上。內戰開始不久，我們演劇隊還在武漢，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就曾以召開重要會議為名，通知各民眾團體（包括軍隊系統的宣传單位）的負責人和各界代表人物都去參加，等大家去了以後，才宣布是開“戡亂”座談會，並強迫到會的人簽名和發言，人們則用沉默來抵制，結果由主持會議的黨棍唱一通獨腳戲了事。過不幾天，武漢行轅政治部又派人來要我們演“戡亂戲”，我們推說沒有劇本。他們很快就送來了二十多個本子，全是空喊反動口號的破爛貨。我們就说這種本子的藝術水平太低，不象個戲，演出沒人看，投資收不回，到時會連工資都發不出，如果上面不予補貼，我們就會垮台，要排練得先改寫劇本。但寫劇本我們不

内行，只能由政治部去搞。这样一搪塞，他们也没办法，既拿不出钱，又写不出剧本，只好不了了之。就这样软拖硬抗，我们始终没有演过一出“戏乱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反动派对我们的控制也越来越紧。一九四九年夏天的某一天，我们的直接上级领导机关国民党联勤总部由广州拍来电报，要我们立即撤往海南岛。可是他们既不拨款，又不给交通工具，这明明是办不到的。为了慎重应付起见，我和队副鲍训端还是去了一趟广州，找联勤总部负责人说明：“我们本来早就想南撤的，只因没有经费不能行动，如果上面不拨一笔数量可观的现洋，我们就无法动身。”为了敷衍对方，我们又说：“现在我们只好一面作准备，一面继续演出，等演出赚了钱，还清欠款，凑足旅费，马上就动身。”他们也只好同意这么办。

我们趁这次到广州的机会，由演剧四队和七队的同志带领，找到了左洪涛同志。他是周恩来同志指定负责与演剧队联系的人。我们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和遭遇，以及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情况，他肯定了我们的作法，并指示我们提高警惕，准备应付他们的新花招，提防他们的政治迫害。

我们刚从广州回到长沙，国民党联勤总部又拍来一个密电，要我们注意同属该部管辖的电影队，看他们“有无不轨意图，是否忠于党国”。对此，我们根本懒得理他。第二天，那个电影队的负责人忽然来到我们队，试探地问我们的行止和打算。我心里明白，他也一定是接了同样的电报，奉命来侦察我们的。于是我把在广州向联勤总部谈的那通鬼话对他搪塞一番。每谈到纸币贬值，经费拮据问题时，他也同样叫苦。就这样，彼此心照不宣，俱无所获。

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和胁迫的同时，我们队把发动群众，迎接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时，我们队里已建立了党支

部（张立武同志负责），并发展了十八个超龄的新民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力量是比较强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在迎解方面，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翻印了党关于城市工商业政策的文件和其他宣传品，广为散发。

二、经过调查，对尚在活动的大小特务，按其姓名住址，发出警告信。

三、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残余部队只顾向南逃跑，他们一面逃跑，一面破坏，因此前线解放军领导机关给我省地下党组织提出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护桥、护路、护厂、保护公共财产和粮食，而不必发展武装去拦击国民党部队。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六队党支部曾派出队员到邻近县区找地下党的联络员传达上级指示。

四、发动全市艺人参加迎解。当时长沙各剧院大部分艺人由于对我党我军缺乏了解，存在许多思想顾虑。有的怕大军进城，秩序混乱，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有的甚至想到日寇入侵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景象，感到十分恐惧，准备逃难。针对这些情况，六队党支部发动队员深入各剧院进行宣传。我曾与田洪（田汉之弟）、高百岁（京剧名演员）、罗元德（湘剧名老艺人）、黄芝岗（湘剧史专家）等人一道往各剧院串门谈心，要大家安心，千万别逃难，自找苦头吃。并说明大家都是受折磨的穷苦人，解放军来了，反而会有好处。当时各剧院普遍存在营业清淡，经费拮据的困难，有的甚至面临断炊的威胁，这是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我们了解到青年会有社会救济这个业务项目，便去和该会负责人张以潘商量，他很乐意帮忙，并坦率地对我说：“我这里存了这么多大米，以后解放了，我怕人家说我囤积居奇呢”。当即拨出十几石大米。

七家剧院，每家分得两担，煮大锅稀饭，共渡难关。

随着解放的临近，长沙的迎解活动也逐步由秘密走向半公开。我们演剧队开始排练一些街头歌舞小节目，如《赶早船》、《打连箫》等，并邀请其他剧院的艺人来联华剧场后台参观指导。当他们到达时，我们故意把事先秘密绘制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摆出来，向他们示意：长沙即将和平解放，并让他们把这特大喜讯透露出去，以鼓舞广大群众的情绪。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我们全队整队参加迎接解放军进城。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全市的艺人来了不少，大家情绪热烈，虽然欢呼、跳跃了大半天，但没有一个感到劳累的，大家看到人民解放军个个意气昂扬，态度和蔼，严守纪律，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长沙解放后，全市艺人成立了互助会。互助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进行慰问演出。那天，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其它领导同志均参加了慰问晚会，会后人民解放军送给艺人两百元。大家议定以之作为互助会的基金（任何艺人遭到天灾人祸或生活困难时，均可申请补助）。艺人互助会的第一任主席是贺华元，改选后是徐绍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一直帮助他们进行工作。艺人互助会的章程规定，艺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学习上、业务上也要帮助。艺人互助会划归军管会文艺组领导后，我们演剧六队则与省委直接领导的南下的文工团合并，组成湘江文工团。省委指派我任团长，铁可任副团长。随后全团投入了减租减息，反霸、土改等热火朝天的斗争，先后演出了《白毛女》，创作了《双送粮》等剧。演剧六队就成为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历史名称了。

补充刘岳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点滴事迹

傅 白 芦

编辑同志：

读到贵刊第十二辑里《回忆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中的余志宏同志》一文中关于“策动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起义”的叙述，又读到第十三辑中刘笃平同志写的一则订正，我深深感到，有责任向你们提供一点第一手材料，以便党和人民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刘子老有较多的了解。

本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是一个伟大而又严酷的时期。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旧中国正在土崩瓦解。光明和黑暗的搏斗异常激烈，符合人民意志的战场上的胜利烈焰和地下火炬交汇的黎明，还必须在人民的支持下去冲破那一阵严酷的暗夜。当此时际，我结识了刘子老。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七、八月间，他刚就任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不久的時候。地下党的官健平多次找我商谈，一定要设法与刘岳厚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够给予党以支持和帮助。那时我虽然早已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还没有在组织上入党，按当时的习惯说法，大约算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吧。党的重托在身，义无反顾，我当然应该寻求一切可能得到的机会去完成这项任务。然而我和刘子老尚无一面之缘。

在和刘子老见面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大致有这样一些方面：

（一）他原是一位搞公路工程的土木工程师，在何键统治湖南时期，曾任省公路局长多年，直到一九三六年春离任。在他任内的

湖南公路管理，据说是搞得不错的。我一直以师事之的前辈、曾在第三国际工作的肖项平同志，就在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著文介绍过这方面的成绩。（二）他又是湖南国民党内甲、乙两派中的乙派首领人物，与属于C·C的甲派张炯等人矛盾甚深，甲派曾攻击他“包庇共党”，C·C对他极为不满。记得一九四四年春，羊枣同志离衡阳《大刚报》去福建时，曾听朋友们说，抗日进步力量打算在东、南一隅有所作为；刘子老那时本拟应刘建绪之邀也去福建担任一个重要职务的，进步朋友原想在必要时能够借重子老的帮助，后因C·C的反对，他的福建之行未能实现。（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是原在茶陵后迁衡阳出版的《开明日报》的创办人。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新闻工作者掌握的，它以工资甚低、工作极好而驰誉于当时的进步文化界。我曾为它的副刊写过稿，也曾写过一点通讯，算是有点渊源。当时统治湖南的薛岳和他的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对这家报纸十分恼怒，屡施迫害，以致最后将它扼杀查封，还逮捕了后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骆何民烈士和其他一些进步朋友。刘子老为此发表了署名的长篇文章，进行过勇敢的、坚决的抗争。（四）一九四六年初，由黄明、肖敏颂、刘国安和我以及李瑞章等创办的《人民世纪》被迫停刊后，黄明同志出走南京，他的爱人宫莉珍同志带着孩子滞留长沙，困难甚大。是和刘子老交谊甚厚的唐文燮在他的陈家垅住宅腾出一间房子妥予安置，为时约半年左右。朋友们一直感谢唐公并兼及于老。（因此之故，唐在后来筹办《法报》时，委托我物色编辑部人员，我就介绍李冬阳同志第一个进去，后来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地下党组织的编辑部班底。解放后知道，抗日战争时的《观察日报》也得到唐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基于这样一些基本了解，我觉得和他接触是有有利条件的；但也

有顾虑，担心他是个老于官场，纵横捭阖式的人物，恐怕不易较好的完成任务。

事有凑巧。官健平和我谈过后不久，曾在《开明日报》工作后来和我在《大刚报》同事的欧阳柏同志路过长沙。我希望欧阳介绍我与子老见面。他慨然应允，并说子老对曾任《开明日报》总编辑的黎树苍（澍）十分尊重，可以借用黎的名义。

我们是在长沙小吴门外藕芽冲子老自己的那儿间木板小平房里见面的。从年龄上看，他已年近花甲，而我只是一个刚过二十四岁的“小青年”。有一个印象至今还十分清晰：欧阳介绍过后，按照当时的习惯，我递送了一张名片。他戴上眼镜，大约看到名片上印有《晚晚报》副总编辑，《力报》主笔的字样，眉头微微一皱。欧阳说：“他是树苍的朋友，特地来看你老人家，以后还要常常来打扰的。”他笑了，连声说：“啊，树苍的朋友，树苍的朋友，好，好。”我接着表示，树苍在长沙的朋友，听到你老就任新职的消息，深庆得人。此后，有很多事情要来麻烦、请教。他表示，只要力所能及，就尽力而为。其实，当时我对黎澍同志虽然慕名已久，但却是不认识的。他留我们吃了晚饭，临别时，他就照欧阳对我的称呼说：“白芦，你常常来谈谈吧！不要到绥署那边去，就到我这里来。”会见消除了我原先的疑虑，我认为，他是一位对党的同志相当尊重，怀有感情，对进步人士颇为亲切的忠厚长者。

此后，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我必到他那里去叨扰，一般都是在下午五时以后。遇上没有什么菜吃，他还到塘边去钓鱼。这种交往，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我正式入党并撤离长沙。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曾随长沙新闻界粤港访问团南去，有近一个月没有和他见面，他还责备我没有事先打个招呼，

这十个月左右的期间，他以对新闻记者聊天的方式，提供了湖南国民党方面的大量情况，其中不少是十分机要的。都由我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听过我的汇报的同志，应该是能够予以证实的，如宫健平、李冬阳等。这里且举一两个关系不大的小小例子。比如，在湖南和平解放之前，蒋介石曾打算由黄杰取程潜而代之，因此先遣黄杰来长策划。子老提供这个情况后，地下党就通过党和进步力量掌握的几家报纸予以巧妙的揭露，并且形成拥护程潜和平自救湖南的舆论，迫使黄杰匆匆离去，促进程潜能够多为桑梓着想，多为湖南人民着想。这是有报纸可查的。又比如，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前后，一九四九年的三月前后，子老告诉我，国民党省党部很注意孟树德、李龙牧，他们以离开长沙为好。我就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面告孟、李二位，他们因而安全撤离。（一九四八年的十月前后差不多的同时间，康德也告诉我，戴哲明从国民党省党部陈大榕那里听说过特务在注意孟树德的事。）

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白崇禧的强大压力包围之中，在白崇禧的大军迫境之际，在国民党内部倾轧至为深重之时，生死祸福难以预测，我这样一个青年又不能为他提供任何一点对他有利的保证，只因为听说我是他所尊重的一位共产党人的朋友，他就谈了那么多弥足珍贵的情况。至少也应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湖南地下党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掌握国民党的动向，以开展多条战线的斗争。如果活着的人们不健忘的话，是应该不忘记刘子老这样一条重要渠道的。我们党从来就认为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好事的党外朋友，当然不会忘记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给党以支持和帮助的刘子老。

我感到内疚的是，或者因为自己人微言轻，或者因为一九五七年秋季以后的境遇，一直没有可能用文字为刘子老纪录一点使

人不应忘记的事迹，好象他自己也没有夸耀过这方面的什么成绩。解放后，大约在省政协一次学习委员会之类的会议上和他见过面，他没有责备我长时期不去看他，只是说，不必让他当什么参议，最好让他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搞搞公路方面的工作，因为他在这方面自认是在行的。我也曾将他的愿望向有关同志汇报过，这当然不易作出恰当的安排。他这种想做实际工作的愿望，是令人感动的。在他被错划的时候，因为我和几位同事谈起过他对党的帮助，我的几句老实话，当然会成为“包庇”的“罪行”，不少的揭发批判这种“罪行”的大字报，大概还没有为看到过的人们所忘记。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罪行”公诸报端的时候，只写了“与魏猛克、康德等人关系本很密切”，尚未涉及刘子老。要不然，会使子老感到心寒的。正因为有这种内疚，所以当一九八〇年三月，湖南省政协为刘子老举行追悼会，黎澍和廖沫沙同志两位前辈发出唁电，要我也加上一个名字时，我不揣冒昧，遵命办理，而且高兴这样的附骥。记得那唁电的原文是：“刘岳厚同志对湖南国民党反动派的勇敢斗争，永远值得尊敬。特向其家属致以慰问。”这正可以聊表我对刘岳厚老人的敬意，并且可以稍稍寄托自己的哀思。

编辑同志：时光易逝，我也两鬓飞霜，不觉之间就年近六十了。趁着记忆力衰退尚不十分严重，赶写了刘子老的点滴事迹，自信是无误的，它不会有任意增添，只可能有遗忘疏漏。仅供参考，并盼指正。谢谢你们！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关于湘中二支队第三团的一点补正

莫 新 春

我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的《坚持敌后斗争的湘中二支队第三团》一文中，谈到该团建立党支部后，首先发展了曾明州、李梦麟二同志入党（见该书第220页）。经有关同志指出，当时被吸收入党的还有张必烈同志。我原先不知道这个情况，经过向曾明州同志了解，他也证实确有其事。对此重要情况，应对我那篇文章予以补正。

关于我在起义后叛逃问题的几点订正

熊 新 民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和第十三辑中有好几处提到我在起义后又叛逃的问题，如第十二辑45页中说：“刚开过第一次会议（指和谈会议），熊新民、刘云楷即潜离长沙，率部叛逃了。”同辑190页中说得更加具体，说：“长沙和平解放的消息迅速传到各地，驻在湘潭、湘乡一带的七十一军军长彭鏊对党的政策原就没有明确的认识，加以原任该军军长、现任兵团副司令官的熊新民坚持反动立场，也于此时擅自离开长沙到达该军驻地，对彭表示宁可‘背城借一’，决不作‘城下之盟’，坚决反对起义。”

此外,还有几处类似的说法。这些说法,都不太符合事实,有澄清一下的必要。

我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参与了陈明仁领导的和平起义,并且担任了陈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随后又背叛了起义,当了白崇禧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七十一军军长,在与人民解放军遭遇中被俘。这是事实。说我是叛逃,一点也不冤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具体的过程。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长沙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城的那天晚上,陈明仁派副官把我叫去,说彭鐸的七十一军不稳,已经开始逃跑,连调来长沙担任警卫的吴祖伯团都跑了,要我立即赶到湘乡去阻止他们。我于次日乘车离开长沙,午后到达湘乡七十一军军部,获悉该军从四日晚上起就开始从驻地向西南方向叛逃,此时大部分已过了湘乡县城向青树坪行进。我到军部时,只见到彭鐸(军长)、鲍志鸿(副军长)、杨馨(副军长兼参谋长)、吴涛(八十七师副师长)四个人。他们对我大肆责骂、蛊惑。彭鐸威胁说:“你来了,不走也得跟我们走!”他们在与陈明仁通电话时,还以“部队难以控制,要求司令官来训话”,企图把陈骗到军部来,加以扣留。陈在电话中要我设法稳住部队,我回答说“现在我已无能为力”,暗示我已失去自由,他不能到这里来。我那时对共产党当然毫无认识,加以受彭鐸等人的蛊惑,思想上确实有些动摇,既不愿跟着他们跑,又不敢与他们斗争,坚决要求回长沙,只想设法去香港观望一段时间。当晚,他们分乘几部汽车,把我夹在中间,后面还有一班武装士兵护卫,离开湘乡,驶往青树坪。途中碰上由青树坪开来的一辆汽车,彭等停车与对面车上的人谈话,我就乘机加足马力,开车冲了过去,直驶邵阳。我一到邵阳,成刚就向白崇禧报告,白立刻派一

架飞机把我接到衡阳，进行种种威胁。我为了保自己的命，也为了救刘勋浩（八十八师师长，在准备起义时被该师团长倪中纯捆送到白总部的）的命和保全七十一军这支部队，便答应了他的要求，重新担任他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兼七十一军军长，再一次背叛了人民。

这里应对《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关叙述加以订正的，有以下几点：

一、我是奉陈明仁司令之命到湘乡七十一军军部去的，去时连一个班都没有带，不能说是潜逃，更不是率部叛逃。

二、是彭镔等人裹胁我叛逃，而不是我煽动该部叛逃；该部在我到达湘乡前两天就已叛逃，与我实无关系。我在湘乡只呆了几个小时，始终和彭、鲍、杨、吴四个人在一起，没有单独和其中任何一人谈过话，所云“对彭表示，宁可背城借一，决不作城下之盟，坚决反对起义”，实属毫无根据。说彭镔“对党的政策原就没有明确的认识”，“加以”熊新民来一煽动，就率部叛逃了。这实际上（虽然不一定是有意的是）是把叛逃的罪责加之于我，而替彭镔开脱。主客颠倒，难以服人。

三、我和刘云楷在和谈前后就没有见过面，他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叛逃的，我毫无所知，不应该把我和他扯在一起。

对《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

一文的订正和补充

孟 树 德

一、“组织‘四、二八’游行示威”一段中所提学联等委会派往兰谊中学串联的同志遇到很大的阻力，不得其门而入。现据派往兰谊中学的王寿诚同志谈，当时他还是到了兰谊中学，召开了几十个人的座谈会，不过学校当局很不高兴。所提东方中学校长是袁尧民，而不是袁光民。当时醴陵乡师校长是易竹勋，而不是吴晦华。当时醴师的训育主任罗克特，思想反动，极力阻止学生参加游行。

二、“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一段中，提到了醴陵攸县边境的“湘东纵队”，但太简单，现据原“湘东纵队”负责人邹继衍来信，

“湘东纵队”是经国民党部队的团长邹继衍率领正式起义，由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了组织员曹伟如前来领导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在攸、醴、萍边境坚持了四个月的斗争，长沙和平解放后，奉湖南军区命令整编的。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军区电令该纵队在攸县的部分部队编入解放军攸县县大队，在醴陵的部分部队就地编入解放军一三三师（当时该师驻在醴陵休整）。

在这段资料中，还提到我从文工团中挑选了肖健生等二十几名年轻同志输送到部队工作。肖健生系李汉华之误。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勘误表

页数	行数	误	正
62	12	六月二十日	六月二日
81	2	阎 之 祥	阎 子 祥
169	21	李 孟 秋	李 孟 球
188	21	四纵队也撤了回龙山的围	四纵队也撤围仍返回龙山
189	6—7	牌 头 市	串 头 市
192	7	夺取地主伪乡、镇枪枝	夺取地主及伪乡、镇枪枝
198	26	他们即主动撤离了杨家滩	即主动暂时撤离了杨家滩
199	26	曾奉中央明令	曾奉中共明令
200	2	尚仍顽梗徬徨	倘仍顽梗徬徨
206	8	在泉塘	在景庆
275	13 ²² ₂₆	“1 0 5 9”	“1 0 5 部”
13	10	曾同蔡廷锴一起在上海抗过日	曾在上海抗过日

